

世 新 大 學
傳 播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指導教授：郭良文 教授

西馬來西亞華文報之發展與困境——
多族群環境中報紙角色和功能的轉變

Development and Dilemma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s in West
Malaysia—Role and Function in a Multi-Racial Society

研究生：黃招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引言.....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3
第三節 研究問題.....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報紙的角色和功能.....	7
第二節 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和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Multi-Racial Society）環境.....	10
第三節 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Nation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1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0
第一節 質性研究.....	20
第二節 深度訪談和次級資料分析.....	20
第三節 研究範圍.....	27
第四章 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性.....	29
第一節 定位和角色扮演.....	30
第二節 族群認同、信任和凝聚力的指標.....	44
第五章 八〇年代前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49
第一節 洋人辦華文報.....	50
第二節 辛亥革命和華僑報紙.....	50
第三節 抗日運動.....	51
第四節 戰後的華文日報.....	51
第五節 獨立後的華文報.....	52
第六章 蛻變中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56
第一節 進入報業集團營運年代.....	57
第二節 政黨收購影響讀者對華文報信任.....	69
第三節 內政部的關切和法令的約束.....	78
第七章 多族群環境下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82
第一節 追尋國家利益及族群利益.....	83
第二節 意識型態作祟和主流媒體的挑釁.....	85
第三節 自我控制和設限的華文日報.....	88
第八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93
第一節 角色及功能的調整與轉變.....	93
第二節 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困境中發展的華文日報.....	99
第三節 研究建議和限制.....	101
第九章 參考文獻.....	103
附錄：訪談大綱.....	110

表目錄

表一：受訪者名單、職務、經歷、受訪地點及時間一覽表.....	25
表二：馬來西亞各華文報歷年廣告收入（以馬幣計算）*	33
表三：馬來西亞各類媒體歷年廣告收入（以馬幣計算）*	33
表四：八〇年代前後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發展大事記.....	55
表五：馬來西亞報紙及雜誌銷量趨勢（截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7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引言

馬來西亞華文報歷史源頭可追溯到一八一五年荷蘭人統治下的馬六甲州，至今已有一百九十年的歷史。馬國向來是東南亞地區發行最多華文報的國家，報紙的形式及訴求，從抗日鬥爭、提倡社會主義、反共產黨勢力到國家獨立前後爭取華族權益和身份認同等，其角色和立場都緊隨社會環境和國家發展而不斷的改變和調整。

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反映了當時社會需求，例如一八一五年第一份華文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由英國傳教士 William Milne 和 Robert Morrison 創辦。當地華僑透過報紙瞭解最新的殖民政策，報紙也同時達到向華人傳教的目的（方積根和胡文英，1989）。

經歷英殖民政府和日本軍隊三年零八個月的血腥統治、擺脫殖民政府宣告獨立、華人身份認同問題、馬來人和華人的種族流血衝突、到政府干涉華文教育發展、下令關閉數家華文報等事件，數十年來的社會紛擾並未使華文報從馬來西亞完全消失，相反的，它在複雜的多族群社會環境中茁壯成長，甚至發展出一套龐大且專業的報業體系。

爾後形成的報業集團除了發行日報、雜誌和書籍等平面媒體之外，也積極推廣國際性文化活動。過去這些文化活動幾乎由華人社團¹主導，後來成為華文報主要業務之一，目的是希望加強華文報和華人文化之間的關連性，與過去傳統報業的經營模式有著極大轉變。

獨立後華文報不單只是做為一份訊息傳遞的工具而已，因為在一九五七年脫離英殖民政府宣佈獨立後，華文報便積極建構新國家認同、爭取族群利益和國家利益，這個角色有別於其他國家華文報的辦報理念和風格，亦是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的特色之一。

馬來西亞華文報在八〇年代進入了一個全新發展階段，許多原本屬於家族經營的報紙紛紛將股權轉售給當地華人富商。這些企業主要採用共同的企業化經營模式，這也意味著華文報走向一個適者生存的競技道路，後來事實證明，有不少華文報「陣亡」在這條企業化道路上。

¹ 這裡所指的社團是血緣性社團、地緣性社團和業血緣性社團。

一九八一年，馬哈迪接任馬來西亞首相，馬來西亞報業進入一個「新聞再封鎖」的年代，政治勢力開始大肆介入報紙運作。朝日報業集團總編輯蕭依釗（2004）當年便預言馬哈迪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比過去幾任首相還嚴格，後來從許多事件中得到驗證，例如一九八七年發生的「茅草行動」大逮捕事件，馬哈迪以內政部長身份利用內安法令所賦予的權力下令逮捕一百零六位異議人士，其中包括多位爭取華人受教權的華社領袖，同時勒令關閉《星洲日報》等另兩家不同語言報紙（馬來西亞文和英文各一家）做為警告，產生的寒蟬效應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華文報自我審查的要求。

在政黨收購華文報業集團之前，每家報社幾乎都帶著族群使命和情感在辦報，所有的訴求也以華人社會為主。「茅草行動」之後族群界線劃得更加清楚，報社負責人一方面要避免被官方冠上煽動的罪名，另一方面還得兼顧華社的感受，同時還得面對馬來西亞文報紙的言論挑釁，處境十分無奈。

馬來西亞執政團隊成員（黨）大部份無法掌握華文閱讀、聽和書寫能力，因此必須透過他人轉譯才能瞭解華文報報導內容，無可避免地常會在有心人士刻意歪曲內涵下產生誤解，華文報基於法令等現實問題的約束下，無法對自己擁護華族的立場做出反駁和澄清，以致常被執政當局視為「社會的搗亂份子」。

在語言侷限及政治勢力干預下，華文報無法直接且有效的傳達華社立場，更加深執政黨對華社的誤解，尤其是領導國民陣線（以下簡稱「國陣」，**Barisan National**）²的巫人統一機構（以下簡稱「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領袖，常對華社的忠誠性等問題做出嚴厲指責，對馬國多族群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除了政府官員壓力之外，在內閣擔任職務的華裔部長或華裔政黨領袖基於個人利益或政黨利益，也常「關注」華文報新聞內容，例如白沙羅華文小學遷校事件³、馬華公會設立的張明添基金會疑雲⁴等，都被他們列入敏感課題，禁止所有報紙報導相關議題，華文報被迫接受不知是國家利益、政黨利益還是個人利益的「建議」。

² 國陣成員黨共有十四個，即巫統、馬華公會（**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民政黨（**PGRM**）、馬來西亞印度國大黨（**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砂勞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砂勞越土著保守黨、砂勞越達雅黨、砂勞越國民黨等（國陣網站，2004）。

³ 白沙羅華文小學具有七十年歷史，是雪蘭莪州八打靈市十七區（**Section 17, Petaling Jaya City**）附近唯一一所華文小學，提供白沙羅華人新村等地附近七個社區一千多位華人子弟就讀機會。後來因為雪蘭莪州政教育局和中央教育部在遷校事件上，除了答應在新社區建新校舍之外，也宣佈關閉原址校區，此事引發華社不滿，認為政府不應該以一校換一校方式犧牲華教人士辛苦興建的華校，並引發一波又一波示威，華社也發動捍衛白小救救白小運動，後來不幸演變成在野黨和馬華公會的政治鬥爭，進一步牽涉到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目前紛爭仍在進行中，華文報也被勒令禁止報導和此事有任何關連的議題（雪蘭莪中華大會堂，2001）。

⁴ 張明添基金會是馬華公會屬下信託基金會，馬華公會曾被檢舉不當挪用基金，反貪污局和警方也介入調查，是當年各華文報報導的熱門議題。雖然馬化集團董事會曾宣佈張明添基金未被侵吞，但有關聲明並未消除華社疑慮。

從早期政黨收購《通報》一家報社到後期大規模收購南洋報業集團⁵，反映出執政政府企圖掌控媒體傳播權的野心和渴望。國陣成員黨介入華文報營運始於八〇年代，以當時華文報數量來看仍處於百花齊放狀態（潘永強、魏月萍，2002）。不管是屬於家族式、企業集團或政黨經營的報紙，大部份仍然堅守維護華社利益的使命理念，後來在主客觀條件限制下逐漸淡化，華人使命也不再是各華文報談論的主軸。

華文報業經營結構在九〇年代重新洗牌，進入一個全新的集團化時代。過去數十家媒體爭奪市場的場面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兩大集團——朝日報業集團和南洋報業集團的競爭。相隔二十載，政黨勢力再度介入報業營運，馬華公會在反對聲浪中接管南洋報業集團；與此同時，朝日報業集團亦透過微妙的股權分配方式，間接統一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政黨的政治目的結合企業集團的商業野心成功壟斷了西馬華文報業，馬國華文報經營結構在八〇年代之後第二度重整，許多人擔心華文報從此將走向新加坡報業一言堂局面，更有學者擔心報業壟斷將進一步危害國內言論多元化和華社競爭力。

在收購事件之前，企業家對華文報的穩定收入、龐大讀者群及報社的聲譽比政黨更有興趣，例如豐隆集團收購《南洋商報》和《中國報》之後的確讓集團業務更多元化，並可藉由報業特點延伸或累積品牌價值，比起政黨的政治目的更能讓華社接受。

隨著華文報大肆報導東南亞金融風暴、副首相安華被判刑等政治經濟課題，以及後期馬華黨爭白熱化、張曉卿想成為馬來西亞報業大亨等因素推波助瀾下，直接或間接造成政治勢力超越自由企業經營原則。馬華公會透過高壓政治手段徹底改變華文報原來自由經營的生態，同時亦扭曲了華文報紙原有的角色和功能。

從第一份華文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到今天《東方日報》出版，報紙的訴求及辦報目的與過去完全不一樣，唯一留存下來的就是和華人社會難分難捨的情意結。也因為華文報始終無法捨棄華社，在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社會中對自己造成不少困擾，來自各方的壓力限制了華文報成長空間。為了繼續生存，報社負責人只能因應社會環境的需求不斷改變目標和訴求，過去可以直接在報紙上討論的議題，也只能採用拐彎抹角的形式來表達，對華文報或整體華社來說無疑是一種傷害。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有關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論著並不算少，但絕大部份仍然以八〇年代之前的發展及

⁵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以下簡稱“馬華或馬華公會”）重要投資公司華仁控股在一九八一年買下《馬來亞通報》、公元二千年在華社反對聲浪中買下「南洋報業集團」、巫統投資臂膀「新海峽時報集團」在一九八六年購入《新明日報》。

華文著作爲主，例如中國學者王士谷的《海外華文新聞史研究》、方積根和胡文英（1989）合著的《海外華文報刊的歷史與現狀》、程曼麗（2001）的《海外華文傳媒研究》、馬來西亞學者林景漢（1993）的《馬華報業走向世界》、葉觀仕（1996）的《馬新新聞史》及新加坡學者崔貴強（2002）的《東南亞華文日報現狀之研究》。

八〇年代之後的華文報業發展，主要討論範圍集中在如《通報》和《新明日報》事件演變過程的描述，針對華文報肩負華人使命、維護族群利益、功能發揮等論述都流於一般性說法，報業經營權結構改變如何影響華文報延續華人使命的角色並沒有做太多說明。

崔貴強的《東南亞華文日報現狀之研究》是目前唯一一本提到馬國政黨收購報業集團的著作，雖然此事件再讓華文報回到學術討論的檯面，但討論仍然侷限在新聞自由和報業壟斷議題，對華文報本身的功能和角色同樣沒做太多論述，對釐清華文報主體性問題沒有太大助益。

在多族群社會環境中，華文報到底扮演何種重要角色？其對華人社會又有什麼樣的影響？無可否認新聞自由關係到媒體的健全發展，這個主題不能忽略，但放在馬國發展脈絡下來看，華文報主體性的本質問題對建構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及社群凝聚力上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這個焦點有助於我們瞭解華文報在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中的價值和地位。

有兩個主要因素影響學者的論述焦點，一是華文報向來不對外開放讓學者進行研究，視組織內部營運及組織文化爲機密，讓人沒有機會一窺內部營運狀況；二是大部份學者已經脫離報社時間太長，或是不曾在報社服務過，因此對報社運作情況只能依賴次級資訊來做佐證，缺乏機會深入瞭解和探索報紙所面臨的實質問題。

另外，在收購事件之前，華社都將精力放在華文教育議題上，討論的焦點也都集中在教育法令和教育政策，根本無暇兼顧華教以外的課題⁶，因爲比起華文教育，華文報顯然不是當下急於解決的問題，所以當時並沒有獲得華社廣泛討論。這也是後來收購事件中有人批評華社對兩個事件兩極化反應態度的原因。

研究者除了關心華社溝通平台被政黨取代之外，華文報結構經歷兩個階段的改變，即九〇年代報業集團和收購事件之後，過去所強調的華人使命、捍衛華人族群利益的精神是否還存在？過去華文報和華人社團、華文教育所構成的鐵三角定位是否已經分裂？這些疑問似乎很難從現有的文獻中得到答案，只有深入接觸各報內部核心及配合社會環境發展脈絡，才有辦法重建華文報在八〇年代之後的真實輪廓，從中尋找研究者想要的

⁶ 例如《中國報》和《星洲日報》被政府下令停刊、《通報》被馬華公會接管、《新明日報》轉售給馬來政黨事件、《星檳日報》及《建國日報》倒閉。

答案，並反思現代華文報業存在的價值、地位及未來該方向。

透過抽絲剝繭方式或許可以找到華文報的新定位，也可能驗證研究者對華文報未來所持有的悲觀論調，無論結果如何，都可以解開研究者心中的疑問及對華文報業的期望。

個人因素也決定了研究者選擇此題目做為碩士論文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者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服務長達八年，過去只將其當做一份養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從沒思考過華文報和華社的關係，甚至其在馬國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的重要性。一直到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集團之後，面對以馬來人為主導的社會環境和一群既得利益者組成的利益團體兩面夾攻下，才赫然發現華文報是如此的脆弱。

從事件中觀察到，一群既得利益者為了操控傳播權和成為馬來西亞報業大王，所謂的華社利益和華族尊嚴都可以棄之不顧，這些現象讓研究深深體會到必須回到報業的根本面，重新一步步、小心翼翼的檢視馬來西亞華文報到底產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又有什麼關係？這對研究者個人或華文報本身來說，都是一個重新瞭解「自己」的絕佳機會。

理想上認為，如果這群既得利益者能夠拋開自私自利的心態，也許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經營和發展模式，將是東南亞國家甚至是多元族群國家仿效的最好榜樣。同時研究者也希望藉此開啓一條研究馬來西亞華文報的道路，讓後續有意研究此主題的學者一個宏觀的輪廓可以參考，並針對各別特定歷史事件做更深入的研究，有助於馬來西亞華社建立一個完整且全面的馬來西亞華文報發展史資料庫。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從本文一開始的簡單描述，不難觀察到華文報角色定位等問題和當下社會情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辛亥革命時期的報紙分別代表保皇派和革命派兩股勢力；國共戰爭時期同樣有偏左或偏右的區別；國家獨立後華文報極積扮演爭取各項公民權益的角色等，都可以從社會發展脈絡中看出華文報角色轉變的原因。

研究者期能透過社會發展脈絡這一個前提去觀察華文報的轉變，並藉由以下七個研究問題來清楚瞭解從八〇年代開始至今華文報角色和功能轉變的原因。

- 一、馬來西亞華文報紙扮演何種角色？
- 二、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對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有何影響？
- 三、歷經八〇年代的多元發展、九〇年代的經營結構轉型及二〇〇〇年的政治勢力介

- 入，馬來西亞華文報紙的角色有何改變？
- 四、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如何因應角色的轉變？在多元文化的複雜環境中如何自我定位？
- 五、影響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角色改變的原因為何？
- 六、隨著政治社會環境改變與報業生態變遷，邁入二十一世紀的馬來西亞華文報紙的角色功能與過去的傳統論述有何差異？
- 七、馬來西亞華文報紙未來的角色與定位又是為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華文報是本研究探討的主體，所以在文獻部份先從報紙基本角色和功能談起，並進一步分析報紙做為一個中介如何影響及建構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知。另外，單從華文報發展脈絡角度切入，並不足以讓我們一窺報業發展內涵，須結合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環境背景資料才能整理出一個全貌。如果無視社會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只會讓自己陷入主觀判斷的陷阱，因此在第二節中，研究者將探討及解釋何謂多元社會及其意涵？由Furnivall所提出的多元社會這一個概念和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環境有何關連？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呈現何種特色？多族群社會產生何種問題？國內外學者如何評價馬來西亞複雜的多族群社會？第三節將釐清認同的概念，而認同和國家及族群間又會產生怎樣的關係？這和華文報紙的認同建構又有什麼關連？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等等，研究者都試著在以下文章裡一一回答。

第一節 報紙的角色和功能

在眾多以不同形式出現的大眾傳播媒介，報紙是其中一個歷久不衰的傳統媒介。發展至今已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環及最重要的資訊來源。報紙並非如同一般人所認知，只是一份附有文字和幾張彩色圖片構成及提供「報新聞」的產品而已。在某個程度上報紙提供了某種獨特的服務和滿足，如果那天不看報紙，就會讓人產生焦躁不安心情（杜力平譯，1992）。

報紙雖然比不上聲色光影俱全的電視，但相較於電子媒體的速食文化，報紙卻可以讓人有更多的思考空間，是瞭解社會變化的重要工具（張宏源，1999）。國內著名傳播學者李茂政教授（1987）指出，報紙的基本功能有四種，即報導新聞、解釋新聞、服務大眾，及娛樂大眾。陳石安（1968）認為從不同角度去觀察報紙產生的功能，都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例如增進知識、促進人類思想、文化的交流、促進社會及政治的進步。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功能在於「傳遞消息、為民喉舌、交流意見、倡導馬華文學、溝通民情、促進地方建設、鼓吹社會公益，尤其是在反殖抗日、獨立建國的艱苦道路上」（葉觀仕，1996:A24），在這些過程中付出了許多心血和精力。

壹、做為大眾傳播基本形式之一的報紙

DeFleur 與 Sandra 在《大眾傳播學理論》（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書中

指出，「雖然新媒介和以後可能出現的其他媒介對報紙形成了挑戰，報紙仍然是大眾傳播的基本形式之一」（杜力平譯，1992:67）。因為報紙的存在意義並非只是提供一般新聞而已，她所進行的資訊傳達等工作，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之大，已經超越做為一份「報紙」的功能，我們也不可能再用「報紙」這一個概念來解釋其功能和角色。

政治與傳播學者拉斯威爾（Lasswell, 1948）是「第一位清晰及系統規劃出傳播在維持社會的社會意義功能的學者」（Mcquail, 1994:43）。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三種功能（轉引自林東泰，2002:328）：

第一是守望環境的功能（the surveillance of the environment）：為社會大眾偵察、守望環境，隨時告知環境所遭遇、可能遭遇、或即將遭遇的危機、契機、轉機、和有利機會；所以又叫告知的功能（to inform）；

第二是協調各界對環境的反應功能（the correlation of the parts of society in responding to the environment）：協調溝通社會體系中的各個部門，藉以統合最佳的決策，以期待環境的變遷和挑戰有最妥適的回應；所以也有人稱之為「溝通的功能」（to communicate）；

第三種是傳遞文化遺產功能（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ocial heritag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一個社會體系的價值、文化、規範，要代代相傳，除了家庭、學校、同僚之外，大眾傳播媒體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個部門；因此，也有人稱之為「教育的功能」（to educate）。

萊特（Wright, 1960）在《功能性分析和傳播》（Functional Analysis and Mass Communication）一文中再加進了第四個功能，即娛樂（entertainment）的功能，其目的除了提供娛樂給社會大眾之外，亦有助於減緩社會緊張（McQuail, 1994）。

大眾傳播第五個功能—動員（mobilization）一字出現在 McQuail（1994:79）所著的《大眾傳播理論》（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中。所謂的動員即是「在政治、戰爭、經濟發展、工作及有時的宗教氛圍作用下，為一些社會性動機發動運動。」

另外，派克（Park, 1969）等人則強調大眾媒體的正面角色有助於新移民同化及融入新的國家。而 McCormack（1961）則認為，一個現代的、變動的社會必須被區隔開來……大眾媒體的獨特功能是提供產業及社會二者間一種統一性、經驗及整體意識的連結（轉引自 McQuail, 1994）。

貳、報紙做為一個中介（mediation）角色

在檢視報紙角色和功能之前，必須將她放入社會脈動之中以凸顯其獨特的內涵。當我們將報紙視為一種社會關係的中介的時候，也就代表報紙將成為一個具有極強生命力的有形物體，所有的社會共生體都必須透過報紙來和社會取得聯繫。

McQuail（1994:64）進一步擴大解釋這個中介關係，他認為「對大部份人而言，媒體上的資訊、影像及觀念是喚起他們分享過去時光及現代社會位置記憶、覺醒的主要來源。媒體也是他們記憶的儲存庫及指示我們在那裡、我是誰（身份）的地圖，與此同時，也提供我們未來方向的資訊……媒體是社會真實及公眾、社會生活分享等人生常態建構的延伸，它也是標準、模式及規範的關建來源。……媒體也是鍛造我們與他人共同元素的工具，因為我們現在分享更多共同的媒體來源及媒介文化。若缺少了一定程度的真實知覺分享，不管是原來的與否，就無法真正的組織社會生活。」

他的說法提到了認同的概念，這也呼應馬來西亞現實社會中，華文報和華人讀者的共生關係。華文報一方面藉由新聞報導來重新建構華人社會對馬來西亞歷史的認知；一方面讀者透過華文報瞭解華族的過去和現在，甚至透過報紙來尋找華族未來方向。彼此之間透過這樣一個溝通平台，共同建構華人願景和族群認同，甚至透過這樣一個機制來動員華社力量。

一直以來華社和華文報都維持著這種親密互動，例如一九八四年馬六甲州三保山事件、一九九一年柔佛州古廟事件及一九九六年吉隆坡廣東義山事件。華人社團結合華文報紙共同動員全國華族保護具有華人文化歷史價值的馬六甲三保山、柔佛古廟及吉隆坡廣東義山，經過華文報紙一系列有關保護古蹟的報導，華社進一步瞭解這三個地點對華族重要性和歷史意義。

McQuail 給了我們一個回答解釋為何中介可以發揮如此強大的力量。他認為中介本身就包含了許多隱喻（metaphors），「中介可以意指不同的東西，範圍由中立的知告，到透過協調去操弄及控制。」他列出以下六點來說明媒介透過何種方式讓我們和真實連結在一起，建構出閱聽人對社會的認知（McQuail, 1994:65-66）：

1. 事件及經驗的窗口，其中可延伸我們的願景、讓我們得以在沒有其他人的干擾下看到我們到底怎麼了；
2. 作為社會及世界中事件的一面鏡子，意味著一種忠實的反映。；
3. 濾器或守門人，讓我們選擇性注意及拒絕他人的觀點或聲音；
4. 指示、引導或詮釋者，為一些感到困惑或不連貫的事指示方向；
5. 閱聽人資訊及想法呈現的討論廣場或平台，有回應及反應；

6. 一道屏幕或障礙，意指媒介可能透過提供假世界觀、議題設定等方式，將我們從真實中隔開。

無可否認的是，報紙做為連接社會重要中介，在某個程度上他連結的不只是一般性問題，更多時候是為華社建構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Pye（1963）指出「後殖民時代中的發展及國家建設強調的是媒介融入到一個新國家認同中的貢獻」（轉引自 McQuail, 1994:73）。

第二節 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和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 （Multi-Racial Society）環境

壹、多元社會意涵

Furnivall 是第一位將多元社會區分出來的學者，它將多元社會視為「一種分開獨立的社會形式」（轉引自 Smith, 1965:75）。他觀察英屬馬來亞和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後，認為多元社會是包含「二種或更多各自生活、無法混合，且處於同一個政治單位下的元素（elements）或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轉引自 Hefner, 2001:4）。

Furnivall（1948:304-308）在另一本著作《殖民政策及操作》（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中也再次重申，多元社會是「具有不同社群，這些社群在同一個政治單位下各自生活，但是分開的……每一個群體堅守自己的宗教、文化及語言，以及自己的想法與處事原則，他們只有在涉及買賣交易的市場中才會以個人的形式呈現……就像一個邦聯般，與其說多元社會是一種與家庭有關的關係，倒不如說是一種生意伙伴（business partnership）關係，社會的群體間只有在他們普遍的生意利益前提下連結。」

楊建成（1982:2）認為，Furnivall 主張的多元社會即是「殖民帝國依經濟需要而塑造出來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把文化價值及社會制度相歧異的社群納入一個社會單位之內。這種社會缺乏內在的凝聚力（cohesion）易生衝突和暴亂」，尤其在多元種族國家，各族間存在著不同價值觀、信仰和社會行為模式「一旦任一種族試圖強加其本身的優勢價值於其他種族之上，則多元種族便無法再維持原來的和諧共存會產生衝突發生排擠」（Furnivall, 轉引自廖韶吟，1998:149）。

Smith 也進一步引用 Furnivall 的多元社會特徵（即文化多元性、社會分裂及歧異性），來分析多元社會的衝突模式（Kuper, 1969）。他指出，多元社會共有三個特徵（轉

引自葛永光，1990:30)：

- 一、多元社會的特徵，乃是文化的多樣性，社會的分裂，即意見的分歧。
- 二、多元社會的政治型態，是有某一單一文化族群支配其他族群。
- 三、文化多元主義社會，是由宗親、宗教、教育、經濟這些不同形式的非自願的人類制度的實踐所形成。

Kuper 認為 Smith 所謂的多元社會的政治形式是由一個單位所主宰，更精確的說法就是由一個主流文化或少數團所支配（轉引自張亞中，1997:24）。他指出如果「多元社會中不同的單位繼續實行他們不同的制度，包括政治，他們將因此建立分開且獨立的社會」（Kuper, 1969:223）。因此，多元主義塑造了「二種相當對立的社會特質傳統。第一種傳統是，多元社會的穩定性往往受到其中的多元群體間因不平等特質產生的分裂所威脅；第二種傳統則徹底的落實在（當年）美國社會」（Kuper, 1969:220）。

葛永光教授（1990）指出多元社會在本質上就會呈現文化異質性、缺乏價值共識和社會衝突的特徵。他指出，多元社會存在著許多「衝突基因」的事實，最終及最方便和快速的整合方式或稱之為問題解決方式，就是透過政府的插手干預。陳一香（1999）也同意，絕大多數的多元異質的社會都採取同化策略。

這種做法看似不僅可以一勞永逸解決族群間問題，在文化整合層面上更容易建構一個新的國家認同。但這種不尊重他族的同化政策，原則上就有刻意不區分各族文化的現實差異性問題，違反他族的生存環境和傳統。廖炳惠（1994: 22-27）認為，這「完全納入文化霸權的假民主，弱勢族群文化被迫收編或改主流文化所能接受的文化，……一味強調本身的文化有平等、一樣重要的價值，很可能溶入霸權文化的圈套，不是被孤立、中立，便是一再發展本身的偏見，……到最後，變成為立場及意識形態或政治的權力鬥爭，……在這種急進文化政治立場底下，其實是另一種極其霸道的邏輯，也就是要同質化，要他人的想法完全與自己雷同，……而且是以同一種標準（因為只有一個由自己設立的標準）去評定所有的文化成品。」這些談話結果完全符合馬來西亞現有的多族群社會環境，在下一節中將討論馬來人主導下的多族群社會和其問題。

貳、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環境

馬來西亞的多元社會表現在種族人口分佈、語言使用、宗教信仰、文化等領域（Embong, 2000）。Maurice Freedman（1960）在《馬來亞多元社會的成長》（*The Growth of a Plural Society in Malaya*）一文中也指出，要瞭解馬國的多元社會發展，可以透過四個領域來觀察，即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前者結合一些人口統計的要素，後者則利用馬來西亞三大族群，即馬來族、華族和印度族所涉及的領域做為分

析的界線，兩者共同之處就是嘗試利用 Furnivall 的概念來說明馬來西亞多元社會所呈現的多族群特質。換言之，在多元社會這個廣義的概念底下，多族群社會更能貼切形容和表現出馬來西亞的社會特質。

雖然 Maurice Freedman 當初是以馬來亞（獨立後稱做為馬來西亞）做為研究對象，但一直到今天，馬國政府仍然沒有一個有效的處理方式來解決各族在各領域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吳清德（1978）坦誠，馬國的社會環境並無迅速及容易解決的方案，也因此趙永茂（1996:15）將馬來西亞形容為一個「區隔和分裂（divided）的多元族群社會」，一語道盡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所面臨的困境。

馬來西亞由數十個不同種族組成，其中以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為多數。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03:7）在二〇〇三年第二季人口統計顯示，馬來西亞總人口數為二千五百多萬人，土著（Bumiputera）⁷佔全國總人口數的一半，即一千五百三十五多萬人，其中最大族群馬來族有一千二百六十多萬。華族則有五百九十九多萬人，印度人佔一百七十六萬多人，其他種族則有二十餘萬，非馬來西亞國民有一百六十多萬。因為族群人口比例關係，大部份學者在論及馬來西亞政治、經濟和教育等議題時都以三大族群做為主要研究對象，這篇論文也不例外。

族群結構在馬國是一個即定的事實，陳祖排（1980）指出，由於各族在人口比例上都佔有一席之地，所以種族糾紛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馬來學者沙列馬吉（1997）也指出，馬來西亞校園中常見一個現象像是「馬來研究者跟馬來研究者結群、華人研究者跟華人研究者結群、印度研究者跟印度研究者結群，大家以各自的語言開懷暢談」（轉引自高佩瑤，2004：72），各族間的互動被語言、種族和文化等因素給隔絕。執政黨將國內不同語言、宗教和文化族群一分為二，分成土著（bumiputera）和非土著

（non-bumiputera）兩大類。境內十幾個原住民有幸納入土著行列，但華人和印度兩大族群卻成了這道界線的犧牲者，也因為這一道界線改變了三大族群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上所佔有的地位。

馬國三大族群在脫離英殖民政府統治前，不管是在地理位置、職業及經濟活動上都有顯著不同」（Pong, 1993）。馬來人雖然大部份居住在鄉村，但在政治領域中無人可及；華人大部份集中在城市，在經濟領域成就非凡；印度人是勞動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資

⁷按照憲法分類，土著包含十三種以上擁有不同溝通語言、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馬來人也被列為土著的一種，但其人口數卻總總人口數的一半。除了馬來族以外，其他大部份土著都集中在東馬來西亞，在砂朥越有伊班 Iban 族、Bidayuh 族、Melanau 族、Kenyah 族、Kayan 族、Bisayah 族等；沙巴則有 Kadazan 族、Bajau 族、Murut 族、Kelabit 族等；在馬來半島則有 Negrito 族、Senoi 族、Proto-Malay 等（王國璋，1997）。這些土著有著各自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馬來人信仰回教，部份達雅人則篤信基督教；馬來人不吃豬肉，達雅人則以宰殺野豬做為迎賓的重要儀式，並以野豬肉為主要肉食來源之一。

源。一九五七年馬來西亞宣佈獨立，當初各族群政黨以協商和交換方式取得各自好處，例如「馬來人控制政府，得到一個以馬來風格（style）、馬來符號（symbol）為主的政體；而華人也得到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所沒有的待遇——公民權、有限的政治參與及擔任公職，更能保持他們的語言、宗教與文化特徵。這種共同同意的安排，使馬來西亞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得以維持相當穩定的政治局面……馬來人享有政治及政府職位的優先權而華人繼續住經濟上的優勢」（任元傑，1985:105-106）。

然而一九六九年「五一三種族衝突流血事件」（以下簡稱「五一三」事件）徹底改變了三大種族，尤其是馬來人和華人間的和平相處。事件平息之後，馬國政府隨即推行一系列政策，包括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等，都將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推向一元主義路線。其實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後，「馬來人對華人歧視也是寫在憲法裡」（麥留芳，1997:69）。

楊建成（1982:3）在一九八〇年完成《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論文中指出，馬國與眾不同的特點是，「第一，這是一個以華人與馬來人為多數種族兩極化的多元社會，這兩大種族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及社會制度，兩者之間極端缺乏共同性，很難進行種族同化與融合。第二，這是一個自一九三〇年之後逐漸穩定成形的多元社會，土生的移民後代大量出現。」他坦誠，這也為什麼以華人和馬來人政治關係為分析主題的論文，主要都集中在討論有關兩大族群在政治環境中發生的各種交往、競爭和衝突。

張亞中（1997:41）從多元文化整合角度分析馬國多元社會環境，他認為「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發展，基本上會逐漸向馬來人為主的單元的方向發展……」，最後的文化整合是面臨政府力量的干預，而這些干預在「五一三」事件更加明顯。

李美賢教授（2001）在「東南亞安全情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座談會上也指出，從馬來西亞華族和馬來人之間的種族矛盾顯示，「種族主義在馬來西亞短期還是難以消失」，顯示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和隱憂。

麥留芳教授（1997）指出，馬國前首相馬哈迪在過去要建立一個馬來亞國族國家，亦遭到許多學者的批評。早期「對於馬來人而言，一直以來都在尋求建立馬來族（Bangsa Melayu）」（張曉威譯，1998:27）。一直到今天，馬來西亞政府也並未放棄以馬來人主流文化主導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企圖。李錦興（1997）認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要求國族認同的特徵，應該是更少馬來人之特徵而更多其他種族的特徵」（張曉威譯，1998:33）。但國家實行的很多政策或核心思想並非如此，而是朝向單一語言、單一文化的目標前進。

馬國多族群現實社會環境出現的一族獨大的問題，也違反了泰勒（1994:64）在《認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一文中強調「讓不同文化在一個合理的界限下

自我保護……更迫切的需求是所有歧異文化都獲得價值平等的承認，我們不僅應讓它們生存，且承認它們的價值。」雖然前首相馬哈迪在第二屆世界福建宗親大會開幕中提到，「雖然馬來語是國語和官方語言，但馬來西亞接受多元文化，其他種族的語言與文化將可被保留。……更重要的一點是，他表示不同根源的人民不應該影響馬國的忠誠度」(張曉威譯，1998:27)，否認建立以馬來西亞文化為主體的國家，但從多項國家政策的推行，如新經濟政策、國家教育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獨厚單一族群跡象顯示，馬國確實要走向單一族群社會。

不利於多元文化發展的政策不斷通過和實行，政府干預下的多元文化整合，除了徹底改變過去各族佔據各自領域的結構，也完全消除了多元文化社會在馬來西亞實現的可能性，並導致往後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缺乏共識及不曾間斷的衝突場面出現。

第三節 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 (Nation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觀察馬來西亞社會環境時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現象，她是由三大民族和其他少數族群組成的多語系國家，但從國家政策的推行到落實，如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等，卻發現最大受益者都指向同一種族，即馬來族。這種現象如同陳中和所言，今天不論是用何種體制來界定馬來西亞，其結果都指向以馬來族組成的巫統，「就是馬來西亞政體裡唯一具支配性的政黨，而所有政治決策均由巫統作主導或甚至以巫統的主席（即首相）作為國家政決策的唯一中心」(陳中和，2001:81-82)。

換言之，今天的國家政策即等同於巫統決策，由巫統決定了國家的方向和未來。當國家由單一族群支配，各族間必會產生利益衝突，影響範圍之廣幾乎無所不包。以華人來說，首當其衝必是在經濟領域，再來是華文教育等。華社的訴求免不了會和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所制訂的政策有所抵觸，一旦這些訴求和「國家利益」有所不符時，華社往往被扣上反叛者的帽子，常被指責為種族間緊張情緒的「麻煩製造者」，而代罪羔羊往往是華文教育維護者和華文報紙。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曾對華文報紙做出嚴重的指責，「我當時指訴求工委會的要求有如共產黨，它們馬上指責我把所有華人當成共產黨，它們煽動華人的情緒，以致華人反政府、憎恨政府」(賴寶珠，2001)。

讓人不禁迷惑的是，今天的國家是否隱含了馬來人是主人和華人是寄宿者，或馬來西亞即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⁸的論述。在這個認同詭異的氛圍裡，華文報紙所建構

⁸ 此論點已遭巫統否定，並被視為在挑戰馬來人特權。

的族群認同基本上和國家認同是有所衝突的，不管在意識型態上或意指實質內涵上都充滿矛盾。各華文報總編輯被召見時，面對的也不是媒體專業詢問，而是充滿了種族主義的刁難。

雖然華文報幾度重申他們的立場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華人的族群利益為次，但在官方立場，除了聲稱國家利益不能侵犯之外，還包含了馬來人特權和優先地位不能被否定的種族意識。一旦國家認同被種族主義介入，行使權力必在國家之上，所有有關國家或族群的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因此，研究者為了避免陷入狹義的種族主義迷思當中，特別以「族群」代替「種族」來描述馬來西亞多種族的社會特質，期待以更理性的態度來面對上述提到的國家、族群和認同的概念，以及認同在這兩者之間所產生的意義和力量對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有何關係，以及報紙在這兩者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做更有系統說明。這裡所稱的族群主要是指馬來西亞三大種族——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並未包括其他原住民。

江宜樺（1998:6）認為國家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從廣義來說，國家即是「一切治權獨立的共同體」，從希臘的城邦到非洲的部落，都可以納入國家概念之中。相對狹義的說法，國家是「專門用來形容近代以後才出現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它同時表達了「治權獨立」的政治性格及「民族統一」的族群文化意涵。」

國家的出現必定是由一個或以上的族群所組成，甚少有國家是由單一族群構成，也因此，種族間的互動關係成了維持國家安定的重要因素。族群（ethnic）這字源自於希臘文的 ethnos，原意為異教徒（heathen）。

James Watson 及 Anne Hill（2000:105）指出，在社會科領域中，對族群的解釋是「一個社群的人們擁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一個族群的認同特性包括一種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俗與信仰，以及傳統文化。……一個社會可能包含幾種種族群體，也可能包含一些人種群體。現代研究集中的一個焦點，是探索媒體在種族認同上扮演的角色為何。」Tony Lawson 及 Joan Garrod（2001:85）進一步解釋族群這一個概念，他們認為族群是「一種建立在身份分享的社會群體特性。這種身份分享可能是認知上的，也可能是真實的，它建基在一種共同的文化、宗教或傳統因素上。」因此，族群所涉及的不只是生理上的同一性，例如膚色，尚包括文化等的同一性（何國忠，2002）。

王國璋（1998）指出，族群是一個社群單位（communal group），共同的原生特質（primordial differences）與文化屬性是形成「我族」（we group）意識的最主要力量，這和葛永光所言的原生感情是一致的，同時具有認同的意識在裡頭。

以上種種解釋和定義，說明族群的形成和文化是習習相關，而文化則是族群認同最

重要指標。陳一香（1999:149-150）認為「族群認同往往與其存在的社會制度和既定文化有著互相關聯、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一個扭曲的制度或文化不論對於個人認同或群體認同常具有毀滅性的影響……由於文化認同提供一個民族自我認同及情感歸屬的安全與依靠，因此，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未能在民主制度中得到應有的維護與尊重，成員中個人的自我尊嚴則容易受到威脅。」

這種認同除了依靠傳統或傳承機制來維繫之外，Charles Taylor（1994:34）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最關鍵的要素還必須依靠與他人對話或溝通方式來建構自我的認同，換言之，「我們對自我的認同，經常是透過和對我們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之間持續的對話甚至是抗爭而完成」（轉引自陳一香，1999:149）。

何國忠（2002:2）認為，在身份認同的討論中，共有兩重意義，一是「個體必須能透過具體的生活實踐辨認出一己身份之所屬；另一方面，個體在自我確認的漫長過程中又無法不受別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與否所影響。」這種認同如同 Manuel Castells 所言，「認同所建立的是意義，……涉及了自我建構及個別化的過程」（夏鐸九、黃麗玲等譯，2002:6-7）。

認同意義的產生符合社會學的觀點，即認同是建構的，其組成成份主要有集體記憶、生產與再生產的制度（夏鐸九、黃麗玲等譯，2002）。

在族群認同裡，最重要的構成成份是族群的名稱，陳志明（1996:3）指出，族群名稱是「一個族群在一個區域與其他族群來往和受大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所影響的歷史產物。」江宜樺（1998:15）認為，族群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由於客觀血緣連或著主觀的族群身份而對特定的族群產生的一體感，譬如猶太人在千年流離中，靠的就是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來維繫某種共同體的存在。」

族群認同靠的是成員間維繫關係，C. Geertz 指出，其中最重要機制在於集體認同，「這才能使族群具有實質的意義及動員的力量，族群之間的關係是衝突或和諧取決於國家所制定的族群政策」（轉引自侯政宏，2001:11）。換言之，集體認同是成員中最大的行動力量，而族群認同也必須依靠這個機制來完成民族使命。

許多學者在論及族群認同這一概念時，都存在著原生論或稱根基論（primordialists）及工具論或稱環境論（circumstantialists）的爭辯。提出原生論學者包括 Clifford Geertz 和 C. F. Keyes，他們強調族群認同的主要基礎就是建立在族群內部與生俱來的情感，即「來自於「天賦的」（givens），或更精確的說，文化必然會涉及這些要素，假設「天賦的」社會的確存在……這個天賦是源自於出生在一特定的宗教社群，說一特定的語言，或甚至一種方言，以及特定的社會實踐」（Geertz, 1996:41-42）。

C. F. Keyes (1981) 也同意組成原生情感最主要部份是文化的認同，同時是與生俱來的（轉引自載萬平，1997）。他們都說出原生論最重要的概念，前者直指族群特性是建立在族群的「天賦的」基礎上，這種「天賦的」擁有不可言喻的強制性，而 C. F. Keyes 則指出「共同祖裔」對族群建立的重要性（陳美萍，1998）。

葛永光（1993）也同意 C. Greertz 有關認同是最原始和最初的感情的說法，並認為會隨著一個人直到永遠，不會改變。但隨著環境的變化和追求族群利益時，族群認同的腳步會有所調整以配合當時社會環境。

工具論倡導者有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他們強調族群認同「是後天地受到主觀動員才分化產生（吳祖田，1999:94）」，是「一種被用來做為促進族群利益的工具」（徐振興，1992：18），並且「可以隨環境而改變的」（陳美萍，1998:11），同時也「可以藉由族群界限的擴充或收縮而改變」（轉引自載萬平，1997:26）。

族群認同同時包含原生論的文化認同和工具論的社會關係兩個重要因素，那一個因素較重要則需視「環境的影響和所造成的認同困難而定」（徐振興，1992:18），並非固定不變的。陳志明（1996:10）也說，族群認同「追根究底是人民在特定的政治與多族群的環境裡所構思的集體認同。既然它是構思的概念，它當然可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情況而調整」，這一個說法是無需質疑。

但王明珂（1997:41-45）則覺得原生論和工具論都有明顯的缺失，「前者沒有解釋原生論感情聯繫如何產生、如何維繫、如何傳承；後者則沒有交待人類的多元社會分群方式（social groupings）和族群認同有何差別，他提出以人類學家 E. E. Evans-Pritchard 在《努埃爾族》（The Nuer）著作中提出的「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和「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兩個概念，重新思考形成人群凝聚與重組的「親親性」（netopism）的本質。」

王明珂（1997:58-59）解釋說，在「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環境，除了提供結構性失憶滋長的溫床外，也往往促成原來沒有共同「歷史」的人群，以尋根來發現或創造新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新族群認同……社會現實造成的利益環境，是激起某些集體記憶的主要動因。這些集體記憶由社會精英提供，並藉由種種媒體傳播，以強化人群間的根本感情。但對個人而言，被社會現實壓抑的過去，並不表示完全遺忘。它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無意的或刻意的被保存著……這些文獻、文物與人物言行，成為社會記憶中隱藏潛伏的一部份，等著在往後的社會變遷中被憶起，被賦予新的詮釋，成為凝聚新族群的集體記憶。」

張茂桂（1993:235）指稱，「一個族群的特質，就是他們自覺到自己所共同擁有的起源，或者文化、或者語言腔調、或者社會關係，是有別於其他的人或其他的族群……它

有一個主觀意識及行動的層面……所以我們發現族群的特質常常是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說，族群認同天生已註定「是一個不停界定我族、分別他族，依此延續生命的擴張過程」（莊靜怡，2003:11-12）。族群特質和族群意識都是建構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這也就是為什麼陳志明（1996:7）會認為「大馬華人的認同受到華人與馬來人的族群關係所影響。華人族群意識是在大馬的多元族群社會的環境所形成。馬來人的族群意識也如此」最主要原因。

戴萬平（1997:30）指出，「僅有族群認同而沒有族群意識，族群仍不可能成為族群態度的傾向和行為的變數。」張茂桂在（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一文中所強調的族群特質就是指一種自我意識到的文化及歷史的特質，這和黃有志提出的同類意識（consciousness of kind）相當類似。黃氏（1994:83）認為，「同類意識在族群中是很容易被喚起的情感與認知，因為就人類本身而言，在探索自己並追問自己是誰時，會很自然聯想起與他自己本身類似的人群來，尤其是體質上的特徵，最易產生認同的效果，其次則為熟悉的行為模式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也是族群認同的重要依據。」

何國忠（2002）也認為，將華人的自我認同放到政治領域中去討論，即華人相對於馬來人，華人形象才會凸顯，感覺才會強烈。戴萬平（1997:29）不否認，若從政治發展角度來看，「族群認同所可能造成的結果就是對國家認同的歧異。」這現象似乎無可避免的在這種獨特的多族群社會環境中滋長，進而導致各族間的緊張關係越拉越緊。

江宜樺（1998:15）指出，基本上國家認同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multidimensional concept），但仍然可以分成三個主要面向來談，即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例如「有人聯想到的是「流著同樣血液」的血緣或宗族關係，有人則著重「親不親，故鄉人」的鄉土歷史感情，另有人則會強調主權政府之下的公民權利義務關係。」換言之，江氏所謂的國家認同其實必須借助這三個層面來構成，前兩者都建立原生論基礎上，而後者制度認同，其實可以等同於政治認同，並且是建立在工具論強調的利益基礎上。簡單來說國家認同就是「需要知道自己屬於哪一個國家或認同於哪一個國家……國家認同是所有集體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面，因為沒有了國家就像斷了根的蘭花，再怎麼燦爛也迅即枯萎」（江宜樺，1998:14）。

就馬來西亞華人而言，獨立國家認同由中國為祖國轉而認同當地居留國，但這也只是指移民社會的第一代而言。侯政宏（2001:37）指出，馬來西亞宣佈獨立對當地華人社會來說，是一個歷史上的轉捩點，「獨立促使移民群華人開始放棄傳統的祖國觀念，建立居留地的本位意識與效忠精神，雖然原本華人都保持與中國息息相關的鄉土意識，但是自獨立後馬來亞的國家意識逐漸在華人社會滋長……積極投入馬來西亞多元社會，這使華人的社會意識與國家觀念趨向確定。」

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的衝突，始自早期移民社會，也可以說這個「衝突基因」從有華人移民社會時就開始。王國璋（1997）在《馬來西亞族群政黨政治》一

書中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殖民政府在馬來半島實施馬來族優先權的政策之後，華人逐漸感受到來自馬來族群的政治壓力，其中包括馬來人視華人是外來者的觀點，「我族」和「他族」的區隔變得更加明朗化。

李錦興（1997）也指出，「雖然華人開始視馬來亞（獨立前）為新的家園，馬來人則堅持，接受他們的條件是在於他們對新祖國忠誠度的表現。……他們被要求接受新國家的符號，然而對於這些符號的範圍，多少華人的特色將被納入其中，有不同意見，許多年來這已成為種族間關係陷入緊張狀態的起因。」（張曉威譯，1998:32）隨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土著主義橫行，透過官方文書中統計資料形塑，「馬來西亞人」遂予外人以概分為土著／非土著二類的觀感」（王國璋，1997:37），這種壁壘分明的區分，更加深了馬來西亞族群的緊張關係。同時，華人的身份認同危機也在這時候出現，馬來西亞華人一方面馬來西亞人，另一方面則又是馬來西亞華人，這種身份無可避免地被分割開來，如同何國忠形容，「兩者一方面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又被逼分開」（何國忠，2002:11）。

雖然陳志明（1996:7）以「馬來西亞各族群適應了馬來西亞的多元社會與國家制度，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看不到的共識」，樂觀的評價馬來西亞族群關係。無可否認，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在平時並無多大問題，只要不碰獨教育、政治和經濟等領域時，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可以讓華人無憂無慮，可以帶著馬來西亞護照輕鬆自在周遊列國，一旦碰觸上述領域，他們就會被迫披上華人身份，面對的是種族主義的責難，而不是以馬來西亞人的對等身份在討論國家政策。

馬哈迪在一九九六年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馬來西亞是個多種族國家，我們最重要的課題是，形成對國家的認同，並接受有不同種族同胞這個事實」（蘇育琪，1996:36），但國家政策的不公平對待，與上述談話似乎有所出入。

馬來西亞華人最大的疑問在於為何原是全體國人利益的國家政策，最後卻是在圖利某一個族群？受益者永遠都是馬來族？而擁護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也被當做煽動族群情緒，讓華人社群不免懷疑國家領導者的別有用心，所謂的國家認同難不成就是認同單一馬來西亞文化、單一馬來語言和單一馬來習俗。不僅出現國家認同的矛盾，就連族群認同也產生危機，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華人做為國內第二族群和馬來人做為國內第一大族群，是否一定要接受如陳志明（1996:7）所說的「少數族群往往須適應大族群的文化支配與國家語言和教育政策」的說法？或可不可能在公平情況下共同享受國家資源？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很簡單，如同 Van Maanen (1982) 所言，質性研究方法好比一支大雨傘，似乎什麼都可以放到這把大傘下面去談，實際執行起來卻得消耗研究者大量精力和時間。研究者必須面臨從四面八方湧來的龐大資料量，接收之後再依照研究主題慢慢、小心翼翼分類及歸納，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這篇論文採用質性研究最主原因在於馬來西亞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各族群間擁有獨特且唯一生活型態，唯有透過質性研究，才能在不同的生活型態裡找尋各別的特色，一探其原始面貌。質性研究最大的特點在於——找尋意義和建構過程，並在一個互動的過程當中，嘗試去詮釋複雜社會現象且賦於其意義（劉仲冬，2002）。

王雅各（2000:26）指出：「質性研究是一個建立在研究者和參與者充份互動基礎上的探討方式。……並且在研究的過程中觀察、學習、體認、包容和欣賞被研究者的認知架構。」在這一個基礎上去觀察社會脈絡，因為「質化研究者強調社會脈絡對瞭解社會世界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某個社會行動或陳述的意義，有很重要的成份，是視其所出現的情境脈絡而定」（朱柔若譯，2000:613）。

除了瞭解現象的社會情境，和重現真實世界之外，質性研究最主要目的，如同陳向明（2004:104）所言，「是對研究的現象進行解釋性理解，而不是為了某些假設進行證實，因此應該選擇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來說有意義的問題。」

第二節 深度訪談和次級資料分析

在平面資料缺乏的環境中，深度訪談是觀察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最好的方式之一，再來便是次級文獻資料。前者的親身體驗這有助於釐清西馬來西亞華文報在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的生存方式和其存在的價值；後者則可以利用過去學界或業界的觀察，來檢視訪談內容的真實度及補充訪談不足地方；反之也可以利用訪談內容來驗證次級文獻的可信度。如同 Charles Ragin (1997) 所言，次級文獻「涉及用文獻下載真實事件、記錄人們

所說過的事物（或是文字、表情、與語調）、觀察特定的行為、研究書面的檔、或是檢閱視覺影像。這些都是世界的具體層面」（朱柔若譯，2000:609）。真實世界所發生過的一切，都可以透過受訪者和過去的歷史資料來重新活現在紙上，並利用這個機會，「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劉仲冬，2002:121），並「帶領讀者進入某個社會背景的主觀世界與意義體系」（朱柔若譯 2000:930）。

以下部份將針對深度訪談的方法上和技術上對論文研究的幫助、訪談資料收集和分析及深度訪談的樣本選擇三個要點來談。第二段落將針對次級文獻資料對本研究的重要性提出說明。

壹、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

一、方法上和技術上優點對研究的幫助

Roger 及 Joseph（1991:122）認為：「深度訪談最重要及優點在於的可以提供豐富的細節。此外，和其他傳統調查方法相比較，深度訪談在敏感課題上，提供更多精確的回應。」

陳向明（2004:127）指出，如果要「瞭解當事人的想法和意義建構、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與從觀察中獲得的資料進行相關檢驗等，深度訪談是一個適合的方法。」如同前面提到，馬來西亞在華文學術研究相較於其他中文語系國家，仍屬於初生嬰兒階段。目前除了黃國富撰寫的碩士論文《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為例》是以學術角度論述之外，絕大部份有關華文媒體的研究仍屬於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因此採用深度訪談是唯一解決的途徑。

這次訪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首先按照每位受訪者的屬性和職業層級來擬定題目。在訪問過程中讓除了按照既有題目訪問之外，也讓受訪者針對某個議題自由發揮、暢所欲言。同時不斷調整訪問問題次序，讓受訪者對新提出的內容做更詳細的說明。靈活運用題目可讓自己避免陷入呆板、公式化訪問的陷阱，畢竟新重點的發現所代表的意義大於一定要訪完題目的迷思，因此有時準備的題目只用到一半。

深度訪談在技術操作面上，也給研究者帶來許多方便，在操作上並無特定一套公式（rules），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和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上皆有不一樣的操作方式（Victor, Rosalie, Eric and Loris, 1995），訪問者只要記得一些訪談上的技巧和問題，就可在任何時空下利用深度訪談法做適合的研究。以馬來西亞許多受訪者來說，習慣於面對面交談多過於利用其他方式，對於較熟的報業同事，可以採取更輕鬆的聊天方式進行訪問，比起一問一答制式訪問可以消除受訪者不必要的防備。

另外，訪問對象有十二位是媒體或企業界高層主管，在突發狀況裡，深度訪談可以做出即時反應，立刻選擇最重要的題目展開訪問；在時間掌握上，研究者和受訪者有更多彈性空間，例如前《南洋商報》編務委員會主席兼總經理郭隆生在訪問開始前突然告知必須縮短原訂的訪問時間，這時研究者就可以按照題目的重要性做先後秩序的調整，或是直接切入重題開始訪問。

二、訪談資料收集和分析

這次訪談全程採用錄音方式，並事先告知受訪者，一方面尊重受訪者，另一方面儘量做到符合學術研究中的道德倫理規範。有些課題屬於內部作業討論範圍或種族敏感課題，錄音方式的確會引起部領受訪者緊張不安或戒心，有時會刻意修飾回答內容或在譴詞用字儘量美化。最主要原因是一來當事人不希望製造更多不必要風險，二來部份受訪者仍擔任媒體工作，或與報社仍有利益上往來，有些就不能做太多說明或索性避而不談。

從訪問聲音檔全文擷錄的文字檔共有十三萬九千多字，由於質性研究非常強調「資料本身的特性來決定整理和分析資料的方法」（陳向明，2004:129），所以收集到不同資料所採用的方式也不盡然相同，往往只能根據資料有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或根據過去學者採用的方式，或個人過去的經驗來想想自己可以用那種方式進行分類和分析。因此，研究者就根據轉錄的文字檔參照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編碼秩序來完成編碼的動作。

首先進行一個開放式的編碼（open coding）建立一個大的類目（category）。以第六章的蛻變中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為例，將所有有關華文日報改變的訪談內容全都放進去，之後利用同軸登錄（axial coding）在主類目中分出次類目建立新的層級，例如蛻變中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受到內在環境和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變化，並重新審查是否有手誤放錯類目，這一個步驟對再下的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為在這階段裡是要將兩個相關性的點做扣連。選擇編碼是編碼的最後程序，主要在凸顯文章中心概念最重要的環節，必須小心翼翼將類目和研究主題扣連起來，例如蛻變中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的外在環境受到政黨和財團勢力等的牽引，影響報紙的營運方式，也改變華文報在馬來西亞存在的價值和地位。

另外，從訪談內容去嘗試瞭解受訪者與其社會背景和經歷是否具相關性，從相關性中找尋談話的意涵，例如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集團總編輯洪松堅在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之後便受邀擔任總編輯一職，他曾在星洲日報服務數十年，故其談話內容相較於其受訪者是比較傾向《星洲日報》和馬華公會立場，這無可厚非。這種相關性思考有助於研究者在進行資料可信度的檢驗和比對作業上做客觀性的判斷。與此同時，不同職務和經歷也有助於研究者在樣本選擇上能呈現多樣性和獨特性。

三、深度訪談的樣本選擇

如同前述，有些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是可以預知的，也就是說談論方向是研究者可以預先掌握。以東方日報市場有限公司報份促銷經理呂堅強為例，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後，他被迫離開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所以他對政府和既得利益者的批判可想而知是非常犀利和尖銳。在問題規劃上就可以按照事先對受訪者背景的瞭解做更詳細的規劃。

訪談樣本依據每個人過去的經歷和現任的職位來做區分，受訪者共分成兩大類，即媒體工作者和學者。媒體工作者再細分成內容決策者和經營者兩類（見表一）。例如星洲日報副總編輯鄭丁賢過去一直以來都專注在評論和一般採訪，升上副總編輯之後仍繼續擔任評論撰寫員，訪問題目可針對他在不同時期所感受到的自由評論空間做深入瞭解，比起其他受訪者可能會有更深層的體會。

再來就是質性研究中特別強調的獨特性或唯一性。以郭隆生為例，目前雖然不在華文報中擔任職務，但他曾利用市場行銷概念結合報社編務方針成功的為《南洋商報》奠下在馬來西亞華人心目中重要的地位；另一位受訪學者陳亞才，過去是華社活躍份子，後來積極參與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行動，結果被報紙列入黑名單，禁止所有有關他個人的言論或照片出現在報紙版面，所以他在華社、華文日報和政黨的三股勢力的角力有更深刻的感受，這些都是本研究選擇樣本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另外，當年華文報百花齊放，一位新聞從業人員曾在兩家或兩家以上報紙服務過的情形並不少見，所以會有部份受訪者曾在同一家報社服務過的現象，但這並不影響選擇他或她做為研究的樣本。

三組受訪者除了擁有共同題目之外，研究者還另外擬了一組與他們經歷及工作有關的題目，確保訪問問題能直擊重點，多樣性的內容有助於資料的靈活應用，不致於流於形式化或表面化。

因為研究題目的關係，十九位受訪者當中有十七位居住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及雪蘭莪州（Selangor State）的八打靈再也市區（Petaling Jaya City），此這些受訪者都在馬來西亞接受訪問。另一位在台灣臺北市進行，還有一位遠在英國倫敦，基於成本考量，這個樣本改採電子郵件形式訪問。此外，在補充資料上因研究者返台關係，在二〇〇四年八月四日分別以四封電子郵件寄給四位報社總編輯，即朝日報業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南洋商報》總編輯鐘啓章、《東方日報》總編輯潘友來和《中國報》總編輯莊宗南，但至八月二十五日為止只有《中國報》總編輯莊宗南有覆函。

另外，由於訪問時間的安排比較緊密，所以出現其中四位受訪者訪談時間重疊，即黃超明和楊白楊，以及莊宗南和鐘啓章，因此研究者特別邀請一位曾經擔任過記者的研

究生代為訪問黃超明和鐘啓章兩位。

另外研究者也對原始受訪名單做了些許的改動，例如莊宗南並沒有在最初受訪名單中，因為原先擬定好由前《中國報》總經理及夜報總策略人周寶振做為《中國報》代表，後來周氏拒絕受訪，臨時改由曾在《中國報》服務超過二十年的莊宗南總編輯填補空缺，這個改變並不影響樣本的效度，最主要原因在於莊氏當年也曾親身參與《中國報》出版，是《中國報》最資深員工之一，他同時也是夜報策略重要成員，見證了《中國報》由家族、企業集團及政黨經營的轉變，是個不亞於周氏的重要樣本。

在初擬名單中也捨棄了反對政黨收購南洋報業工委會秘書黃進發，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黃氏目前仍在英國深造，一時無法取得聯繫。如果要和他做訪問必須採用電子郵件，用電子郵件有很多缺點，其中最大問題在於沒有互動過程，內容取得有其侷限性，加上此訪問方法已用在學者莊迪澎身上，且黃氏、莊迪澎和陳亞才身份上有多處重疊，故不得以只好捨棄黃氏。

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特殊人事互動環境裡，部份新聞從業員較排斥就職於其他報紙的新聞從業人員；也有些受訪者相當低調，開始時並不願意接受訪問，尤其是談論收購事件等敏感議題，但這次訪問在一些不具名的好朋友協助下，順利約到絕大部份關鍵受訪者，有些和研究者是師生關係，故一些障礙都可以排除，成功和受訪者做近距離的面對面交談。

表一：受訪者名單、職務、經歷、受訪地點及時間一覽表

受訪者	現任職位	經歷	類別	受訪地點	訪問時間和日期
蕭依釗	朝日報業有限公司集團 總編輯	星洲日報 助理採訪主任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2/4/2004 12:30pm~13:00pm 共計 0.5 小時
鄭丁賢	星洲日報 副總編輯	星洲日報 記者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2/4/2004 11:am~12pm 共計 1 小時
許 春	星洲日報 總編輯	星洲日報 採訪主任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2/4/2004 10:00am~11:00am 共計 1 小時
黃超明	無	前南洋報社 董事經理	經營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3/4/2004 10:30am~13:30pm 共計 2 小時
郭隆生	泛馬大彩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員 (CEO)	前南洋商報編務 委員會 主席兼總經理	經營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4/4/2004 9:30am~10:30am 共計 1 小時
彭早慧	Page One 圖書顧問	前中國報 總編輯	內容 決策者	台灣 臺北市	14/6/2004 14:00pm~15:30pm 共計 1.5 小時
呂堅強	東方日報市場有限公司 報份促銷經理	前中國報 採訪主任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4/4/2004 14:00pm~16:00pm 共計 2 小時
黃明來	東方日報市場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	前中國報 總經理	經營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4/4/2004 14:00pm~16:00pm 共計 2 小時
莊宗南	中國報 總編輯	中國報 副總編輯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5/4/2004 9:30am~12:00pm 共計 2.5 小時
鐘啓章	南洋商報 總編輯	前首相馬哈迪 華文秘書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5/4/2004 10:00am~12:00pm 共計 2 小時
洪松堅	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集團 總編輯	星洲日報 副總編輯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7/4/2004 10:00am~11:00am 共計 1 小時
潘友來	東方日報 總編輯	前中國報 總編輯	內容 決策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6/4/2004 11:00am~12:00pm 共計 1 小時
陳亞才	元生基金會 執行長	前華社研究中心 主任	學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7/4/2004 16:00pm~18:00pm 共計 2 小時
莊迪澎	無	前新紀元學院媒 體研究系 系主任	學者	英國倫敦	10/4/2004 16/5/2004 採電子郵件

受訪者	現任職位	經歷	類別	受訪地點	訪問時間和日期
葉觀仕	名人出版社 社長	前韓新新聞學院 副院長、前建國日 報總編輯	學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3/4/2004 15:00pm~18:00pm 共計 2 小時
林景漢	韓新新聞學院 院長	光華日報 編輯	學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3/4/2004 18:00pm~19:00pm 共計 1 小時
朱自存	無	前南洋商報 總編輯	學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2/4/2004 16:00pm~18:00pm 共計 2 小時
楊白楊	無	前中國報、東方日 報等華文報 專任評論員	學者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3/4/2004 10:30am~13:30pm 共計 2 小時
林金樹	大馬新聞資訊學院 副院長	星洲日報 國際翻譯組	學者	馬來西亞 雪蘭莪	19/4/2004 13:00pm~15:00pm 共計 2 小時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次級文獻資料分析

質性研究的效度常被人懷疑，畢竟很多時候是透過觀察和自我詮釋的結果，有人會提出質疑並不出奇，如何增加質性研究的效度是對研究者最大的考驗。本研究主要研究主體是馬來西亞華文日報，資料收集主要集中在描述相關馬來西亞情境。雖然是別人的研究結果，但其重要性不容小覷，如同前述，次級文獻可以檢視訪談內容的真實性及補充訪談不足地方，尤其是一些受訪者離開報界太久，對某個特定的歷史事件記憶非常模糊，這些問題都可以參考過去學者所做的研究做比較完整和系統性的說明。

本研究次級文獻的主要來源有以下幾種：

- 一、學術期刊，例如東南亞季刊；
- 二、專書，例如馬來西亞、台灣，以及中國學者撰寫有關馬來西亞報業、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書籍；
- 三、雜誌，如亞洲週刊；
- 四、電子報，如中國報電子報、星洲互動網等；
- 五、碩士論文；
- 六、紀念刊物，如如南洋商報的光輝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等等。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研究者將在以下從地點選擇和時間選擇說明本研究之範圍。

壹、地點選擇

本研究礙於馬來西亞國土一分為二的地理因素，在人力和物力上無法負荷，只好捨棄東馬來西亞（以下簡稱「東馬」）華文報，鎖定西馬來西亞（以下簡稱「西馬」）以吉隆坡為主要發行地及每日發行的華文日報為主要研究對象，另外還有以下幾個重要因素：

- 一、吉隆坡為馬來西亞首都兼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 二、當時華人人口集中的城市如檳城州、怡保市和馬六甲州也都有區域性華文報，到目前為止，除了檳城州的《光華日報》之外，其他報紙在八〇年代之前就全部倒閉；
- 三、發行網遍佈全國各地的華文報都以吉隆坡為總社，其影響力遍及全國，以《中國報》和《星洲日報》為例，兩報已突破地域限制做跨國發行。
- 四、在獨立前後創刊的華文報，目前僅存四家，且都以吉隆坡為中心，同時首都的銷量居全國之首。

貳、時間選擇

選擇研究日期選擇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至二〇〇四年最主要原因有以下四點：

- 一、馬來西亞華人編輯協會正式成立：華人編協正式成立表示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正朝向一個有組織性和專業化的道路前進，和過去華文報業辦報目的有著極大不同；
- 二、政黨及企業集團介入報業營運及報業集團成形：馬華公會收購《通報》、新海峽時報集團收購《新明日報》、具有政治背景的馬來西亞青年團結運動團體收購《建國日報》、豐隆集團收購南洋報社集團屬下《南洋商報》、《中國報》和《生活出版社》旗下十餘家雜誌、砂勝越州常青集團收購《光明日報》及《星洲日報》組成朝日報業集團、砂勝越州啓德行集團創辦《東方日報》等，在短短的二十年內將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塑造成一個龐大的報業集團；
- 三、華文報紙報份大幅增加：從八〇年代開始，馬來西亞的報紙銷量大幅成長，一九九八年至公元二千年甚至是華文報發展巔峰時期。報份銷量和當年的全國大選、安華事件、立百病毒事等社會環境有著相當密切關係。

四、 積極參與文化事業及注重包裝企業組織形象：南洋報業集團成立出版社積極出版著作、《星洲日報》舉辦國際性花蹤文學獎、《東方日報》舉辦學術研討會等等，都希望藉由這些文化或學術活動提高報社知名度和形象，開始注重包裝企業組織。

第四章 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性

西馬來西亞華文報紙（以下簡稱西馬華文報或華文報）的讀者結構與台灣、香港和中國有所不同。馬來西亞由三大族群及數量較少的其他種族所組成，各族使用的語言均不相同，華文報的讀者群從古至今都以華人⁹為主，因此比其他國家華文報多了一份維護華裔族群不被侵犯的使命。

馬來西亞自一九五七年獨立至今，這個使命仍然是華文報重要的生存條件之一，也是華人社會所共同期許的願望。學者楊白楊認為，華文報和華文學校一樣，

是掛著一個中華文化的金字招牌，享有特殊的地位……。

華文報經歷不同的時代背景，如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自我認同即是建立在某種對中華文化根源追尋的基礎上，這些情感認同即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認知過程。獨立之後，祖國認同的轉變並沒有立即打斷這種認知，只不過隨著社會結構的複雜化，建立在文化根源上的主軸意識，逐漸因族群結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她可能代表一種權力結構或力量。

歷經國家政策多次變動和族群結構板塊移動，華文報地位在華社和政府眼中沒有多大改變，她仍然是一份屬於華人社會的報紙。但在九〇年代之後，執政當局不再單純將她視為一份傳達華社訊息的報紙而已，而是一份可左右華社意見，甚至影響執政黨地位的報紙。如鄭丁賢所言：

華文報在馬來西亞這樣一個環境產生，不只是他擁有讀者而已，基本上你有這個人口的話，這個人口代表著是一定的一種權力的一種結構，他可能是政治上的權力、社會上的權力、經濟上的權力，所以呢，在這種因素的互相影響之下，華文報也有一定的價值，好比說經濟上的價值、比如說政治上的一種參與、或者政治上發揮的力量等等。

當局對華文報的重視始於一九九〇年全國大選，以巫統為首的執政黨開始對華文報的影響力感到驚訝。當時整個社會充斥著對「兩線制時代」¹⁰的期待和幻想，覺得終於有一股強大和可靠的在野力量來對抗國陣政府，希望藉由這種力量來壓制國陣政府的傲

⁹ 這裡所指是至少擁有基本閱讀華文能力的華人，因為擁有多種教學語言體系，所以造成有些華人只懂得方言、英語和馬來西亞語，對華文一竊不通。

¹⁰ 有關兩線制的論著可參考祝家華碩士論文《種族威權民主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之形成與結盟——大馬兩線政治的評析（1985—1992）》及王國璋（1998）的《馬來西亞族群政黨政治》。

慢與自大。與此同時，華人社團中重要領袖¹¹也都加入反對陣線，在這之前華社除了提出著名的《華團宣言》之外，以馬來回教徒為主的回教黨也成立華社諮詢委員會爭取華人社會的認同和支持（王國璋，1998），這些議題都獲得華文報大肆報導。星洲日報總編輯許春指出：

以前的時候……他們不太理你華文報，他們認為說這只是你們族群的報紙，你影響來影響去就是你們自己的族群的人。……那一年反對黨，特別是行動黨大勝，那時候也是沙巴團結黨退出國陣……國陣政府突然間驚醒，發現到原來中文報的影響力是這麼大的。

政府對華文報影響力的認知改變提昇她在馬國的地位，相對地許多政治干預手段也開始出現。馬來西亞治國手段向來被視為是一種族群政治或政黨政治概念（楊建成，1982；王國璋，1998；林若雱，2001；黃明來，2003），這意味著在任何時候政黨個人主觀意見、族群意識型態可以取代理性思考。因此在他們眼中華文報所代表的意義不再是一份簡單的「華人報紙」，她被視為一個反對政府、煽動族群、破壞國家安寧的工具。面對政治人物和既得利益者雙面夾攻下，為了取得政府信任和華社支持，華文報企圖在馬來西亞華文報和華人社會的華文報兩者間重新尋求定位。

學者莊迪澎也覺得華文報的重要性有一種「被迫上梁山」的感覺。他認為：

中文報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族群政治鬥爭的結果。在英文及馬來西亞文報紙，華文教育及文化事業沒有說話的空間，而華文教育及文化又是華社認為很重要的民族事業……，因此他們寄望於通過華文報業傳達他們要說的話。

華文報夾雜在政府和華社之間尋求重新定位時，是否會影響其使命或做為報紙所應展現的功能？先天性種族結構問題及後天政治勢力的干預，使華文報在指責聲中只能以彈性手段來處理三方的衝突。畢竟華文報希望保持中立立場，一而再再而三的調整扮演的角色無非是想做個理性的調解中介，這種態度與過去敢怒敢言、勇於批判政府的形象有極大差別。

第一節 定位和角色扮演

華文報的重新定位並沒有改善她和政府或政黨之間的關係，反而讓馬華公會趁虛而

¹¹ 如著名華文教育運動先驅林晃昇、現任新紀元學院長柯嘉遜、著名政治評論家李萬千、律師楊培根等人（王國璋，1998）。

入掌控報業營運。今天華文報給予讀者的印象只有兩種，一是類似黨報，一是政府的喉舌。在面對華社指責往往以國家利益或法令約束做為藉口，如大選訴求、宏願學校等攸關華社利益的課題，在官方和政黨的壓力下採取妥協態度，減少對事件的評論和報導以保護自己，這種犧牲華社利益的做法即和《通報》在關鍵時刻站在馬華公會立場批評華社是一樣的。

事實證明單一族群領導下的多族群社會環境，華文報根本沒有對抗的餘地。面對種族主義充斥的意識型態氛圍中，華文報只能選擇迴避策略以自求多福。這種妥協態度充份表現在報導題材的轉換等策略上，繼續妥協的結果是永遠無法改變華文報紙逐漸變質的角色、地位和價值。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研究者將就華文報的市場和政治定位、維護華社的天生使命、及責任等做個說明。並交待她在華社和政府之間到底存在那種微妙關係，對執政黨和華社來說到底有多重要？

壹、市場和政治定位

從商品化角度來看，報紙充其量不過是一家報社在市場上販賣的其中一種產品。華人社群市場是華文報最主要的讀者來源，因為只有懂得閱讀華文的讀者才會去購買華文報，因此當年無需報導太多的娛樂新聞或社會新聞，華人社團活動就足以應付所有版面。

隨著華人經濟圈的壯大，華文報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單靠社團新聞並不足以滿足華人社群對資訊的要求。因此市場被劃成多個區塊，鎖住特定消費市場是華文報重要工作。前《中國報》總編輯彭早慧提到說：

當年《中國報》創刊時其實是看到馬來西亞華社的環境，那個時候的我們發現少了比較走小市民路線的報紙；另外那時候的環境，剛好遇上大選和黨爭，馬來西亞市場應該還可以養得起一家走華社小市民路線的報紙，……因此中國報就從這裡開始。

區隔市場概念被廣泛應用之後，多家華文報紛紛調整版面內容或加強本身的強項，例如《南洋商報》加強經濟報導、《星洲日報》增闢大都會版提供關懷社會的新聞報導，面對廣大讀者群拋出的各項訴求，如同《東方日報》市場行銷董事經理黃明來所強調：

這是一份健康、乾淨的報紙、強調版面上的清新、內容上強調並鼓勵華社走向一個獲得更開放式的世紀裡面，將來可以走向一個更富有、更加健康、更有競爭力的下一代。所以我們提供的資訊基本上都是經過篩選的，我們在報導方面

儘量做到各各角度，讓各門各派各種聲音出現，並創造一個很好的百花齊放的平臺。

許春指出，《星洲日報》是一份比較嚴肅的報紙，他們利用報紙版面來區分各階層不同讀者的喜好。他強調：

我們有一些固定的編務方針，黃色的我們不報導、不渲染血腥。……我們有很多感性的新聞、民生的新聞，這些就是我們強調的。還有副刊走比較高層次的文藝、文學類；還有更高層次的，如星期天的星洲廣場，那是更嚴肅、知識份子看的，所以一份星洲日報幾乎都可以提供任何一個層次讀者想看的東西……。

南洋報業集團總編輯洪松堅則提到，他們除了重視商業新聞之外，也同時發展屬於年輕人的課題。他認為：

例如做了個小開本的娛樂版、副刊，走軟性的路線，改變過去商報給人比較嚴肅、比較呆板的印象，還有一些電玩、手機、數位相機，即年輕人比較注意的潮流……。

雖然各報強調各自的賣點和訴求，基本上仍然以讀者興趣為主要導向。前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主任莊迪澎表示，各報內容還是以符合大多數讀者的品味為主。他指出：

雖然馬來西亞中文報紙還不至於像港台一些同業那樣以聳動情色新聞刺激銷量，但是篩選新聞時仍會以他們認為讀者較喜歡的社會新聞（兇殺案、災難、其他罪案等）爭取讀者，處理（寫）新聞時則以最簡單的寫法，……因此中文報紙並不是「引導讀者」，而是「跟著讀者跑」。

從市場行銷觀點來看，報老闆以讀者喜好做為標準並不為過，更何況每年商家投資在報紙廣告上的總金額就高達一百九十六億新台幣，其中華文報達八十億之多（見表二），是馬來西亞所有媒體廣告投資報酬率最高的一類（見表三）。對企業財團來說，面對如此龐大市場或許比維護華人使命更具實質意義。也可能報老闆認為只有解決生存的根本問題之後，才有能力維護華社使命，畢竟如何生存是個非常現實的大問題。

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華文報當然不能否認自己是馬來西亞的一份子，更不能否定她對國陣政府維維諾諾的事實。因此莊迪澎認為，華文報在強調市場重要性之外，不能不表明支持國陣政府。他說：

對一些政治議題的炒作、拿捏，則以馬來西亞文或英文主流媒體為參考對

象……其中又以馬新社馬首是瞻。……馬新社是官方新聞社，根據馬新社的角度報道國陣的政治新聞「最安全」，即使出了婁子，責任也是馬新社扛。

因此，在報導上儘量避開反對黨的新聞，這種偏袒一方的做法在收購事件之後變本加厲，華文報過去所堅守的立場完全消失，這個定位的調整也埋下了和華社衝突的伏筆。

表二：馬來西亞各華文報歷年廣告收入（以馬幣計算）*

報紙 \ 年份	1996	1999	2002
星洲日報**	1 億 3741 萬	1 億 5124 萬	2 億 4024 萬
南洋商報	1 億 1745 萬	6981 萬	9096 萬
中國報	7634 萬	8286 萬	1 億 2115 萬
光華日報	4202 萬	4256 萬	5852 萬
光明日報	1067 萬	2427 萬	3001 萬

資料來源：劉敬文（2003-6-28）。華文報逾八億收入。東方日報，今日專題版。

*一元馬幣換八點九七元新台幣。

**未包括東馬來西亞。

表三：馬來西亞各類媒體歷年廣告收入（以馬幣計算）*

媒體 \ 年份	2000	2001	2002
電視	9 億 3567 萬	8 億 7812 萬	9 億 2188 萬
報紙	18 億 6619 萬	19 億 3637 萬	21 億 8560 萬
雜誌	1 億 3117 萬	1 億 8285 萬	1 億 5806 萬
電台	1 億 196 萬	1 億 1968 萬	1 億 4414 萬
戲院	965 萬	1139 萬	974 萬
其他	3356 萬	2873 萬	2829 萬

資料來源：劉敬文（2003-6-28）。華文報逾八億收入。東方日報，今日專題版。

*一元馬幣換八點九七元新台幣。

貳、天生使命：維護華社利益

一九五七年創刊的《通報》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停刊前一天刊登一篇「停刊，不是我們的初心」社論，裡面提到「在馬來西亞，一份華文報紙比一般媒體負有更多一層的社會文化責任，這一點只能以民族使命略加概括」（葉觀仕，1996:165）。文中充份反映出馬來西亞華文報所肩負的使命及責任，也因為這股力量讓許多華文報前仆後繼的在馬來西亞展開「神聖辦報之旅」。林景漢為華文報天生使命下了個定義：

反映和維護華社的利益、為華社爭取權益、爭取不平等或行政的偏差……。

獨立之後，華文報面臨最大的國家認同問題，即原先稱中國為「我國」轉而改稱馬來西亞為「我國」，這個轉變成為馬來西亞華文報尋求新角色定位的重要分水嶺。換言之，這個時空的轉換使她徹底重生成為一份「道地」的馬來西亞華文報。

在短暫性的認同錯亂時空中，有人選擇回到中國，有人則繼續留在馬來西亞當個「道地」馬來西亞公民，但華文報並未因此而中斷或改變其所肩負的華人使命。除了主要新聞版面以地方新聞取代中國和世界新聞之外；在政治立場上，華人政黨、華人社團和華文報的首要任務便是重新建立新國家認同和透過政治協商方式爭取華社權益，例如華文報曾結合華人政黨發動爭取華人公民權運動等。學者林金樹回憶說：

例如《星洲日報》說我們要變成本地人，我們要融入本地社會，我們就要拿公民權，我們應該效忠這個國家……。

更重要的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報業正式分家所產生的馬來西亞化效應，讓華文報更親近華人社會。如同前南洋商報總編輯兼學者的朱自存所言：

政府規定國內報紙本地人必須超過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強調馬來西亞化，所以只好將股權賣給本地人，例如社團領袖。所以當時的報紙內容多報導華社的訊息，他們代表華社、講華社的話，他們又是華社的代表人。……有點啟發華人作用，也表達了華人的政治立場……。

華文報認同自己所肩負的使命，就如同 C. Geertz（1963）所說的「天賦」，亦如同呂堅強所強調的「自然」。他認為：

這就好像馬來西亞華團或華教一樣……華文報就代表了我們華人，幫華人講話，……學校裡的老師也不會跟你說這些，這是很自然的……。

因此，華人社會的族群認同是建立在這種共同文化價值的基礎上。

雖然在獨立前夕國家行政體系有了巨大的轉變，以馬來人為主的政治官僚體系挑起了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的「衝突基因」，首當其衝的是華人公民權合法性問題及華文教育問題。當時華文報捍衛和動員華社共同維護華文教育的鮮明立場和強烈的族群意識型態，在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瞬間形成。雖然國家政策和華社捍衛運動加速了馬來西亞社會出現「我族」和「他族」之分，但在政黨收購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捍衛的使命感仍然相當強烈。前南洋報社董事經理黃超明也認為這種根深柢固的天生使命，就算在豐隆集團接手後亦不會因此而改變。他強調：

基本上都會延續著華文報一路來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會說我接管了以後，會叫

你不要繼續談太多華人文化，沒有。

對華文報而言，堅守立場和肩負華人使命是一場永續的戰爭。在強調多元文化理念的現代社會中，這份執著更顯得重要。許春強調說：

不管在那一個階段，我們都很重視這一點，就是我們關心華人社會，這是一個大前提，要怎麼做是一回事。

他並不否認在每個不同的時代和階段裡都有一套不同的做法。

鄭丁賢認為華文報有責任去捍衛華人族群的權益，是整個華文報業或媒體人所該有的核心價值。他舉例說：

你不可能說今天你支援宏願學校，或認為不必設立一個華文大專。基本上這個核心價值必須去維護。……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帶有一份使命感，或者帶有一種歷史的包袱，當然是說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她的整體演進和華人社會脫離不了關係，……她有很沈重的歷史包袱，她也有她族群本身要尋找出路或出口的一種驅動力，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之下，報紙不可能說跟這整個歷史背景和文化使命感脫節。

鄭丁賢續說，因為華文報處在一個族群權益的中心位置，所以在談論和族群權益有相當密切關係的議題時，華文報的角色即會極其明顯。他指出：

不管是《東方日報》、《星洲日報》或《南洋商報》也好，關係到民族權益的部份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乖離的，或者有任何的猶豫的，要不然會受到華社的背棄……。

大家都一致肯定華文報在過去捍衛華社權益運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歷史也給了證明。然而今天面臨南洋報業被政治力量強制收購的衝擊下，各華文報是否仍能堅守其華人使命？還是在政商權力結合下華文報只能改變既定立場，選擇附和？又或者如同許春所言見招拆招？這些答案對華文報或華社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華文報的立場影響著馬來西亞五百多萬華人的未來和前途。

參、功能發揮：扮演傳達和溝通橋樑，亦是角力戰場

報紙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扮演傳達和溝通橋樑的角色。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是華人社群最重要資訊來源；對執政黨而言也是瞭解華社想法最重要的工具。她不僅是華社

和官方之間交流的重要中介，更是華人民間社團和華人政治團體之間不可或缺的溝通及建立族群間集體意識平台。

黃明來進一步解釋這個平台的功能。他認為：

假如我們能秉持原有角色、功能的話，其實她可以扮演更大功能和角色。華文報不應該是一個法官，而是提供一個平臺，讓民意、資訊自由的流暢，讓民意互通，讓政府能夠透過華文報反映和瞭解，他也應該扮演教育群眾，提供群眾良好資訊和健康資訊的非常重要的管道。

馬來西亞畢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多元種族，在多元種族裡，華文報有他生存的空間，她是可以輔助現有的華基政黨政治上的分歧、華團的分歧、宗教上的分歧，甚至教育背景的分歧，而扮演一個中性的角色，這角色是歷史演變所看得到的，而不是當初創造目的——可能只是為了營利。

將華文報視為一個公共討論空間的最大好處，是允許各種意見的交流，透過這個機制，對華社來說有助於華社資訊的整合；對政府而言，能夠修改一些政策以有效改善族群間緊張關係，以及減少政府和華社之間產生不必要的誤會與摩擦。這樣的一個運作機制曾經出現過，最具代表性者可算是馬六甲州三保山護山運動¹²，透過華文報和華社、華人政黨三大勢力的結合，才使州政府收回發展三保山政策。

我們看到了華文報做為傳達和溝通橋樑的效果，但平時這三者之間是如何進行互動呢？之間又會產生何種問題？這部份將在以下做進一步討論。

一、與華社之間的溝通

報社和華社之間靠著一股自然流露的情感聯繫著，兩者緊密互動關係並未隨時光而流逝，這一切都歸功於當時的社會環境。黃超明指出：

當時需要一份報紙當做聯絡的橋樑……所以他們要辦一份華文報在他們之間相互聯絡，以及他們的祖國（指中國）的概況……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沒有華文報，華人社會之間怎樣去互通消息？如何去組織起來去面對當時的殖民地，以及後期以馬來人為主的聯盟政府對華人教育和華人文化的壓力。

正因為當初這種共同意識，創造了華文報和華社之間不可言諭的親密關係。同樣的

¹² 一九八四年馬六甲州政府要將三保山作為商業發展用途，結果在全國華團號召下，華人社會展開挽救三保運動，華文媒體大肆報導，最終在輿論壓力下，州政府放棄這項發展行動。當年這個運動震驚全國，是動員華社力量最成功的其中一次。

如果沒有得到一方的配合，單靠一個團體或一份報紙的力量是不夠的。潘友來認為華人社會權益維護或爭取需要依賴報紙報導來互傳訊息。他說：

這還是相當重要的，……通過報紙如何將訊息放送出去，甚至給其他團體都感覺到這東西大家都在討論，是不是很重要。可能因為這樣講一講，他也去組織裡拿出來談，起碼將重點報導出來大家都會注意到，會帶動。

林金樹也坦誠，馬華公會的配合和華團立場堅定也是非常重要，報紙不可能單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件事。他覺得：

你去發發文告，或者登一些文告，我看現在反而作用不大，我發現很多事情，他們在內部協商影響比較大，我不覺去吵吵鬧鬧義山就可以保留得住……。

無可否認，如果沒有報紙的配合或是主政者沒有很巧妙運用報紙特有長處，華人政黨、華社或華文報有再大的能耐也無法突破本身的侷限性，這三者之間必須相互依賴才能完成華人重要使命。

華社之所以相當依賴華文報另一個原因在於官方媒體或主流報紙，如馬來西亞文報、英文報及國家電視台等並不在意華社動態，除了一些私營電視台，如 NTV 7 有晚間華語新聞及華社動態的報導之外，其他電視台幾乎都以官方新聞為主，造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華人仍然以看報紙來瞭解時事（陳亞才，2004）。

擅長於研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報業史的葉觀仕指出：

英文報他不會理你也不會去刊登這些訊息，但華文報會收到很多社團的稿件，對促進社團¹³的聯繫，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華文報是社團訊息傳達的唯一管道，因此也形成了過去社團新聞一直是華文報¹⁴主要新聞來源的現象。雖然現在新聞版面上的社團新聞變少了，但主要的華人團體，如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與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以下簡稱「董教總」）、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以下簡稱「雪華堂」）等社團及屬下的委員會，仍然是各華文報報導和交流的重要對象。莊宗南認為，華社團體和華文報的交流關係可以解決組織上或社會上許多問題，包括取得收購事件上對華社造成困擾的諒解。他指出：

比如說最近華總屬下的民權委員會，他們就來和我們交流。他們希望華文報能

¹³ 除非是屬於全國性較大型及有邀請重量級政治人物的社團活動，才可能有機會見報。林金樹受訪時表示，現在華文報也不太報導社團新聞，他說：「如果活動沒有邀請部長來，媒體就不來採訪，就說不夠人手；如果說部長來了，我只寫部長講什麼，連會長講什麼或者我們要搞什麼活動就一個字都不提。」

¹⁴ 在東馬地區的華文報和《光華日報》等地方性報紙，新聞版面至今仍然還是以社團新聞為主。

扮演橋樑角色，儘量把民權的訊息散播到民間。

黃明來指出，華文報向來是華社用來溝通和能夠依賴的重要工具，尤其是馬華公會代表華社的角色越來越式微的時候，華文報成爲一個連結政府和民間之間非常重要的溝通橋樑。他說：

之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這個橋樑是給馬華這些政黨所壟斷的。

因爲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從獨立初期馬華公會領袖擔任內閣要職，到今天在內閣接任一些無關痛癢的職位中明顯看出，馬華公會的勢力和地位在執政團隊中漸被邊緣化¹⁵。面對來自華社的信賴和認同，華文報取代華人政黨成爲華社重要的溝通工具。華社一方面透過報紙聯繫族群間情感，另一方面將很多理念和願景藉由華文報傳達到各個角落，甚至透過報紙來動員華社力量保護華人歷史文化，馬六甲州「三保山護山事件」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華文報吃重的角色在收購事件之前顯得格外耀眼。

二、與政府、華社之間的溝通

華社透過華文報進行溝通是一種訊息的交流，相對地華社和政府之間透過華文報所進行的交流卻隱藏著協商談判的味道。很多時候政府會故意透過華文報來試探華社對國家政策的反應，教育政策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從獨立後的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一九六〇年拉曼達立報告書、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等一直到八〇年代教育部宣佈全國各華文小學實行 3M 教學制度，再到教育法令第 21（2）條文（曾慶豹，2001），都是用這種試探方式。華社採取的捍衛行動只有兩個途徑，一是透過董教總和政府協商，二是報紙上發表和總結華社的意見。嚴格來說，此時華文報的角色已成爲政府和華社之間權力角力的平台，例如前副教育部長韓春錦曾透過《星洲日報》對董教總向華文報透露有關華社創辦的三家私人學院¹⁶的註冊准證無法更新表達不滿，韓氏認爲這並不是解決問題最好方法（星洲日報，2000）。

在某些特定議題上，政府和華社之間的角力並不表示華文報可以置身事外，做爲華

¹⁵ 林若雱（2001）在《馬哈迪主政下的馬來西亞：國家與社會關係（1981-2001）》著作中指出，馬華公會在一九五九年全國大選來臨之際，向巫統提出兩項建議，一是馬華公會的候選人名額須佔國會議席三分之一；二是華文教育議題須納入聯盟（國陣前身）競選綱領，但都被巫統拒絕。巫統掌握馬華公會的「命門」，採取打而不擊方式削弱馬華在國陣的力量。這種方式有助巫統一黨獨大掌握權力。

雖然馬華公會在第二〇〇四年新內閣成員中獲得的官職是歷年來最多，即從原來的四名部長、七名副部長及二名政務次長增加到四名部長、八名副部長及四名政務次長（郭淑卿，2004）。但和當年陳修信在內閣擔任財政部長長達十年，証明華人社會在國家的經濟地位和力量（楊建成，1982）相比較，馬華公會勢力已昨日能相比。

¹⁶ 即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及馬來西亞藝術學院。

社一份子，華文報無可避免的會被捲入角力戰場，例如前首相馬哈迪政治秘書鄭文傑在接見《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和《中國報》高層人員時表示希望各報能「與他共同解決華社的敏感課題，而不是先在華文報紙上大事報導……將一些課題突出不能為華社帶來好處。他強烈暗示，華文報必須將華社所挑起的課題直接交給他們處理，華文報無需針對這些議題廣泛報導」（中國新聞網，2001）。

一九九八年爆發的「立百病毒」（Nipah Virus）事件，也是一個官方機構、馬華公會、在野黨、養豬業華人和華文報之間角力賽的例子。衛生部在當時是主責單位，曾下令及召見各華文報總編輯有意阻擾華文報報導相關新聞¹⁷。民主行動黨主席林吉祥（2003）也曾發表文告批評當時的衛生部長蔡銳明「阻止媒體報導初期被誤指為日本腦炎、後來證實為更危險的立百病症蔓延的新聞。如果有關蔓延新聞在初期即獲得報導，則超過 100 人死於立百病毒的悲劇便可能不會上演，而國內的 24 億元養豬業被不必要摧毀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由此可見這種干預對華文報和華社來說都是一種傷害。

彭早慧回憶當初衛生部召見，她認為這種溝通方式最主要是讓媒體知道衛生部的處理進度及方針：

也就是說讓我們可以更明白及掌握到他們工作的方向，以便把訊息帶到民間（指華社）。

媒體人都將召見戲稱為「請喝咖啡」，這種方式在華文報早已司空見慣。從掌管報紙出版准證的國內安全部（Ministry of Internal Security）到一些華裔政治人物，都喜歡利用召見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和個人利益。單從正面角度來看，召見可以讓華文報直接面對事件主導者，可以和「有關大人物」直接辯論華文報立場，有助於釐清某些議題的報導底線和方向；報社主管可以免於終日惶恐擔心被政府以各種法令起訴，華社多少也可以掌握一些政府想法和態度，例如前首相馬哈迪政治秘書鄭文傑在接見《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和《中國報》高層人員後，各報「高層編輯對會談所得到的印象是，華文報不需要面對馬來西亞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尤其是內政部副部長曹智雄的監督」（中國新聞網，2001）。

其實官方也很需要透過華文報來瞭解華社的動態和訴求。近十幾年來，官方開始關注華文報的報導¹⁸，他們注意到華文報在華人社群中形成一股很強的力量，洪松堅說：

肯定的是，如果不是的話他為什麼要找我們？他不重視我們為何要找我們去對話呢？

¹⁷ 因為是養豬業關係，所以在「立百病毒」事件中受害者全都是鄉村從事養豬業的華人，華文報紙的報導數量相較於其他語言報來說就比較多。

¹⁸ 後期官方對華文的重視也表現在國家政策上，例如向來以馬來西亞語和英語為主的國家訊社《馬新社》，也在二〇〇四年設立中文部，提供華文版新聞給全世界中文語系國家（中國報，2004）。

另一方面，執政當局認為透過華裔政黨有時無法明確的全盤瞭解華社的需要，畢竟某些政黨為了自身利益，對一些議題多少會「動些手腳」。部份有心解決問題的政治人物，也希望透過報紙和華社進行直接的雙向互動，以取得正確資訊，例如馬哈迪曾聘請兩名華裔秘書，即是希望繞過華裔政黨直接和華社及華文報溝通。兩位秘書中有一名精通華文，即是現任南洋商報總編輯鐘啓章。鐘氏在受訪時表示：

前首相是覺得他和華文媒體之間都缺乏一個瞭解，當然我最重要的任務還是把這個首相的思想、政策能夠透過媒體向華社來宣揚，希望華社能瞭解並減少誤會，也消除這個恐懼。……可能他認為如果透過政黨來傳達的話，沒有那麼的直接，這也是我被委任成為他的新聞秘書的最大因素。

莊宗南認為這種安排不能說會帶給華社多大改變，因為要看這些秘書的「修行」有多高。無可否認的是，有了一個和華文報及華社相同屬性的溝通管道，比起非華裔秘書更容易溝通：

畢竟如果由馬來人和我們來談，有些東西會談得比較含蓄一點。畢竟族群利益不同，大家想法也當然不一樣。委任華裔政治秘書之後，大家都是同血緣，比較可以溝通和談多一點。

一些學者和報社負責人樂觀的認為，這種交流有助於將華社的問題傳達到高層。另一方面國內安全部都有小組負責每日翻譯新聞稿或評論稿供當局參考，政府透過這幾種方式可以多瞭解華社感受，以針對某些政策做部份修改。葉觀仕覺得：

如果華社好好利用這樣一個管道的話，他可以傳達訊息給政府。……政府內部的政策決策人就會知道，他知道你們社論寫的是什麼？這還包括批評，他在做出決策的決定時，可能要考慮華社的反應或問題。

黃明來也指出：

政府很多時候是通過華文報瞭解到華社的感受，然後在政策上做出能夠符合華社願望的調整，……所以在促進國民團結也好，種族和諧方面，我們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但執政當局的重視有好有壞，潘友來即認為：

好的話是一些聲音能夠傳到政府裡面去，壞的話一般課題玩得太厲害成反效果，他們會給你一些意見。總言之華文報的影響力終於給政府看到，從當時只

在民間到現在政府看到。

許春也覺得過去政府只將華文報視為一種屬於華人母語的報紙（vernacular newspaper），並刻意忽略華文報的存在。但現在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在重要活動上都會請他們擔任官方指定媒體（official newspaper）；有利必有弊，他感受到華文報力量所帶來的壓力。他承認：

馬來西亞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所以當他發現你影響力這麼大的時候，那種箝制你的言論自由的行動就來了，他就會注意你的評論了。

像前面提到的，國內安全部的召見往往都是給予可以報導、不可報導或者是要求如何報導的指示，這種指示往往比較容易遵循。最令華文報擔心的是一些政治人物有樣學樣，並且是用種族意識型態及自私自利的態度來解讀華文報報導。

以巫統為首的執政黨向來對華文報及華社（特別是華文教育份子）的忠誠度抱著猜疑的心態。前首相馬哈迪即曾不只一次在公共場合公開譴責華文報煽動種族情緒、是共產黨。他在巫統黨代表大會上對所有巫統黨員表示，華文報紙在大選期間為反對黨助選是玩弄種族火焰，並用嚴厲的語氣質問華文報，何時才會消除他們的自卑感（亞洲週刊，1990）。一年後面對「馬來西亞華人社團大選訴求」所引發的「馬來人特權風波」，馬哈迪再度指責訴求工委會是共產黨（星洲日報，2000）。

從這些談話可以得知，華文報和華社及政府之間的相處並不如像想中理想，即算有意解決問題的國家領導人，在某些時候意識型態還是主導了個人的理性思考。在馬哈迪眼中華社和華文報都是社會動盪不安的製造者，三者經常處於某種競爭狀態。陳亞才用標準三角形來形容三者的三角關係，他指出：

第一個部份就是媒體、第二個是官方或者是政府的政策，第三個華團或華社，他就產生一個這樣的互動狀況……官方認為說這個華團是比較極端的華團，或者是常常跟政府唱反調的華團，媒體在報導這個華團的時候，他就無形中面對官方一種有形無形的壓力，也就是說你報導他的新聞很多或者處理得很大，媒體就感覺到可能說官方會認為說我很刻意支持華團，好像跟政府唱反調……。

其實三方都希望能透過華文報傳達正確訊息，一來可以避免政治意識型態的干擾，二來可以達到良性溝通的目的。但往往事與願違，有時華文報是按照一般專業標準來處理新聞，並沒有刻意去凸顯某一議題或某一族群利益，可是只要繼續追蹤報導或採取顯著版面處理一些衝突場面，即會被執政當局當做是反政府的麻煩製造者。

其實華文報紙無需政府的告知，做為一個中介，報紙自然會思考什麼是國家利益、

什麼是族群利益，並不會凡事爲了反政府而反對政府或刻意挑起種族情緒。經歷「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之後，華文報更不會如此輕率的在多族群社會中製造混亂，相較於馬來西亞文報及巫統政治人物，華社及華文報的言論因此顯得更加自制和理性。但基於結構性因素，例如經濟領域以華人爲主，公務領域則以馬來人爲多，兩者之間的衝突並非建立在種族因素層面，而是職業結構差異層面，由於族群領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常被人解釋爲種族因素使然，這種困境就如同鐘啓章（2004）所言，官與民之間一定會有道距離，而華文報理應肩負搭起橋樑的角色。

雖然鐘啓章的結構性說法無法有效改善三者之間的關係，但站在華社立場，華文報往往希望透過一些比較中立客觀、光明磊落的方式來做說明，比起馬來西亞文報的種族意識型態領導專業來得更加理智。華社也認爲有些內容並不適合做直接的面對面交談，因此希望透過得到華社信任的華文報將訊息傳播出去，讓執政者瞭解華社心聲，可惜華文報立場在政黨收購之後卻完全變了調，再也無法保持較獨立客觀的立場爲華社爭取權益，這個問題仍然是華文報甚至整個華社感到最無奈的事。

肆、終生責任：維護國家安定和族群融合

華文報不像華文教育，做爲一個商業機構必須要有一定的盈餘才能繼續出版報紙，尤其強調專業分工現代化管理年代，需要龐大資金才能應付每日正常運作，要維繫和堅守華族使命直到永遠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報社一方面得顧及商業利益，一方面又不能忘記天生賦予的華人使命，重要的是更要將自己視爲國家安定及族群融合的守護神，經營華文報的苦處非外人所能想像。

彭早慧（2004）指出二千年之後國家穩定是各報的訴求，也是當局的要求，許多仍在新聞線上的新聞工作者在受訪時都異口同聲表示，國家利益、安定及族群融合是華文報紙現在和未來所要達成的目標，如何增進各族和諧、取得諒解，是當年各家報社最主要的工作和目標，基本上這也是華文報的共同認知和集體意識。這一要點和二千年之前所強調的經濟議題有明顯不一樣。前南洋商報總經理郭隆生面對編務人員時都表示要將國家利益擺在最前端，而非族群利益。他說：

沒有了國家有民族也沒用，我們自己再怎樣強，國家很弱也沒用。

在這個概念前提下，他還一手策劃各族群和睦共處親善攝影比賽，利用照片來凸顯馬來西亞各族間的融洽。他指出：

從這樣一個思考方式觸動我，認爲可以用圖片來協助促進種族的和諧，所以我就策劃了一個民族親善的攝影比賽。比賽規定照片一定要能夠反映各民族和睦

共處、互相幫忙……這種潛移默化長期下來一定會有幫助，各民族可以互相幫忙、和睦共處……我就覺得馬來西亞華文報應該扮演這樣一個角色，當各民族關係很好的時候，國家經濟就能發展……。

黃超明也指出：

華文報和國家的關係不用懷疑，沒有國家就沒有華文報，所以在維護族群基本利益的同時，華文報也要儘很大的力量。

拋開部份政治人物用意識型態治國的方式，社會安定訴求是各族所追求的理想目標，鐘啓章也認為國家安定、族群和諧是促成國家經濟繁榮最主原因：

因為社會一穩定下來，各項發展計劃、經濟發展、教育發展各方面都能夠順暢的去進行，而首要的當然就是種族和諧、社會穩定，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報紙……不管是英文報也好、馬來西亞文報、華文報也好，我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要維持這個國家社會穩定和種族和諧。

華文報的國家安定及族群融合集體意識有助於加強華人社群情感，甚至如同林景漢所言：

可以用來團結各民族，用中文來灌輸愛國的意識，鼓勵包容、容忍。

不過在執行層面上，莊迪澎認為華文報的報導多流於表面化，例如馬來人開齋節、印度人大寶森節或屠妖節，華文報常自認為這類新聞多加報導即可增進族群和諧，他覺得這是非常膚淺的做法，華文報應該成為一個社會啓蒙者。他解釋說：

也就是讓它的讀者更多地認識什麼是多元族群政治，為什麼多元族群政治才是華人或其他少數族群得以進入政治主流的選擇等等。這是馬來西亞中文媒體從來沒有擔當的角色。中文報業其實是逆向而行，成為族群政治模式的保護者。

綜合多位受訪者意見，華文報在維護國家安定和族群融合上的努力是不容質疑的，這不僅僅是一種同業中的共同認知，亦是做為一份報紙應該肩負的責任。同時維護族群和諧並非只是表面上的「說說而已」，必須落實教育和訓練民眾目的。

第二節 族群認同、信任和凝聚力的指標

由三大民族及少數民族共同組成的多族群社會環境，各族群在各自領域中展現獨特的風格，以華族來說，最大的特色在於華人社團、華文教育和華文報三者是構成華人文化和華人社群重要元素。

華文報的角色和定位在這種氛圍下不斷自我調整，在官方和華人族群之間建立一道便橋，偶而在兩者角力賽中扮演一個協調或競爭的角色。換言之，華文報在馬來西亞整體社會發展脈絡裡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其中最關鍵的便是華文報對自己的認同，黃超明說：

一開始我們就認定華文報業所扮演的傳統角色是正確的，即華文報存在的基本價值。

華文報自我認同是一種自我肯定的過程，對報紙如何調整角色和定位有著重要的影響。華社對華文報的認同有某種期待心理，甚至將她視為不可分割的共生體，因此總希望華文報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例如在華人政治地位或華文教育的提昇等方面。楊白楊也指出：

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由於受到這樣的經濟環境和歷史背景的影響，形成人們對華文報的一份獨特的看法，就是說一份報紙應有的角色之外，還加進了一個要求。現在的華社認為華文報都要傳承中華文化，要促進和發揚華文教育，要教育華社、要發出華社的心聲，假如你不發出華社心聲，你可能就會銷量大跌，他是加進了種族的要求。

華文報對華社議題的重視程度可以反映在華小高職事件¹⁹、三保山護山事件、柔佛州古廟迫遷等事件上。莊宗南也認為，華社對華文報的依賴或尋求協助主要原因是其他語言報紙並不在意華社動態：

主流媒體，如馬來報和英文報，對華社的活動，如報導都非常有限，這方面配合也非常有限，基本上華社的團體都會來找華文報尋求合作，很少會去找馬來報或英文報。

在華人社會結構上，華文報是組成華人社會重要環結；在華族意識型態上，她被當做華社資產來看待，是一份具有「華人血統」、屬於華人社會「共有的」華文報，這種

¹⁹ 有關華小高職事件可參考黃國富（2002）碩士論文《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為例》。

集體認知來自於深久的文化情感，因此華文報依靠的不單是商業上所得，永續經營的關鍵是取得華族信任和認同。以下將針對讀者認同和信任、構成華人社會重要成份，以及政府和華社重要資訊來源說明她在華社的地位和重要性。

壹、讀者的認同和信任是報紙最重要的財富

為何會說讀者的認同和信任是報紙最重要的財富？從商業層面來看，廣告主在意的是報份銷量和讀者，因為它是刊登廣告重要指標之一。根據 AC Nielsen（2004）在二〇〇四年二月公佈的馬來西亞報紙讀者人數，華文報讀者人數約為二百六十七萬七千人，佔總讀者人數的三分之一，同時也佔全國華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這中間影響力並不小。以報社立場來說，最關心的是報紙是否具有影響力、是否能夠建立權威，都需要依賴讀者的認同和支持。

最現實的問題是華文報的讀者來源都在華人社會，如果不維護華社立場，例如華文教育等議題，那肯定會失去華人的支持，如同黃超明所言：

我們的目標是維護華人的利益，華人社會也會支持我們，這樣我們就會有報份。……如果你的編務方針不對的話，華人不會支持，再怎樣努力去做也很難，例如當初的《通報》盡很大的努力，嘗試打開銷路，可是都沒有辦法。

葉觀仕認為，華文報的讀者很敏感，能不能取得讀者認同就要看華文報的立場。他說：

他看你報紙時就會說你們的報紙都不為我們華人講話，就會杯葛你們，不看你們的報紙，所以有一陣子《南洋商報》賣給馬來人，《星洲日報》就天天發傳單說，這個已經不是華人辦的報紙。

讀者的認同力量讓華文報更容易藉由報紙的功能發揮所長，例如各報成立的基金會獲得華社熱烈支持，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絕大多數讀者的信任絕非一蹴可及，而是從小耳濡目染的結果。呂堅強對報紙信任來自於從小的「訓練」，這種社會化過程亦讓他以成為媒體人為榮。他指出：

華文報講的東西我們都可以相信的，我們從小就接觸這些報紙，聽大人談的都是報紙上的東西，對華文報自然產生一種敬仰。

更重要的是這種情感關係在地方性報紙更為明顯，且一代傳一代，往往讀者對某一特定報紙的支持是永恆不變。楊白楊回憶說：

好像我的父親來我家指明一定要我找光華日報給他看，否則他不來我家住。

他打個有趣的比喻，例如誰不能取代《光華日報》在北部及《國際時報》在東馬砂朥越州古晉市的地位：

你如果有白事登在《星洲日報》，人家可能不知道，而且你只有登《光華日報》才會有人來，北馬的讀者都看《光華日報》……這個東西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報份，不是因為《光華日報》的文藝版或評論版特別好我才去看光華，那是基本讀者，好像他父親是看《光華日報》，死了之後他兒子還是看《光華日報》，因為他跟你的切身問題掛勾了。……《星洲日報》去古晉東馬版和西馬版兩份報紙賣八毛錢，我說你《國際時報》不是給他打擊？他講不會，古晉人紅白事一定要登《國際時報》，他說登星洲沒有人看，他們看慣了，基本顧客跑不掉。

華社對華文報的情感非其他語言報紙所能比擬，如葉觀仕所言：

外人看了華文報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刊登這麼多的那個生這個死的新聞或訃告，其實這是華社的溝通……。

就算是簡單的文告，都代表了華文報和華社之間某種特殊的情感，讓報紙成為華社重要的精神支柱。大如一般華人組織，小至家庭成員，選擇看那一份報紙也在組織或家庭中形成一種共識，這種集體意識部份來自於社會化過程，但絕大部份來自對於文化情感，對報紙而言，這種認同和信任即是華文報最大財富。

貳、構成華人社會的鐵三角：華文教育、華人社團和華文報紙

華文教育、華人社團和華文報紙號稱華社三寶，是構成華人社會的鐵三角。前《中國報》董事經理林晃昇在報社總社開幕特刊上如此形容華文教育和華文報關係，他將兩者之間的關係形容為同在一艘船上的船員，「儘管他們有著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卻都是擔負著發揚文化，啓迪民智的重任，兩者息息相關，其中一者興亡與發展，另外一者同樣不能倖免」（葉觀仕，1996:150）。

莊宗南也同意這個唇齒相依的說法，他認為如果沒有了華文教育，華文報也不可能生存之外：

華人社團也需要華文報扮演一種傳達訊息、反映意見的一種管道，基本上這三角關係肯定是一個，華人文化最堅強的基礎。

換言之，假如沒有了華人社團籌款贊助，華社無法繼續辦學傳承華文教育；同樣的，沒有了華文教育或華人社團，華文報將失去最重要的讀者來源，報紙也無法繼續出版，三者之間無法獨立生存，缺一不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例子，較著名者有《南洋商報》舉辦十大歌星義演為華文教育籌款。華文報對華人社團和華文教育的支持是身體力行，郭隆生回憶說：

那個時候社團的人來找我時，我會 go all out 去幫他們，因為我認為我有能力去幫他，有責任去幫他……我們發動十大歌星義演來替獨中籌款。一個 NO.1 的華文報在馬來西亞的影響力很大，他能做很多事情，廣告一登，做什麼都行。

鄭丁賢指出讀者群的結構問題，從商業角度來說，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有百分之七十甚至是八十接受華文教育，華文報的基本市場也即在這裡。他說，就意識型態而言：

整個華人社會也是華文報的給予一種符號，華文報就是華社的一部份，你不可能完全脫離華社的一個範圍，變成一個徹底自由的個人化的媒體，如果你這麼做的話，肯定的你是不是一個華文報就變成一個問題？你在市場上很難去生存的。

在族群意識裡，華文報和華人社會已經被劃上一個等號，被視為一個文化機構，保護報紙如同保護華人文化資產。這種積極保護族群文化不被侵犯的行動來自於濃厚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這種認知深入華人社群日常生活（何國忠，2002）。換言之，華文報不再是一份單純報紙而已，她在華人社群中所形成的意識型態早已超越實質的報紙，是一種集體記憶所形構出來的認同感。馬華收購南洋報業集團時，引起華人社會一片譁然，楊白楊認為最主要原因是在於：

一份華文報的存在不僅是一個產品或商品，他還是一個文化的擁有，你關掉一份華文報就好像關掉一份華小，多麼嚴重。在華人的頭腦裡面就滲透進了這種想法……他的定位在民眾眼中已經不再是一個商業機構，所以才會有人去救他……曾經萬萬千千的公司倒掉，沒有人講什麼，……但是呢！一份華文報就……哇！那些華團就來開會，怎麼去挽救他……在馬來西亞，他會形成一種心理，對報紙要愛護他，要保護他，就像保護一間華小一樣。

黃明來也認為華文報雖然是一間商業機構，但是她是華社有的資產，或公器。他指出：

她的命運應該由全體華社來決定，不是由一小部份政治野心家、商業野心家的企圖演變成一種追逐私利的……壟斷來獲取更大的暴利，這種暴利基本上是違反了華文報是公器的大原則，是華社應該共同擁有的。

黃明來覺得政黨和財團刻意破壞這個存在已久的機制。鐵三角原本是唇齒相依，三者地位是平等的，政黨和財團的強勢介入讓某一方勢力壯大，徹底摧毀華社數十年來苦心經營的遊戲規則，包括某些社團領袖和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工委會（以下簡稱「反收購工委會」）成員被列入報社黑名單，名字永遠不得見報，和平相處的情境不再出現，讓原本整合不易的華社力量增添更多變數。

呂堅強認為，如果沒有報紙這一個平臺，馬來西亞華人就不可能有今天。他認為朝日報業介入南洋報業集團的收購行動，只看到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市場。他指出：

他沒有考慮到這樣會影響到我們華人的競爭，只想到自己能夠賺錢就好。

大家擔心的是，原本力量平衡且相互牽引的三股勢力，因為企圖心而導致三股力量的崩烈，輕者造成華社分裂，重者將進一步削弱華社在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的競爭力，進而成爲各領域的真正弱者。

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早已不復當年氣勢，經濟領域也逐漸失去優勢。目前只剩下華文教育和華文報代表著華族文化和精神的最後一塊堡壘。隨著華文報全落入和執政黨有密切關連的集團手中，以及面對不利於華文教育的國家政策，讓人不禁要問華人社會的鐵三角何時會徹底瓦解。

第五章 八〇年代前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一九七五年新馬報業正式分家之前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見表四），葉觀仕（1996）將她分成七個時期²⁰，每一個階段都代表華文報不同訴求和不同辦報目的。葉觀仕回憶說，當年華文報中國新聞和國際新聞最多：

因為世界大戰的關係，社論放在頭版，國際新聞做頭條，……後來的文人就以舞榭歌台的新聞為主。到了家族則以本地新聞為主，言論版在第二版，現在則放到最後一版。家族生意本身因為生意的關係，就和社團很接近，有些還是社團的領袖……。

從宏觀角度觀察，馬來西亞社會環境的變遷對報業發展的影響，並不只侷限於經營模式的改變而已，其中更包含華文報的使命及文化傳承的精神，因此不管社會環境產生何種劇烈變動，華文報和華社的關係都緊密的靠在一起。

獨立前大家都有一個振興中國的共同辦報理念；獨立後華社和華文報的共同目標是如何爭取華人權益，這些關係從很多簡單新聞選擇、言論立場、廣告刊登，甚至動員華社方式中得知一二，如華社投入全民抗日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葉觀仕說那個時代的辦報真的是為民族、為國家：

當時的報人很多是從香港、中國聘請過來的，……他們能夠辦報、能夠維持，不是說他們有廣告，是有個目的、有個目標，例如革命黨就是要推翻滿清，……保皇派的梁啟超等他們當然就要維護清廷，從中國一直到海外他們的競爭用媒體的力量來競爭，……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很慷慨。像《光華日報》面臨五、六次危機，……那時董事很多，每個人出錢，等於說做賠本生意，不過他有個目標不讓《光華日報》倒閉，那時候的辦報精神跟現在不一樣。

華文報在獨立初期仍然保有各自的風格，因為各報訴求不一樣，內容呈現當然也有不同。八〇年代開始，各報相繼仿效的例子相對增加。葉觀仕指出：

南洋商報強調在商業方面、經濟方面；星洲日報就比較偏重文教方面。南洋商

²⁰ 萌芽時期——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七九年；成長時期——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九年；發展時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一年；淪陷時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光復後時期——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獨立後時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九五年，及現階段時期。

報當初以「商」為訴求就很成功，因為刊登很多商業、經濟報導，廣告就比較多。……星洲日報也改變他的辦報風格，也刊登多一點經濟的報導。

從內容呈現到經營模式改變，西馬華文報歷經一百多年發展，角色或功能都呈現出不同風貌。本章將就八〇年代前的華文報業做簡單介紹，以及獨立後的「五一三」事件及「馬新報業分家」對華文報的衝擊，這兩個歷史事件對八〇年代以後的華文報有著深遠影響，尤其是「五一三」事件所產生的後續國家政策，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華文報生態。

第一節 洋人辦華文報

有關海外華文報的著作中都清楚記載，馬來西亞第一份華文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在一八一五年於馬六甲州由英國人 William Milne 和 Robert Morrison 創辦，當時馬六甲州仍屬於荷蘭人統治。

這份報紙主要內容「除了大半篇幅刊行說教文字外，也宣傳一些倫理道德，輔以一些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學智識（附有插圖），並簡介世界各國的基本情況……清政府也靠這份報紙，得以知道馬六甲和南洋一帶的消息」（葉觀仕，1996:15-16）。後來，陸續有外國人在馬來西亞創辦華文報，例如 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一八二八年創辦的「天下新聞」、都是以傳播基督教義、道德倫理和西方文化知識，如天文等內容為主（葉觀仕，1996；程曼麗，2001）。

第二節 辛亥革命和華僑報紙

清末起中國革命浪潮席捲世界各地，中國兩大力量——保皇派和革命派紛紛前往海外各地設立宣傳基地，「先有維新派重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到南洋……，後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到新、馬一帶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程曼麗，2001:31）。

為了方便達到宣傳目的和籌集革命基金，來自各方勢力紛紛創辦華文日報，但仍以上述兩派勢力為主。因此馬來西亞的華文日報在開始創辦時，即已經擁有鮮明的政治目的（林金樹，2004）。這兩股勢力針鋒相對「展開了長達數年之久的政治大論戰。這場論戰不但促進了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同時也帶來了海外華文報刊空前繁榮的局面」（程曼麗，2001:7）。

一八八一年在新加坡創刊的《叻報》是第一份由華僑自資創辦的華文日報，華僑報紙這個名稱即在這個紛紛擾擾的局勢中出現（錢平桃、陳顯泗，2001）。程曼麗（2001）稱她為南洋第一報，「在政策上，《叻報》是一份華僑的報紙，以滿清政府政策為依歸。該報首頁除社論之外，尚有滿清皇帝的「上諭」存在」（朱自存，1994:11-12）。

《叻報》雖在一九三二年停刊，但他帶動了華僑辦報的熱潮，也為「華文報的成長開創了一個新局面。」（葉觀仕，1996:1）根據葉觀仕（1996）的統計，從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三十九年間，馬新兩地共有十八家報紙創刊，其中保皇派佔了四家，革命派佔了十一家。而在一九一〇年於檳城創刊的《光華日報》，亦是現今唯一僅存的革命派報紙。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原有的一些報紙被商業性報紙取代，例如一九二三年創刊的《南洋商報》和一九二九年創刊的《星洲日報》。

第三節 抗日運動

中日戰爭爆發，遠在南洋一帶的華人紛紛成立抗日團體，並發起籌款運動。「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為了反映僑胞的愛國熱情及捐輸的踴躍，……各報都在主要版面上以大量篇幅報導新、馬和南洋各地的籌款消息，……每天關於捐輸的消息都佔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有時甚至充斥全版……除了原有報刊積極投入抗日宣傳外，還出現了一批專為報導祖國的抗戰資訊而創辦的報紙」（程曼麗，2001:99-111）。

當初的「《南洋商報》還根據華僑群眾最關心的事件和華僑救亡運動中的問題，具體地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與政策，強調「不分黨派，不分老幼，不分貧富，不分智愚，以大局為重，以團結為重」（曾瑞炎，1988，轉引自程曼麗，2001:99）。

但就在日軍攻陷南洋之後，「所有報紙被迫停刊，報人遭迫害，報社設備受摧殘，這是華文報的黑暗時期。……在這期間，馬、新華文報業可說是一片空白」（葉觀仕，1996:2）。

第四節 戰後的華文日報

經歷了日本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馬來西亞華文報脫離黑暗時代。一九四五年光復

後到一九五七年獨立前，「在這短短十二年期間，接二連三不斷復刊或創刊的日報多達六十四家……馬、新兩地冒出的小型報少說也有五十家以上，各類型報刊合共一一四家左右。數目之多、品類之繁、立場之亂……自動停刊或遭封閉之快，令人眼花撩亂，嘆為觀止」(葉觀仕，1996:2)。

一九四八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民族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遭遇摧殘的華僑經濟逐漸獲得到恢復，作為輿論工具的華文報刊也紛紛復辦，華文報刊一時間欣欣向榮」(程曼麗，2001:115)。這時復刊後的報紙包括了《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

但隨著國共戰爭的引爆，戰後創刊或復刊的華文報立場開始混亂，其中包含了擁共和反共兩大勢力，這時的英殖民政府紛紛採用「緊急法令」封閉左傾報紙和逮捕報館高層，例如設在檳城的《現代日報》和設在吉隆坡的《民聲報》等。

在這段剿共浪潮中，還是有不少的華文報復刊和創刊，例如一九四六年創刊的《中國報》是目前唯一還繼續出版的報紙。

第五節 獨立後的華文報

馬來西亞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脫離英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獨立後的華文報發展不錯，以華人人口居多的城鎮出現一些新創刊華文報紙，但並不多見(朱自存，1994)，較著名的有在一九五七年於怡保創刊的《建國日報》及同年在吉隆坡創刊的《馬來亞通報》。

獨立後的華文報紛紛表示放棄中國即是「我國」、國民黨政府為「我政府」(朱自存，1994)的認知，例如《光華日報》表明自己「由馬來亞華僑的報紙，變成為馬來亞華人的報紙」(程曼麗，2001:167)。各報辦報宗旨也隨即強調在地化，除了獨立因素之外，大部份華人移民決定留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讓華文報不得不做出改變。

這時期的新聞內容主要都是宣傳馬來西亞政府政策、維護華族利益和促進各族間團結為主，各報都以灌輸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協助華人儘速融入馬來西亞社會，例如《南洋商報》強調他們的辦報宗旨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使華裔同胞瞭解國家的政策和政府的方針，使華族能及時參與國家建設與發展」；光華日報的編輯方針是「維護國家利益，作為政府橋樑，溝通民意，致力促進全民團結，親善和諧」(程曼麗，2001:168)。

與此同時也儘量凸顯馬來西亞新聞，約佔全部新聞的百分之八十、國際新聞約百分

之二十，至於中國新聞則變成國際新聞版的一部份而存在，且佔極少篇幅（程曼麗，2001），如同葉觀仕所言：

獨立以後本地政府也不允許把中國當做我國，中國不能當做是你的國家，也限制你刊登中國的新聞，也不能登得太多，所以跟中國的關係也慢慢的比較疏遠。

當時共產黨思想盛行於整個東南亞，政府對共產黨非常敏感，許多和共產黨有關的物品都被列為違禁品，例如《毛語錄》。因此，華文報儘可能避免談到有關共產黨的議題。一九七九胡申翁接任馬來西亞首相時，對共產黨限制依然沒有放鬆；一直到一九八九年馬共和馬來西亞政府簽定和平協議之後，共產黨威脅才真正在馬來西亞解除。

朱自存在回憶當年在《南洋商報》擔任總編輯時，曾接到主管報紙出版准證國內安全部（以前稱內政部）兩封信，兩者都和刊登共產黨訊息有關。

第一個警告是刊登人民日報，我們拿外國通訊社的照片，人民日報的每一份版頭都有毛澤東的語錄，毛語錄是犯法的……。第二個問題是副刊，有轉載新加坡新聞，內容是一本有描述或形容馬共英勇的課題，這本書在馬來西亞是被禁的，但在新加坡可以賣，我們不知道……。

獨立後各報強調在地化、去中國化，以馬來西亞新聞為主，對共產黨相關議題興趣缺缺，所以共產黨問題並未造成華文報太多困擾。在大環境裡真正影響華文報深遠的因素是一九六九年發生的「五一三」事件和「馬新報業分家」，前者牽引出許多不利於華族發展的政策，讓華文報、華社和政府之間的磨擦加劇；後者則是華文報馬來西亞化最重要階段。

壹、五一三種族衝突流血事件

一九六九年馬來西亞舉行第三次全國選舉，結果執政黨聯盟在西馬國會議席只取得百分之六十四個席位，並失去四個州議會優勢。成績公佈後，反對黨和巫統各自舉行街頭勝利遊行，隨後發生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衝突。

不到二十四小時，首都吉隆坡等地均發生流血衝突事件，隨即內政部長敦拉薩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況，並在全國實施二十四小時戒嚴。這時軍警大舉進駐並進行逮捕行動，國內多位總編輯、編輯和記者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半年至兩年（葉觀仕，1996），《中國報》亦被下令停刊卅天。

與此同時，政府也在首都吉隆坡設立「新聞管制中心」²¹，除了對各語文報紙實施新聞審查制度，也下令所有報紙（《通報》除外）在五月十六日這天起暫時停刊三天，這對當時的華文報業是一大打擊。

衝突事件之後引發許多問題，包括政府以誤發為理由收回二十七萬張公民證書，其中絕大部份擁有公民證書為華族（楊建成，1982）、政府通過實行單一語文教學政策、禁止公開討論馬來人特權、國家語文——馬來文等，並將這些議題列為敏感課題、新經濟政策等，尤其是敏感課題演變到最後成為各政治人物封鎖訊息的最佳工具，對華文報帶來相當程度的衝擊，種種限制逐漸影響報社對新聞題材的選擇。

貳、馬新報業分家

一九七五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文報正式一分為二。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在吉隆坡出版的《南洋商報》加速其馬來西亞化計劃的腳步。另一家歷史悠久的《星洲日報》於一九六六年在馬來西亞設立印刷廠，馬來西亞銷售的報紙改由新廠印刷出版。一九七〇之後《星洲日報》成立獨立編採部，並成為一家道地的馬來西亞報紙（葉觀仕，1996）。

馬來西亞報業在地化加快華文報紙的蛻變，馬來西亞議題成為報紙版面的重點新聞。崔貴強（2002）對《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和《光華日報》的評論所做統計顯示，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〇年有關馬來西亞議題的社論只佔總數量的三分之一，到了一九八八年到二千年，有關馬來西亞議題的社論高達八成，這些數字證實馬來西亞化對華文報立場影響。

²¹ 各報每天發刊的新聞，例必先行送往新聞處，由政治部與警方及新聞處三方面人員先行過目，然後蓋印通過才准刊出，即使剪稿也不例外（葉觀仕，1996：126）。

表四：八〇年代前後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發展大事記

八〇年代前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年份	報紙發展大事記
	1815 年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宣傳宗教為主
	1881 年	辛亥革命浪潮席捲海外，《叻報》等報紙創刊，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政治鬥爭在各地漫延開來
	1923 年	中日戰爭爆發，《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宣揚華人抗日決心
	1957 年	馬來西亞脫離英殖民地政府宣告獨立，華文報宣揚國家意識，建構新國家認同，地方新聞取代國際新聞
	1969 年	五一三種族衝突流血事件發生，馬來西亞政府實施新聞審查制度，敏感課題衝擊報社運作
	1969 年	《中國報》被政府勒令停刊三十天
	1975 年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報業一分為二，馬來西亞議題成為報紙版面的重點新聞，馬來西亞華文報正式在地化
八〇年代後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1985 年	《新明日報》併入巫統掌控的「新海峽時報集團」
	1985 年	華教著名鬥士林晃昇經營《中國報》不堪虧損，宣佈停刊
	1986 年	《中國報》在周氏家族接管之後順利復刊
	1987 年	《星洲日報》在「茅草行動」中被勒令停刊長達半年
	1988 年	長青集團以二千一百萬元代價買下《星洲日報》，成立朝日報業有限公司，並提出「正義至上」口號
	1989 年	馬華公會屬下星報集團宣佈收購《通報》
	1991 年	豐隆集團屬下子公司謙工業收購《南洋商報》、《中國報》及《生活出版社》，成立南洋報業集團，為馬來西亞最大報業集團
	1992 年	《通報》轉售給新協利集團，次年改稱《新通報》
	1992 年	《星洲日報》老板張曉卿以新台幣二千二百萬，從金馬揚集團手中接管《光明日報》
	1994 年	《新通報》不堪虧損，宣佈倒閉
	1996 年	《新明日報》宣佈倒閉
	2001 年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集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葉觀仕（1996）。馬新新聞史。馬來西亞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

第六章 蛻變中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西馬華文報在八〇年代之後開始有重大轉變，如同上一章所述，除了建立新國家認同之外，報紙經營者也積極改變報業形象和經營手法，這個轉型符合現代化報業管理趨勢。

受到內在環境和外在環境的影響，報業管理者必須緊隨著不同時代和社會環境變遷做出適當反應，除了避免在激烈的報業競爭中被淘汰出局，更希望透過現代化管理方式將報業推向國際舞臺。

根據蔡念中、張宏源和莊克仁（1996）合著的《傳播媒介經營與管理》一書中指出，媒介經營方式與經營企業組織一樣，同樣面對如同企業一般的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影響，例如外在方面有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教育因素、科技因素和法律因素；內在部份則有經營理念、經營方針、回饋社會等因素。這些因素用在西馬華文報上非常貼切，同時可以對蛻變中的華文報做合理的分析和探討。

無可否認，報業經營策略的改變是緊貼著社會脈動前進的，過去一份報紙由幾個人籌集一點資金即可以出版；現在報業要生存，除了龐大資金之外，最重要必須改採企業經營方式，其規模和複雜的專業分工已不能再用傳統的家族生意形式來管理。同時現代化報紙出版流程，可以解決傳統報業經營的困境。

現今全世界報業經營模式幾乎一模一樣，馬來西亞亦是如此，內在環境和外環境在牽動其整體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八〇年代報業集團出現之後，現代化概念取代原有傳統經營模式，加上全球化衝擊，西馬華文報不得不隨著時代腳步邁進，例如全面採用電腦化作業、積極參與文化和關懷社會活動等。

隨著華社在八〇年代退出辦報事業、政黨的介入，以及國內安全部和法令長期限制及干預等事件，對西馬華文報也有著深遠影響，這個關鍵性轉折年代對馬國華文報的傳統使命和角色轉變有著極為重大影響。

部份老報人或華文報長期讀者都有很深的感受，認為現代報業經營模式背棄了華人使命。朱自存懷有多少感慨說，南洋商報股權改變之後，不一定再站在華社立場說話，他認為：

為讀者說話，不一定是為華社，讀者要看什麼就給什麼，就算有使命也開始淡化了……

其實華文報的轉變和當時的政治氛圍有直接關係，不管是內容或立場很容易受到這些因素干擾，但有些歷史腳步是無法利用人力去阻擋。鄭丁賢指出當年華文報可以不必報導太多和華社沒有直接關聯的議題：

這個反映了當時整個華人社會的一種社會參與程度是比較低的，他們對非華人社會的一些問題是不關心的，他們甚至認為是沒有瓜葛的。但是呢，等到你整個華人社會開放、國家的認同加強了，報紙的跟族群的價值觀慢慢的上來。所以現在報紙打開來之後就跟以前不一樣，以前的報紙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另外一些民眾、不同的族群，馬來人、印度人到底在想什麼？……但到今天的話，這些課題變成說是一體的，整個國家視為一部份，所以華文報也必須給予相當熟悉的報導。

莊迪澎認為比較顯著的影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政治介入，二是經濟環境改變：

政治介入的因素比較關鍵，因為馬來西亞中文報業的產業結構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介入的結果。

有人感嘆華文報不再為華社說話，或許這樣的評批太過嚴苛；無論如何，隨著時光輪子的轉動，報業管理者可能有他另一套延續華人使命的策略，也可能有一套為華社說話的技巧，例如多族群社會環境不允許我們談論華社單一主體等，我們只能這樣說，改變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但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

研究者將就進入報業集團營運年代、政黨收購影響讀者對華文報信任及內政部的關切和法令的約束三個主題，來說明八〇年代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的變化。

第一節 進入報業集團營運年代

西馬華文報報業集團年代始於八〇年代，崔貴強（2002：65）指出「八十年代末期與九十年代初期，西馬華文報壇的一大盛事，要算是報業的集團化。」這時期華裔企業家和華人政黨雖然都對報紙產生興趣，但這些華裔企業家空有資金卻缺乏辦報經驗，接手之後不是脫售就是關門大吉，例如新協利集團從馬華公會華仁控股手中接下《通報》營運權，在虧損兩年後宣佈停刊。總歸因素除了缺乏辦報經驗之外，高成本也非一般企業或個人可以承擔。從事新聞教育數十年的林景漢指出：

在八〇年代之前的言論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當資本主義越來越發達、報業的成本越來越高時，一些報社就支持不了一家一家的倒閉，甚至被大財團收

購，……現在也沒有好選擇，幾家報社都屬同個集團，以前報館可以東家不打打西家，有七八家讓你選。

八〇年初期最早被併入報業集團的華文報是《新明日報》，這份由武俠大師金庸和梁潤之合辦華文日報在一九八五年由巫統掌控的「新海峽時報集團」從當年馬華公會總會長陳群川手中買下，也是第一家由非華人控制的華文報。

《新明日報》的財務狀況是在陳群川失信案之後出現危機。Edmund Terence Gomez (1991) 指出，當年「新海峽時報集團」之所以接手《新明日報》，主要是在解救陳群川。陳氏失信案件被判刑之後《新明日報》報份便逐漸下跌，「新海峽時報集團」似乎也無意拯救她，終於在一九九六年宣佈正式關閉。

這段期間陸續出現的報業集團尚有朝日報業有限公司及後期的南洋報業控股集團。當年張曉卿透過長青集團以二千一百萬元買下《星洲日報》，後來從金馬揚集團手中以二百廿萬元代價接手虧損累累的《光明日報》，組成著名的朝日報業有限公司。隨後張曉卿便積極朝建立世界華文報業集團目標前進，例如一九九五年收購明報集團、創辦《東埔寨星洲日報》等，目前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業集團之一。

朝日報業有限公司旗下出版刊物還包括《砂勝越星洲日報》、巴布亞新畿內亞的《國民日報》(The National)、《工商世界》月刊、《學海》周刊、《星星》周刊、《小星星》周刊，以及電子報《星洲互動網》。

南洋報業控股集團是馬來西亞另一個著名報業集團，華裔企業家郭令燦透過豐隆集團屬下子公司謙工業(Hume Industries)在一九九一年從馬來與全國商業理事會(Malay and 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主席 Wan Zami Wan Hamzah 手中買下百分之八十四點九股權(Gomez and Jomo, 1999)。南洋報業控股集團旗下公司包括《南洋商報》、《中國報》、《生活出版社》及南洋線上有有限公司，其中《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各式各樣雜誌多達十七種，計有《新潮》、《風采》、《新生活報》、《生活電視》、《大家健康》、《少年月刊》、《名車》、《跑道馬經》、《Track Guide》、《全體育週報》、《號外週報》、《釣魚月刊》、《Rod & Line》、《Pancing》、《喜喜》、《時尚男人》及《美味風采》。

報業集團成形之後，帶來一些人力、言論多元化及制衡上的問題。林景漢就說，八〇年代的時候，報紙比較能夠落實學院派的九大信條，報業集團主導華文報業之後相對困難多了，他說：

所以現在很多報人就離開，有理想的就不去做報業……。

葉觀仕也認為，報社少了之後多元聲音的確相對減少，他舉例說：

之前很多報紙都倒閉了，如果說不關閉的話，很多不同的聲音就會出現，……因為很多華人的問題或民生問題，這個報不登、那個報也不登，就不會有人再刊登了……言論就不會集中在某一個報團上，所以在報團來說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包括節省報社成本，但相對於就不利於新聞自由的發展，……。

言論多元化的消失意味著作者和讀者的談判籌碼減少，莊迪澎認為：

以政治學的術語來說，讀者和作者根本無法制衡報紙。……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條件，就好像勞資關係那樣。就業機會多時（工找人），工人和老闆談條件的籌碼高，不必任人魚肉；當就業機會少時，工人另謀高就的機會相對少，為了保住原來的飯碗，不得不屈從於資方的要求與工作條件。

但是無可否認的，集團接手報業也帶來一些好處，像豐隆集團接管之後讓南洋報業可以用更專業和現代化方式來經營。更重要的是如同黃超明解釋：

他們從來沒有干涉或決定以他們自己立場為主的編務方針……。

彭早慧也認為，當年豐隆集團收購南洋報業集團最大的要求即是要南洋報業集團自負盈虧，同時讓集團業務更多元化。她承認豐隆集團不干預報社的方向或編輯方針，更斬釘截鐵的說：

完全，完全沒有。

一如呂堅強所言：

坦白說在《中國報》是相當自由的，基本上是沒有干預下面的，我們提供的材料他們都會接受，在我眼中《中國報》是沒有黨派的，我們有 idea 提出來，他們接受，就開始寫。

不干預編務內容是財團和政黨收購的最大不同點，這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報老闆的默許可以讓編採人員花更多心思在處理來自政治勢力的干預。

雖然面對許多外在有形壓力，華文報並未放棄自我提昇，除了積極改善硬體設備提昇作業效率之外，也積極投入文化公益等社會關懷活動，前者有助於報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後者可以提昇報業形象，畢竟部份讀者的認同須仰賴形象的塑造。

壹、報業高科技化和華社退出辦報事業

《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在七〇年代開始增設彩色印刷機。《中國報》在一九八六年轉手賣給周氏家族之後，即全面改彩七彩印刷技術。彩色印刷徹底改變過去單調的黑白，也讓報紙更注重新聞照片。

在這之前華文報在排版上或色彩運用上都相當保守，莊宗南回憶說：

《中國報》原本是非常傳統的報紙，周家接過來之前是直排的，基本上還是走國際路線，封面都是傳統的新聞呈現，包括編排，也沒有所謂的彩色，最多是套紅或反白的手法。

《星洲日報》編輯部與生產部在一九九〇年全面採用電腦化作業，同時不斷更新新式印刷機，例如一九九三年增設一台每小時可印四萬報份的新機器，這些都加速了報業現代化腳步。隔年在六個辦事處增添數位化彩色電傳彩照系統，這套系統在三分鐘內即可將彩色照片傳到吉隆坡總社，使得新聞發收稿件變得更方便（葉觀仕，1996）。

各報紛紛在九〇年代投資大筆資金加速報社電腦化和數位化，主要目的是加快報紙運送到西馬各城鎮。過去報紙都由吉隆坡統一發送，但礙於西馬半島的幅員遼闊，報紙往往得提早新聞截稿時間，有時因為運輸意外，造成某個城鎮無法及時取得報紙。這些難題在各地設立印刷廠和加購數位傳版系統之後一一獲得改善，例如《中國報》在一九九四年至二千年，斥資數千萬元台幣在西馬北部的霹靂州、檳城州和南部的柔佛州設立三個分廠，加上位居半島中部的吉隆坡，由南到北一線到底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原有的市場佔有率（中國報電子報，2004）。

《星洲日報》同樣在數位傳輸科技協助下，大規模設立印刷廠，甚至跨越南中國海到東馬砂朥越州設立兩間印刷廠，目的即為了要搶先取得較遍遠地區的市場，增加各地報份，同時可以趁勢進入長期被地方報紙佔據的東馬，數位科技和新印刷技術，使得西馬華文報激烈的競爭進入另一個新階段。

採用現代化管理方式可以解決傳統報業的難題，例如更能精確掌握出版時間、解決交通運輸問題、新聞即時性獲得改善等。如同前述所言，報社全面科技化和數位化所帶來的高成本並非一般企業或個人可以負擔。朱自存指出，資本太大是造成華社退出辦報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他說：

買一套機器要多少錢？……現在單單設備的資本就要很大，……那時幾百萬就可以辦一份報紙，現在不行。……另外像中國報以前兩三百萬（馬幣）轉過來，

後來用千多萬（馬幣）轉手賣出去，……這就是商業化的結果。

另外缺乏辦報經驗亦是一個大問題，多家由華裔企業接手的報社最終都以嚴重虧損做為收場，例如董總主席林晃昇接手《中國報》後因財務危機自動停刊（葉觀仕，1996）。另外一九八七年在北部檳城創刊的《光明日報》也是由華社籌資經營的一份地方性日報。到了一九九〇年由華裔商業集團金馬揚集團（Kemayan）接管時，她已經是一個爛攤子。《星洲日報》也同樣在在林慶金手中陷入財務危機，一九八六年由另一位華裔商人創辦的合眾銀行接管（葉觀仕，1996），這些例子多不勝數。

在馬華公會宣佈收購南洋報業控股集團之後的半個月內，華社也曾在以合資方式試圖重新接手華文報事業。那時馬來西亞中華工商聯合會會長林源德為首等八名華人社團領袖，以個人身份組成的財團企圖向華仁控股獻議收購南洋報業控股集團百分之七十二點二五的股份（雪華青，2001；陳漱石編，2001），在同年八月遭華仁控股拒絕，當時華仁控股只表明願意脫售百分之二十的股權給華社財團。但這個股權分配和當初的獻議不一樣，林源德等人放棄收購（聯合早報，2001），收購事件不僅在華社引起相當激烈反應，也一度讓人以為華人社團將再度領導華人社群，最後卻是一場空，也註定西馬華文報將走入另外一個永不回頭的歷史結局。

貳、多元化內容和商業化經營

華文報內容走向多元化最主要原因在於報紙訴求和目標的改變。過去辦報並不強調營利，例如抗日時期以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為訴求，即使虧損也無所謂，但現在報老闆關心的是報社能不能賺錢。楊白楊即認為：

報紙的管理層裡他們只有第一賺錢、第二賺錢、第三賺錢這個念頭，因為他是商業機構，……不賺錢那裡可以？以前周瑞標擁有中國報不是為了賺錢？星洲日報老闆他是不是要賺錢？……豐隆是很明顯的，如果沒有賺錢那裡要？

賺錢與否和同行間的競爭，加速報紙在內容上做出改變。編務人員改以所謂讀者喜愛程度來決定報紙內容，強調內容必須符合各階層人士閱讀。以《南洋商報》為例，過去她是一份以「商」為訴求的報紙，在西馬華文報市場佔有率排名第一，後來逐漸被《星洲日報》取代。馬華收購之後，《南洋商報》銷量更一度跌到谷底，新任總編輯鐘啓章上任之後的首要任務即大事改革，並針對年輕讀者製作了一系列新鮮內容。他提到：

我們的調查發現年輕的讀者群流失的較多，最近我們的改革重點是放在年輕化方面，希望藉此吸引更多的年輕讀者。我們的娛樂版、教育版和 IT 版都改了，收到效果是非常的好。有些讀者就會覺得說改革後的《南洋商報》很好，好在

那裡？最明顯的就是娛樂版，排版變活了、新聞也多了，我們的改革重點讀者一下子就發現到，也覺得很欣慰。

強調多元化內容的《星洲日報》，堅持不以整份報紙做為市場區隔，而是以報紙不同版面做區隔。總編輯許春指出：

基本上要迎合各階層讀者……例如 main paper 是屬於嚴肅新聞，一般上是國際、官方、國內新聞；另外地方性報紙，如大都會，就走中下讀者需要的新聞，所以可以發現到我們有很多感性的新聞、民生的新聞，這些就是我們強調的。還有副刊走比較高層次的文藝、文學類；還有更高層次的，如星期天的星洲廣場，那是更嚴肅、知識份子看的，所以一份星洲日報幾乎都可以提供任何一個層次讀者想看的東西。

他也坦誠：

如果我們純粹走這種中上層的編務方針的話，那麼中下的讀者就會完全流失。

華文報內容多元化始於七〇年代末，當初除了在內容上增添各式各樣內容和星期刊之外，抽印小開本也流行於八〇年代。至今抽印本的應用更加爐火純青，例如《中國報》在二〇〇三年創刊每星期六發行的《足球報》，夾在《中國報》裡一起販售，這種形式除了有效增加讀者人數之外，配合商業機構所推出的抽印小開本，更為報社賺進不少額外利潤。莊宗南總編輯在受訪時表示，以前報紙就只有兩三個部份，主要有全國版、國際新聞版和副刊版等，現在至少有七至八個部份。他指出：

以《中國報》來說有時一天出八、九個部份，分化新聞內容，例如母體是 A 部份、B 部份體育和國際、C 部份是地方版、D 是副刊、E 是娛樂，接下來還有個 pull out，即分類廣告，……為了吸引讀者還另外策劃每個星期六出版的足球報，專門為足球迷而設，或每個星期五出版家居版，這也是為了應付商家的需求，做為一種收入方法。除了正常的新聞處理之外，幾乎都會想如何去開闢一條新路，……又把正規新聞分到財經，或娛樂做分門別類，變成一份相當厚的華文報。很多人在埋怨，報紙內容太多看不完，這也是一個新的趨勢，無法避免。

另外各報也增加專題內容和出版許多讀物，例如《星洲日報》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增設《新教育》、《健康家庭》、《工商財經》、《星洲財經》、《投資廣場》等；強調經濟報導的《南洋商報》在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八年之間增加了《南洋經濟》、《經濟縱橫週刊》、《南洋論壇》、《南洋副刊》和《新世紀》南洋教育版等（崔貴強，2002；葉觀仕，1996），廣受讀者喜愛。此外各報也相繼擴充地方彩色版，例如《星洲日報》的《大

都會》、《彩色檳榔嶼》、《彩色大吡叻》、《彩色大柔佛》、《東海岸風情》、《花城》、《古城》（葉觀仕，1996）。陳亞才認為，這種形式上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且是市場競爭下的產物。他說：

從黑白增加到較多的彩色版、從本來只有星期天才有的彩色版或是特定的版位，到最後可能這報紙有一半以上是或是三份一是彩色版，……就是內容和讀者之間的品味的互動……可以看到報紙都在做很多的嘗試。

上述的改變，商業利益是最主要的推動力，企業接管報業是最大的關鍵，如同郭隆生一語道出華文報的最終生存方式，他說：

一個商業組織的最終目的還是 profit，問題是在於要賺多少……我個人認為不能夠一百巴仙將報社當做一個文化機構、也不能一百巴仙將報社當做一個商業機構，之間一定要有個平衡點，這應該是報館的定位。

企業主將報社當作一個追求利潤的工具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商業元素的極度發酵加緊了原本就處處受限的新聞自由，部份商業機構也善於利用廣告來干涉新聞報導或是利用廣告做為換取新聞曝光的籌碼，對內容商業化和新聞自由有著無比深遠的影響。今天編輯部受到商業問題影響，在報社服務超過三十年的老報人朱自存指出：

他們看到商業問題，他們受到這個影響，例如這樣寫新聞可能影響廣告，很多顧忌，現這些廣告和商業跟經濟有關係，跟當權派有關係，另外官商結合也有影響。

朝日報業集團總編輯蕭依釗也坦誠新聞自由的限制不只來自官方，也來自民間，她說：

最近我們跟一個娛樂公司……因為我們的娛樂記者寫了一些批評他的缺點的報導，他把所有廣告撤掉，他們不能接受你給他們的批評，所以我們也不能只怪政府，民間也要尊重新聞自由……。

一些社團也會有如此反應，《星洲日報》總編輯許春在受訪也表示：

比如報導社團的一些問題，他們也會打電話來警告……。

這種限制在過去也曾存在，只不過當初的談判籌碼是建立在所謂的人情上。當時華文報主要新聞來源是社團，基於種族情感問題，新聞報導會偏向以人情做為取捨的要件。但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商業利益早已超越這種情感，取而代之的是錢和新聞自由之

間的爭辯。

參、全球化概念開始運作

全球化並不是新概念或新現象，Pual Hirst & Grahme Thompson（1994）指出，全球化真正開始流行於一九八〇年中（轉引自詹中原，2001），現在則成為社會科學的時髦概念（fashionable concept）、管理大師傳統的核心名言、新聞工作者和政治人物的標語（Hirst and Thompson, 1999）。

按照詹中原教授的定義，全球化概念（2001）可分成六種，一、全球化即國際化；二、全球化即疆界的開放性；三、全球化是一個過程；四、全球化是意識型態；五、全球化是一個現象；六、全球化為一種優越的現象與過程。

報社管理層對全球化浪潮的認知非常單純，即華文報必須國際化、跨出馬來西亞走向國際市場，她們的其中一個策略是和國外知名華文媒體交換新聞，組織結構較具規模的《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即是利用這種概念和全球華文報接軌。洪松堅指出：

比方說最近我們和文匯報、廈門日報簽了約……特別是中國內陸的一些專題，例如中國神舟五號載著太空人進入太空的專題資料，這些材料就可以提供給我們使用，同樣的我們也供應他們東南亞的訊息，互換互補，也不用付費，同時豐富了報紙的內容，我們已經朝這樣的全球化角色前進……走出馬來西亞、走向國際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出版《星洲日報》聞名的朝日報業私人有限公司，在二千年於柬埔寨創辦《柬埔寨星洲日報》，接著去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市（Pontiana）和當地報社合作，由《星洲日報》提供材料、編版，完稿後電傳到坤甸市，再由那邊來印刷出版整份報紙，這些跨國際的出版和合作關係，開啓朝日報業建立世界華文平面媒體網絡的第一步（星洲互動，2004）。《星洲日報》總編輯許春提到：

九〇年代我們就已經將目標放在全世界，……我們的廣告是說：「走向世界」……如果我們要建立東南亞區域的地位的話，那我們更要跨出馬來西亞，要到東南亞其他國家辦我們的報紙。。

充裕資金是朝日報業最大優勢，還有其具規模的組織架構為《柬埔寨星洲日報》和坤甸市的華文報提供相當成熟及完善的出版模式，也為《星洲日報》甚至朝日報業屬下的多家平面媒體打開通往國際的方便大門。朝日報業集團總編輯蕭依釗指出：

我們也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辦了一份英文報，為什麼在一年內可以超越梅鐸辦的報紙，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基礎、有這個人材。

換言之，在正式大舉跨足國際市場之際，《星洲日報》藉由這些「國際」訓練幫助本身熟悉及具備相當豐富的國際競爭知識，並在未來提供更優良的人力和物力。

肆、積極參與文化活動和關懷社會活動

文化和關懷社會活動是華文報最常舉辦的兩大項目，也往往是各報互相競爭的重點之一，同時也是聯繫各團體最好辦法，有助於建構讀者認同感和樹立報社形象。

活動多涉及華族傳統文化，例如新春團拜、中秋節大匯演、教育基金籌款等，向來是華人社群生活的重要環節，具有凝聚和建構華人集體意識功能。這種認知對其他種族來說，也是區分他族和我族最好方法，更是族群認同重要標籤之一。

華文報舉辦文化活動在九〇年代之後變得頻密，一來華文報已經有能力單獨舉辦這類大型活動，例如各報紛紛成立專責部門負責報社所有對外活動，如《中國報》設有業務發展部及慈愛人間基金委員會，前者負責文化及商業活動；後者負責慈善活動，同時將活動主題設置在文化活動、商業活動及慈善活動²²。

另外一個因素是華文報擁有媒體近用權，不管在宣傳上或報紙版面安排上都會以較大版面來處理，比起一般組織來得方便，較著名的文化活動如《南洋商報》十大歌星義演及《星洲日報》的花蹤文學獎。前者為華文教育所籌集的款項已累積十七億新台幣（南洋商報，日期不詳）；而後者國際性文學獎，目前已連辦七屆。《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2003）認為報紙做為傳播媒體事業和文化載具，他們有「任務努力去縮小物質與精神之間差距，不斷鼓吹與推廣文學藝術的社會價值觀。」

莊迪澎（2004）也認為，《星洲日報》過去十年來舉辦「花蹤文學獎」等文化活動，成功塑造《星洲日報》美好的企業形象，這是她能穩坐第一把交椅的重要因素。雖然華文報積極參與文化或關懷社會等活動，但莊迪澎認為單以文化使命部份而言，華文報能做或有做的其實並不多。他舉花蹤文學獎為例：

²² 文化活動著重於回饋讀者及與讀者建立互動關係，活動方面概括“講座會、小學生寫作營、中小學生徵文比賽、兒童才藝比賽、親子關係一日營、學佛感恩習作營、七夕情歌對唱比賽等；商業性活動主要是促進與商家的關係，除了帶來雙贏的局面也使讀者從中受惠，活動包括演唱會、歌友簽唱會、商品展銷會、E 企業家獎等；慈善性質活動則純粹以回饋及建立一個愛心社會為宗旨，主要是設立「慈愛人間」基金會，通過聯辦或協辦活動如「大馬健美小姐比賽」、逢傳統節目（中秋節，元宵節）宴請老人院、孤兒院的孤老及派贈禮品和紅包等（莊宗南，2004）。

這類活動只是「文化活動」而已，並不是文化建設與知識的創造。對於整個國家的文化政策，也談不上有任何建言。「花蹤」也許營造了某種文化氣氛，但只是營造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個充滿文化氣氛的圈子裡的人，都以為文化環境進步了，但實際上並沒有。

如同林金樹所言，今天華社最大問題在於缺乏一個可以指引道路的人，不管是政黨或是一般華人社團，他們都沒有一個宏觀或具體的看法，這的確是馬來西亞華文報現有的最大困境。他說：

國際研討會講過去的儒家，沒有說未來整個國家經濟會如何，講一個股票起落的就很多人聽，沒有整個宏觀觀點去談華社未來怎樣。

八〇年代之後各報開始善用口號（slogan）來做為報社的訴求，這也是各報進入關懷社會活動最關鍵的時代，例如《星洲日報》在一九八八年復刊以後提出「正義至上」口號，該報慶祝七十週年時提出了「情在人間」。「正義至上」及「情在人間」不僅成為《星洲日報》的企業象徵，也同時是報社員工追求的理想目標，其中星洲日報基金會及領養孤兒院等活動，都在「情在人間」口號下成立。蕭依釗（2004）認為，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有別於其他地方的華文報，她一共扮演兩個重要角色，一是傳承文化、第二是為華人社會做一些關懷和福利工作。

對各報來說，協助貧窮或病患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提供金錢以解決受助者生理上需求。因此，三家主要華文報紛紛設立各報專屬的基金會，例如《中國報》的慈愛人間、《星洲日報》的星洲日報基金會、《南洋商報》的南洋報業基金，這些基金會主要受惠對象大部份是社會弱勢團體。例如《中國報》慈愛人間設立於一九九〇年，主要對象是一般市民。當初《中國報》特別開闢一個版面專門供慈愛人間報導需要救助的民眾。因為報紙語言關係，絕大部份受惠者都是華人，但也有部份印度人和馬來人。

慈愛人間也與非營利組織、華人社團、基金會及政黨合作，聯合舉辦慈善活動。收購事件之後，《中國報》慈愛人間收編在南洋報業基金底下，所籌得的款項都交由該基金統一保管（陳淑儀，2004），只保留中文名稱慈愛人間繼續對外籌募基金。

《星洲日報》設立的星洲日報基金會也同樣籌辦各種活動，以「不分年齡、種族和宗教，接濟貧苦、弱勢的低下階層」（星洲互動，2001）為主要訴求。

《南洋商報》的南洋報業基金則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並以七個宗旨²³代表基金的目標和方向。除了設立洗腎中心協助腎病患者、舉辦活動協助老人院和孤兒院（南洋商報，日期不詳）等慈善活動之外，基金會也透過兩種途徑來協助受助者，一是與社團、機構或個人合辦籌款活動，將所籌到的款項再捐給需要的人，活動包括千禧年慈善畫展、義跑計畫、萬里長城籌款計畫等；二是在籌到款項後，利用這筆資金舉辦各類活動，例如為高齡人士舉辦晚宴、青年生活營、南洋基金工作營、單親媽媽生活營等（南洋網，2004），甚至是從南洋報業基金撥出部份款項來協助其他團體辦的籌募基金會，例如捐款給吉隆坡同善醫院的新中醫樓建築基金（南洋商報，2004）。

伍、報社急欲擺脫華人社團的束縛，不願再做華人社團附屬品

過去華文報和華人社團²⁴關係相當親密，幾乎可用如膠似漆來形容。八〇年代之後華社退出辦報及企業集團介入，兩者之間的關係出現變化且越行越遠。集團化是關鍵因素，因為大財團最大的優點是可供運用的資源相當豐富，這些資源有助於整合集團的力量，以《星洲日報》舉辦的花蹤文學獎為例，結合朝日報業龐大體系，使《星洲日報》擁有足夠的能力和實力去舉辦類似的國際級活動。陳亞才即指出：

他覺得華團你資源分散，雖然你這個組織很多，……而且你必須集中一筆很大的資金辦一個活動，比如說華團決策過程是一層層上去反而困難，而報社只要其擁有人願意投資這樣的一筆錢，一兩百千、三四百千²⁵，他願意付這樣的費用，他就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星洲日報》的花蹤辦到最後他把媒體集合起來，變成一個甚至是亞太華文世界，甚至是整個華文世界裡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學的活動，所以變成在這個領域上他可能就不會……他覺得他所做的實際上超越其他的華團……。

過去所謂鐵三角關係對華文日報來說都可能都變成一種累贅，因為凡事都得考慮華社的感受，無疑阻礙了施展拳腳的機會，太多的傳統包袱對華文報來說都是莫大的負擔。朱自存也坦誠現在的華文報有他們的主張，他指出：

現在你不能夠說他不是為華社，他還是為華社，……有時候沒有辦法配合華社

²³ 一、為更美好的明天而籌款；二、參與的管道；三、與福利團體共謀求進；四、開拓建設性的社會和團體計畫；五、為不幸者提供醫藥援助；六、通過訓練工作營開拓人力資源；七、實現社會與族群需求，並擴大開發領域（南洋網，2004）。

²⁴ 這裡指的華人社團亦包含一般華人社會。因為華人社會的活動大部份都是由華人團體來舉辦，所以兩者之間沒有必要做絕對區隔。

²⁵ 馬來西亞華人常用數字表達用語，即一兩百千等同於新台幣一兩百萬。

的願望，你可以這麼說。

其實華社退出辦報也意味著失去主導新聞產製的能力，過去社團領袖就是報老闆，決定權都操在社團領袖手中，如今發個文告都必須由報社來決定刊登與否。林金樹也承認現在很多社團活動也沒有報社願意全部刊登，加上最近華社也沒舉辦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活動，有的只是春祭、秋祭、祭祖或週年紀念晚宴等吃喝活動。他說：

可能各別吃吃喝喝的就沒什麼價值。有個搞華團的跟我投訴說，如果活動沒有邀請部長來，媒體就不來採訪，就說不夠人手；如果說部長來了，我只寫部長講什麼，連會長講什麼或者我們要搞什麼活動就一個字都不提，……這倒是一個現象；另外原本專門寫社團的老記者也都退休……。

華人社團和華文報的關係在收購事件之後更加惡化。黃明來就指出，華文報可以隨意封殺他們認為不該刊登的新聞或人物，以前兩者的關係是共存共榮，但收購事件之後從一個共存關係演變到一個附庸的關係。他說：

以前華文報和社團是平等相待，大家互相尊重，華文報就自然而然成為他們溝通意見平臺。在獨霸之後，隨著《星洲日報》和馬華公會企圖壟斷整個……變成許許多多關係到華社重要且深遠的一些政治文教一些課題受到篩選，那麼只有他們認為應該要登的才登。所以很多影響華社深遠的、不利於華社的一些聲音就在這種情況下被謀殺掉了，……，對華社建全發展，對民意的建全擴散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陳亞才也不否認這種關係的變化，他認為過去媒體的角色很單純，即報導新聞而已。在九〇年代過後媒體開始做出很多嘗試，包括舉辦知識性講座、文化活動等，這些過去都由華人社團主導的活動轉由媒體推動，致使兩者之間的角色出現重疊或重複，反而成了相互競爭的角色。他說：

可能媒體會標榜說她在這個社會事件她的角色比華團大，會突出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種競爭關係明顯反映在收購事件上，代表華人社團的馬來西亞中華工商聯合會、反收購工委會和馬華公會角力的結果即呈現在報紙的報導上。馬華公會成功接管之後，許多被馬華公會視為敵人的華社成員都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出現在報紙上，例如到目前為止，反收購工委會裡至少還有七至八名成員被列入黑名單。「報變」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陳亞才指出：

雪華堂和眾多的華團連署反對政黨收購，反對媒體壟斷，那變成這個雪華堂和

一群華團，……跟媒體本身的關係產生磨擦。也就是說如果這媒體是沒有涉及的媒體，他就當做一個事件來報導，……但是恰恰你所談的媒體就是華文媒體，所以產生一種尷尬的局面，她要不要報導你這樣的一個新聞、這樣的一個言論，她產生一種直接的磨擦跟利害關係。所以說在最尖銳的時候，完全沒有出現，或者所出現的指另外的報紙，比方說今天華團批評 A 報紙，B 報紙可能會登，C 報紙會登，……。

黃明來不否認收購事件之後，同屬一個體系下的四家華文報曾以強勢姿態面對華人社團，他說：

所以很多社團現在處在敢怒不敢言的狀態，而不是一種平等相待，這是很不健康的，但隨著《東方日報》的出現，慢慢的這些媒體集團對社團也比較和顏，跟之前那種霸氣有了一定的改變。……同時也在進行柔性攏絡原有華社，有些甚至做到突然間令華社領袖受寵若驚的動作。現在進行將華社領袖分類，凡是語言和行動上支持他們的就排名第一，而和《東方日報》維持良好關係的就去排斥他、攻擊他，在現在這個階段都可以見到，變成華人社團和華文報不再是處於平等相待的局面……。

呂堅強觀察到過去兩年《星洲日報》沒有把華社放在眼裡，他認為：

要封殺誰就封殺誰，她已經忘了華社，包括我自己貢獻了她幾十年，這麼多人支持你你竟然忘本。

第二節 政黨收購影響讀者對華文報信任

馬華收購南洋報業集團所引發的抗議行動是大家始料未及的，這次事件也讓華文報和華社的關係進入一個冷戰低潮期，董總主席郭全強曾表示「如果張曉卿或《星洲日報》有意壟斷華文報業，華社一定要反到底」（陳漱石編，2001:15）。

國內一批年輕華裔學者也用反收購行動來表達不滿，他們的訴求是不允許政黨利用政治勢力干預企業自由的競爭，而朝日報業有限公司的間接參與手段也讓華社感到相當憤怒，尤其是《星洲日報》在收購事件期間，即從「五月十七日起的十多天內，幾乎完全沒有刊登任何有關民間反對政黨控制媒體的文告或新聞。」（陳亞才，2001:4）他們覺得做為一個國內最大的報業集團不應該利用政黨勢力來統一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對張曉卿有意成為馬來西亞報業大王的意願也不以為意。畢竟華社對所有華文報仍有許多期許，他們希望華文報能團結一致共同捍衛新聞自由不被政黨干預，雖然《星洲日報》總

編輯許春對此事做出澄清，他認為這並非完全是馬華的問題而已，只是部份人士有意將《星洲日報》扯入這淌渾水。他說：

我所知是一種政治的因素，……當時的《南洋商報》老實說內部有很多問題，……這也涉及了安華事件，很複雜的一個背景。因為當時安華和豐隆的關係非常好，……當初《南洋商報》裡面的一批人，他們是從《星洲日報》離開，他們被馬華收購以後，他們被裁掉，被裁掉之後心裡不滿，所以肯定要把《星洲日報》扯進去，覺得最後得益的一定是星洲日報。

但對於後來朝日報業在南洋報業集團所持有的股份，以及《星洲日報》做為一家全國性媒體為何會對如此重要議題採取迴避政策，不禁讓人產生更多的聯想。在南洋報業集團股權分配上，張曉卿透過家族公司張道賞控股有限公司與朝日報業有限公司分別持有南洋報業 0.86%及 0.31%股份，合計百分之一點七一，為南洋報業第九大股東（王維興，2004）。郭隆生覺得，媒體本來的角色應該是中立的，但多了政黨的利害關係在裡頭，報紙便難以維持中立的立場，他說：

不能中立就不是一家好的報館，媒體只有公正，才能真正發揮他的功能。

林景漢也認為：

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公信力經過這一次的事件衝擊之後變差了。

如同上述所言，政黨或政黨重要投資公司介入華文報行之有年，從《新明日報》、《通報》、南洋報業集團，或是和執政黨有密切關係的朝日報業，都可以計算在政黨介入的一個範疇中。或許可以這樣說，各族群在馬來西亞從事商業活動，尤其是大型的企業活動不和執政黨扯上關係是不太可能的事。Gomez 指出，「這些商人如果沒有政治庇蔭，是無法取得財富的……執政聯盟有不少其他政治人物，也成為上市公司的董事和股東。雖然有關委任，並不能確保企業可以獲得國家優惠，但可能有助於避開官方的繁瑣手續」（傅承德譯，2002:146-152）。

在華人社群認知中，並不在意一般華商企業是否有政治因素介入，華商企業和政黨甚至其他種族合作並不影響其公信力。但對於華文報要求卻是非常嚴苛，將她視為華社的資產之一，不容許有其他種族或政黨介入，像《新明日報》及《通報》的下場顯而易見。

葉觀仕在其《馬新新聞史》著作中即指出，當年《新明日報》轉售給新海峽時報集團初期，曾一度極力「擺脫控制權落入外族手中的不良形象……一直在扮演溝通華社與政府的橋樑這個角色……「通報」……這份由政黨直接控制的華文日報，內容過於偏向

於政治宣傳，一直被人稱為馬華的「黨報」……由於「通報」是黨報，馬華領導層一有變更，「通報」管理層也跟著變動」（葉觀仕，1996:163-173），兩報擺不脫政黨和種族色彩，華社對於這兩份報紙的不信任感直接反應在報份上。如今《南洋商報》的處境與當年的《通報》及《新明日報》一樣，原因之一即是華人社群無法認同政黨和其他種族控制華文報。事件之後《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的報份都下跌，莊宗南表示多少反映在報份，他指出：

當初是有受到衝擊，……看得到跌幅，大約是十巴仙。後來就慢慢的回升。有人這樣認為反收購的人是衝著《南洋商報》，甚至有人不知道《中國報》是南洋報業的一部份。

因此相對來說《南洋商報》報份下滑最為嚴重（見表四），狂跌的報份不過是前兆而已。華人社會對政黨控制的報紙失去信心，黃超明指出：

因為長久下去，你多幾個馬華控制的報紙被政黨利用來講一些假話或誤導群眾，那麼以後你華文報講的東西都會失去信任的基礎，那個就是他的危機。

來自馬華公會的干預往往比法令的約束還更難以控制，畢竟大部份政治干預目的都是為了個人私利。在內閣擔任部長職務的政治人物，因掌握政治資源和接近權力機關，對編務內容干涉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狀態。莊宗南坦誠：

華社反而不會埋怨報社的處理手法，反而是政黨會有，大選時會有裡外不是人的感覺。在執政黨或親執政黨的人就認為說我們親反對黨，反過來反對黨也是如此認為，左右為難。

面對來自各華裔執政黨的壓力，華文報似乎沒有招架之力。在事件之前，一些報紙仍堅持立場對貪官污吏和腐敗的政治人物做嚴厲批判；事件之後，這些反面新聞完全消失，出現大多是歌功頌德的報導。楊白楊從這三年的觀察中發現，揭露貪污舞弊的新聞減少了。一個政黨要去控制一家報紙最主要的目的即是希望其為黨服務，他說：

這三年的發展也符合了上述所說的……因為他們控制了那個報紙，可以不要登。從大選、從平時的作為，比如說馬華黨爭，那個控制了報紙的一派，可以時常放真消息或假消息，這個看得很明顯，有某些政治人物被肉麻的突出，白的寫成黑、黑的寫成白。

黃明來也覺得：

這就乖離了原本華文報應該為華社服務的角色。

因此，政黨收購報紙後的第一要務，即為如何凸顯「吾黨」及屬於我這個派系的豐功偉績，而非繼續利用政黨本身具執政接近權的優勢來加強對華社的服務。陳亞才也認為，這是必然的現象和做法。他指出：

沒有一個政黨收購媒體之後他會花很大的篇幅來談他黨內的問題，這個不可能的。……一個政黨維護其黨是必然的，他要將他的好處和優點做最大的擴大，要把他的缺點和弊病做最大的收縮……。

楊白楊也認為馬華公會干預太多，不時打電話給報社說明這個議題不能寫、那個議題不能登，有些議題根本與種族和宗教毫無關係。他認為這些人都是一群貪官污吏，他舉例說：

張明添基金你不能寫，這跟宗教和種族無關；交通部貪汙的問題不可以寫，這是什麼？跟宗教和種族沒有關係；林良實兒子的案件不可以寫，跟種族宗教一點關係都沒有，什麼關係都沒有。

葉觀仕在《馬來亞通報》擔任副總編輯時和潘友來在《中國報》擔任總編輯時，都親身體會到馬華公會對編務內容的干預。葉觀仕指出，當時馬華當權者天天到報館來指示編務工作，告訴編務人員那一則新聞要放大、該如何下標題等等。他激動的說：

你說辦報有如此的嗎？…………那時《南洋商報》被收購，我寫了十多篇有關政黨與報業的關係，結果他只登我一篇。

潘友來也指出：

等一下某個領袖又打電話來說為什麼你要登出來，或指評論為何這樣寫，你沒辦法引導一些需要客觀的看法。……

這些政治人物的小動作讓他們在處理新聞時多了一層顧忌，不能像以往般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在處理政治新聞時往往會考慮這則新聞是否影射的是老闆，潘友來坦誠：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有點開倒車的感覺……。

既然有立場顧忌問題，報社在處理新聞時便不可能有公正公平，肯定會採用某些手段來刻意凸顯或去除某些人。馬華公會一如其他政黨一樣都有派系鬥爭，因此在當權派控制的《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甚至和政黨關係密切的《星洲日報》，在內容上明顯偏袒當權派，甚至是評論稿。陳亞才、林金樹和葉觀仕都異口同聲表示內容上很清楚看出差別待遇，新聞會特別凸顯當權派 A 隊，對 B 隊的批評都是指名道姓，其他如馬華

公會新聞和正面性的報導相對增加，而馬華的競爭對手民政黨等的新聞相對減少，更不用說反對黨新聞；至於向來與馬華公會意見分歧的董教總新聞當然也不多見，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裁切照片。潘友來具體指出：

同樣一張照片在其他馬來報、英文報和《東方日報》你可以看到全景，但如果站著的是 B 隊的領袖，黨報的報紙刊出來時就會故意切掉這個 B 隊的人。

郭隆生也認為就算今天政黨不直接插手，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也對外界宣佈及保證報紙的公正性，但是報社的負責人敢越雷池一步對老闆做出批評嗎？他說：

你做什麼都會想到黃家定，這是肯定的，這是人嘛！我們都會想，比如今天黃家定做錯了事，你敢用大標題標出來嗎？當然是不敢。比如民政黨某件事情做得很好，你也敢用大標題標出來、稱讚他嗎？當然不敢，你一定縮小，保守一點，這是不用講明白的，但影響就在那邊。

莊宗南不否認報老闆對報社帶來的影響力，他認為編務人員不可能不顧及報老闆的感受，他說：

當報紙的經營者……有了這層利益在，就變成不能用石頭砸自己的腳，就是這麼簡單，舉個例子，原本在某個課題本我們可以盡全力去報導、毫無保留的批評，但變成會有內部自律、自我約束的問題，要拿捏的很好，有那些課題或被點到的地方是能夠被接受的，而不至於說可以暢所欲言，或多或少都會有約束。

除了儘可能凸顯馬華公會和神化領袖個人功德之外，政黨介入最大問題如同黃超明所言，在爭取華社利益的關鍵時刻，以華人政黨為名的馬華公會寧可犧牲華社利益。他舉《馬來亞通報》為例子：

他們也登很多華人社會的報導，不過在關鍵時刻還是以馬華利益為主……在跟董教總發生爭論的時候，《通報》都是站在馬華這邊，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公正，但在關鍵性的時候就站在馬華的立場……《通報》所以會滅亡是因為他變成馬華的附屬品，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這樣。

過去政黨干預的手法並不怎麼高明，一般都在新聞刊登後才會對報社施加壓力，例如打電話或透過一些政府官員利用出版准證來威脅報社，過程都是非常粗糙。陳亞才和鄭丁賢都認為後期這種手段似乎越來越高明，政治人物開始瞭解報社運作方式，懂得採用主動出擊姿態，一些議題未刊登前即已被擋了下來。陳亞才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黃家定出任內政部副部長一職之後開始掌管報紙。鄭丁賢指出：

政治人物的主動性提高了，最主動或最積極的動作就是收購，是最直接的一種做法，……我只能說他們的手法更加成熟了。

陳亞才認為，黃家定的柔性管制策略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但是效果卻是很明顯，完全擺脫過去動不動即恐嚇吊銷報紙准證或不讓報社更新准證，又或請報社負責人去喝茶。陳亞才所謂的柔性管制是私下透過電話做一些指示，甚至通過一些委婉的語言拜託報社負責人不要刊登太多這類的新聞，他指出：

這種轉變是慢慢的、柔性的，所以一般華社的人感覺不到這樣的一個轉變，實際上他在變。……可以看到的情況是，九〇年代尤其跨入二千年後，你會發現到……一個大課題突然間一夜之間他完全消失掉，比如說安華事件前後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同樣像我們比較熟悉的白小遷校事件，到某一段時間，媒體的朋友都很坦白的說我們可以幫你拍拍照、寫一寫，不過已經接到指示大概出不來了……。

早期報社仍然屬於比較能夠獨立操作的個體，也較能對抗政黨的無理要求，馬華公會介入報業之後，這種對抗的機制和能力便自然消失。馬華公會接管《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當天，即下令十位高層主管和編務人員²⁶立即離開報社，這種徹底瓦解「心腹大患」的作法在華文報界是前所未見的。

或許這種結果對政黨來說是件好事，但對廣大的華人讀者而言卻是一種無形的傷害，也瓦解了華文報過去苦心經營的公信力。因為政黨操弄報紙的結果是再也看不到批評馬華公會腐敗的新聞，相對的新聞版面成為凸顯個人或政黨對國家和族群「偉大貢獻」的宣傳工具。

反收購工委會主席陳亞才等人當初所憂心的是新聞過濾會更加嚴密，如今也獲得驗證，他開玩笑說：

我們有五家媒體，本來還要打五次電話警告，現在同一個集團，你打一次電話就解決了……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健康、不健全的發展趨勢，……對我們媒體長遠的發展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感覺到兩三年前的擔憂，今天都一一出現，當然我也深受其害。

如果以生存做為首要條件的話，在這種政局氛圍底下也不能全怪華文報紙選邊站。雖然華文報的新聞不至於像馬來西亞文報和英文報如此一面倒向執政黨，但只要報社負

²⁶ 勒令立即離職的名單包括南洋報業董事經理黃超明、執行董事古玉樑、《南洋商報》總編輯黃金河、《中國報》總經理黃明來、《中國報》總編輯潘友來、《中國報》副總編輯林偉強、《中國報》採訪主任呂堅強等人。

責人選擇特定人士或政黨做為新聞主軸時，便已經危害新聞多元化的生存空間，沒有了公平和自由競爭概念，試問要如何能說服自己做到不偏不倚的報導呢？朱自存以讀者身份來看，覺得今天買 A 報或 B 報都沒有差別，他覺得：

報紙沒有多元化……多一點報紙比較好，可以多一點選擇……雖然現在不同報紙去做同樣專訪，例如《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出來的報導都一樣，最大差別在於寫法不同而已……。

陳亞才也同樣擔心多元化內容消失的趨勢，憂心華文報會不會步上英文報和馬來西亞文報受到政黨百分之百的控制，進而淪亡。政黨結合報業集團意圖壟斷馬來西亞報業的結果，是新聞自由和多元言論空間被消滅，進一步危害新一代華裔年輕人的競爭能力。這種手段對一般華文報讀者、學界及一批青年社會運動倡導者來說並不陌生，許多例子可從馬來西亞文報和英文報的收編行動，以及鄰國新加坡報業統一所帶來的結果。

陳亞才認為過去的情況是大家都一致認為華文報比《馬來西亞前鋒報》（Utusan Malaysia）或《每日新聞報》（Berita Harian）好，其中最主要原因在於這些馬來西亞文報紙早已成為巫統的喉舌，即所謂的黨報。他指出：

你要從 Utusan 和 Berita 看到反對黨的訊息，除了負面的訊息之外，實際上是非常的困難，……今天這種現象慢慢地轉移到華文報，華文報好像步這個後塵……坦白講，我是很擔憂。……我認為《南洋商報》走的方向越來越像 Utusan，你不能說他沒有新聞，新聞很多……給人的錯覺越來越像黨報，就是馬華公會的黨報，在這份報紙裡不容易看到民政黨、國大黨的新聞，但是馬華的新聞很凸顯，這種情況就好像去讀 Utusan 以瞭解巫統主流派的消息。……而這個轉向恰恰好跟她過去所展現的……比較平衡的、比較多元的，反而是一種萎縮，基本上覺得是一個不健康的發展。

面對這種逐漸變質的內容，華文報是否會失去辛苦建立的公信力，到底是報紙甘願「自我淪喪」，還是政治環境被迫使然，對一份代表華人社會的報紙來說，似乎也逐步走向馬華公會的後塵——一個被華社放棄的華人政黨。

但仍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企圖挽回這個日漸沉淪的局面，希望透過改版等方式挽回讀者信心，例如《南洋商報》總編輯鐘啓章坦誠，收購事件對許許多多馬來西亞資深媒體人而言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他強調報紙內容紮實最重要，這種方式也許有助於挽回《南洋商報》跌入谷底的報份和聲譽。他認為部份社會人士對《南洋商報》產生誤解，並否認馬華公會有插手干預。他說：

可能一些比較情緒化的讀者就會說你們這是黨報，我們不看黨報……其實馬華

對我們是沒有干涉的，我們根據我們的專業來從事我們的新聞事業。……除了需要時間之外，也需要我們繼續的付出我們的努力，在內容上呈現給大家看《南洋商報》並非黨報。

韓新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林景漢也樂觀其成的說，儘管政黨會去控制報紙以掩蓋某些言論，但對於新報紙如《東方日報》就會報導馬華黨內鬥爭。他指出：

其他報紙就不會寫，所以說現在的華文報還沒大統一，或說被一家控制，所以還會有別種聲音出來。……都會有不一樣的言論。

鄭丁賢也覺得最現實的問題是，執政黨不可能收購所有的華文報。此外，以馬華公會來說，本身也需依賴華人支持才有辦法生存，政黨在現實社會環境中面臨客觀環境的牽引。他判斷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華文報的價值不會有重大改變，他認為：

南洋商報被馬華收購，但是他也不會脫離整個民族辦報的這個路線。第一個就是說他不可能一百巴仙（即百分之百）被政黨操控，一百巴仙被政黨操控的話他也不可能生存。第二，即使他被政黨操控，政黨的生存基礎也還是受到整個族群的利益、族群的權益或族群的價值判斷環境枷鎖所牽制，所以說，即使是馬華控制的南洋商報也好，他的改變並不是很大，只是對一些政府的政策沒有那麼大的反彈，他可能很微妙的去配合馬華一些政治上的意願，甚至是各別政治人物的需要，例如有些政治人物的照片大一點，馬華重大政策的新聞發表多一點，評論肯定一些，基本上不會脫離他原來的角色，而國家的大環境對華文報的影響才比較大或更大。

鄭丁賢所指的國家大環境，是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環境，他認為更多的干擾可能來自於馬華公會以外的勢力，例如強勢或主流政治、文化都會進一步影響華文報的生存空間。

這也直接反映了馬來西亞華人在多族群社會中各領域的地位，同時也說明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當中，仍然沒有一個像巫統是領導馬來人社會的唯一組織的這種認知，今天能夠領導或代表華社的團體太多。因此馬華公會掌控南洋報業並非只是向華社「自我表揚豐功偉績」如此簡單，他們企圖利用華文報重新建構馬華公會在華社的老大地位和影響力，意圖模仿巫統成為華人社會唯一的領導者，因此黃明來認為，今天馬華公會成為華社唯一的一個代表的陰謀在裡面。他說：

現在黃家定為首企圖透過馬華去控制華社，讓馬華成為並恢復五〇年代華社唯一的一個代表，而不是七〇年代或八〇年代，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黃家定，馬華總會長自然而然就成為華社最高領導人……今天他們企圖製造一個假

像認為說他是唯一、不可爭辯的華社最高領導人。所以不要忘記，在八〇年代、九〇年代當我們談起華社最高領導人或者最高領導機構，大家意見就分歧，有人說是在野的反對黨，有人認為說是董教總，有人認為說華團，所以華社領導中心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現在報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企圖營造出一個在華文報上的一個霸主，通過一報獨大的方式營造馬華成為華社唯一的霸主，那麼自然而然馬華最高領導層就是華社唯一的代表。

無法成為華社最高領導者這個弔詭現象一直是強調以華族為基礎的馬華公會心中最大痛處和遺憾。雖然馬華公會有有意圖重振「雄風」，但在這次收購事件似乎用錯方式，他們或許以為透過直接控制華文報紙可以達到三贏局面，即消滅黨內另一個派系的咄咄逼人，二來可以杜絕華文媒體對馬華公會繼續做出批判性報導，三來可以滿足某些企業稱霸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意圖。結果所做的災害評估卻低估華社反彈力量，華人團體組織反收購工委會展開一連串抵制活動，如罷買報紙行動、評論人罷寫等抗議行動²⁷。

由華人企業家啓德行集團主導的《東方日報》也在這種詭異環境下誕生，雖然大部份員工都來自《南洋商報》和《中國報》，但對華人讀者來說，她仍然是一份代表華文報業新氣象的全新報紙。原有的四家華文報的歷史悠久、各有特色，在華文報市場佔有一定份量，所以《東方日報》剛進入市場時處處受限是可以預見的。

到目前為止市場仍然以《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和《中國報》三家報紙為主導，陳亞才無奈的說，大家最苦惱的是就算發動罷買三家報紙的行動又能怎樣？他指出：

我們不同意政黨收購報紙，我們不同意報業集團被政黨收購，即使說你要杯葛不看這個報紙，但有人就認為不看這個報紙要看什麼報紙？

這種尷尬又無奈的兩難局面，對絕大部份接近和熟悉媒體運作核心的知識份子而言是心中永遠的痛。黃超明說：

不能夠說對整個華文報業失去信心，大家現在的感覺是無奈，沒有辦法……有識之士會擔心以後我們華文報變成政府的工具，或者一天天倒下去那該怎麼辦？對南洋商報失去信心這樣的一個說法是肯定的。

收購事件至今，南洋報業集團試圖釋放誠意來打動華社，例如由南洋報業基金會主辦、《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協辦的「華團與媒體的互動工作營」就是一個例子，受邀的演講者包括《南洋商報》總編輯鍾啓章、《中國報》總編輯莊宗南、寰宇電視（ASTRO）

²⁷ 其他加入聲援反收購行動的團體尚有馬克華文報人協會、國民醒覺運動（Aliran）、回教改革同盟（JIM）、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以及全國華團在代表大會上也通過議決案反對收購行動。

楊名萬、NTV7 主播方若琪、國家第五電台（RTM Radio 5）主播丁秀蘭、馬來西亞學者何國忠、英文報資深報人羅毓才及社團秘書長李雄之等人，並透過幾個相關主題，如「華團與媒體唇齒相依的關係、華團應該如何自我定位、華團與媒體如何打交道、如何避免彼此產生矛盾、華團在文報紙的定位等」（中國報，2004），甚至邀請現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及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來主持開幕典禮，企圖為現有的南洋報業困境解套。

表五：馬來西亞報紙及雜誌銷量趨勢（截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年份 報紙	1999 年 7 月 1 日 至 2000 年 6 月 30 日	2000 年 7 月 1 日 至 2001 年 6 月 30 日	2001 年 7 月 1 日 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	2002 年 7 月 1 日 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南洋商報	187,458 份	173,295 份	146,344 份	152,717 份
星洲日報	298,921 份	306,812 份	334,767 份	342,425 份
中國報	202,066 份	202,631 份	197,820 份	204,901 份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發行人審計局或稱馬來西亞報刊銷售量核數公證會（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Malaysia），2003。

第三節 內政部的關切和法令的約束

一般都由馬來西亞首相兼任部長的國內安全部，底下設有專門代理機構負責媒體出版和印刷相關事務（內政部，2004），包括出版與印刷准證的更新等。由於國家多項法令賦予國內安全部長相當大的權力，所以他們也常以國家利益、國家穩定和族群和諧為理由干預報紙新聞報導。

這種干預多半是在檯面上進行，例如召見各報總編輯討論某項議題或利用公文方式²⁸來禁止媒體報導或更改報導方式，基本上報紙只要按照指示去進行，就不會產生太大問題，畢竟這是按照「正常手續辦理」。

²⁸ 參見新加坡《聯合早報》電子報轉述馬來西亞獨立電子報《今日大馬網路報》的新聞報導內容：馬來西亞內政部正式下令所有英文報紙“調整”非典型肺炎的報導，不要說明具體的死亡病例。這封誌期 3 月 28 日的檔案，指示《新海峽時報》、《新海峽時報時報星期刊》、《馬來郵報》、《馬來郵報星期刊》、《星報》、以及《太陽報》的高級編輯們與政府合作。內政部出版物管制單位發出的兩頁指示由阿都拉欣代表內政部總秘書阿昔仄簽署。信中指出：“非典型肺炎被各語文主流報紙大事報導，特別是死亡病例。”當局認為：“政府擔心如此深入和廣泛的報導會導致不良後果，包括引起人民的恐慌。”因此，衛生部“尋求編輯的合作，調整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報導，不要把焦點放在死亡病例上，因為這將對公眾和旅客的信心造成負面的影響。”有關指示甚至在衛生部召開記者會宣佈馬來西亞沒有非典型肺炎之前，就在上星期五傳真給各家報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04-03

郭隆生回憶說，當年在全國大選期間炒得很熱的兩線制議題，也引起前首相也是內政部長的馬哈迪相當不滿，並召見各報總編輯。他說：

幾乎所有的報館都拼命登兩線制的課題，造成國陣失去相當多的席位，馬哈迪大罵我們，他很生氣，他自認自己替華社做了很多事，他不明白為什麼華文報還這樣的對待我，叫所有報館的負責人進去，很兇的罵我們達半小時。

但彭早慧覺得這種政府和報社的溝通並不能算是召見，她認為有關方面是希望報社能清楚瞭解國家為何要制定這個政策，透過溝通方式講解清楚，以釐清誤會。她說：

有時候有關當局考慮的東西比較寬廣，我們有的只是考慮國內所關注的；而當局比較注重在國家形象、國家利益或安全的問題，但這方面我們有忽略的話，他們就會提醒我們要注意。

彭早慧以安華事件為例，她認為這是馬來西亞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浪，無可否認的為國家帶來許多動盪，政府為了國家穩定，自然會較頻繁的向各媒體解釋事件的進展。她說：

政府一定是努力維持國家的穩定，不希望人民有乖離對這件事情看法的角度，……其實當時政府在透露整個事件的時候，他們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在那個情況之下，不適合很公開出來，他們也希望媒體能瞭解他們的看法。

報社對內政部的指示通常都會無條件照單全收，除了考量以國家利益為重之外，法令往往是關鍵要素。根據葉觀仕（1996）統計，至少有四十七條法令限制馬來西亞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其中最著名和最常用的即是國家機密法令、煽動法令、內安法令及印刷及出版法令。

在一九六〇年內安法令和一九八八年印刷及出版法令下，皆授權內政部長擁有絕對權利對任何一家媒體或個人採取法律行動。以在內安法令為例，「內政部長一旦認為任何出版物將會破壞和平、引起種族或階級間的敵意、有損國家利益、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他將可查禁有關出版物」（高佩瑤，2004：195），較著名是一九八七年十月「茅草行動」中《星洲日報》被勒令停刊。

另一個是一九八八年印刷及出版法令。法令中明文規定，所有平面媒體必須每年更新出版和印刷准證，從高級官員到內政部長，只要他們認定出版物可能危害公共秩序、破壞和平、引起種族或階級間的敵意、有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他們即可以查禁有關出版物出版、入口、生產、銷售等相關行為，而所有涉及者都屬刑事罪可處刑責之外，內政部長也有絕對權力決定是否發出新的出版准證或吊銷出版准證（高佩瑤，2004；葉

觀仕，1996），當年即有兩份華文報被下令禁止出版，朱自存指出：

一份是《星洲日報》，一份是《中國報》，報紙也沒有辦法，有那麼多的條例控制，例如出版法令控制了 Lessen，你的 KDN，也是沒有辦法不受那種約束。……我也不知什麼理由，他們慢慢發出 KDN，例如二〇〇四年十二月還沒有發出新的 KDN，那你二〇〇五年怎樣出版？弄到報館就很緊張。你一碰到這個就緊張，當然就受到影響，新聞自由也受到影響，至少新聞自由就少了一半。

另兩項被傳播學者和業者視為惡法的是一九四八年煽動法令（一九七一年修訂）及一九七二年官方機密法令，前者規定禁止任何人公開討論或質疑在憲法保障下的各項權利，例如各州統治者或政府權力、土著特殊地位、馬來人特權、國語或非官方語言等，這些質疑若引起以上特定人士不滿情緒，皆可被判刑。馬來西亞警方在二〇〇三年以此法令強制搜索網路電子報《今日大馬》。

一九七二年官方機密法令則只要有蓋上最高機密、高度機密、機密和限制字眼都屬於法令限制範圍。雖然在一九八七年修正法案中規定只有部長和部長委任的高級公務員才有資格決定一份檔案是否屬於官方機密，但只要違反者將可被判強制性監禁至少一年（高佩瑤，2004；楊善勇，2001；葉觀仕，1996；Hassan, 1990）。

法令限制往往是報社負責人最感頭痛的事，畢竟法令是清楚列明的條文，原則上只要不抵觸這些規範，報紙應該便可以順利出版。但很多時候政治目的或種族意識型態往往主導了法令詮釋的權力，以致官員在執行法令時常會依據個人的詮釋方式來行使這項國家授予的公權力，最主要原因在於「這些法令條文模糊，行政機關詮釋權過大，使法令字面意義不清楚及讓人無法瞭解其界線」（東方日報，2004），造成報紙在報導新聞時往往「分不清楚什麼是國家利益和什麼是政府的利益」（柯嘉遜，1990:118）。

一九九五年當時的副內政部長就曾對《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和《中國報》下過通牒令，他認為這三家華文報的報導破壞了種族和諧、人民團結及馬來西亞和鄰國的關係，並以吊銷出版准證為要脅限期兩個星期內改善報導（莊迪澎，2002）。因為一篇有關批評前新聞部長兼天災委員會主席，而被內政部召見的楊白楊回憶當年情況：

我去內政部問話，那傢伙拿我的文章來讀，什麼文章？我批評當時的新聞部長莫哈末拉末，當時古晉的煙霾八百多點，莫哈末拉末是天災委員會的主席，那個記者問他，他講我也不知道，我就鳥他，你是天災委員會的主席，你這樣子講話不是弄到人心惶惶？這個東姑瑪目拿我的文章來讀，我講我根本沒有錯，他是天災委員會的主席不應該這樣子講話嘛！我批評這個東西據我知道很多人同意我的講法。他說，我不是跟你談這個，不是談你的東西正確與不正確，我們是說我們這個國家沒有這樣的 Budaya（文化）。他講你是誰？你不過是華

文報裡的一個寫文章的人，你怎麼能夠可以對一個部長好像 *sedikit maklumat pun tiada*（馬來西亞語，直譯為一點資訊也沒有，有指責部長不具備基本常識或及時掌握第一手資訊的意思）這樣，用這樣的口氣來批評部長，我告訴你他的那種口氣給我的印象簡直是種族主義，你們華文報對一個馬來部長這麼不敬，好像你來找事情，他有這樣的口氣，所以你講底線在那裡？

華文報對政府官僚體系的批評常被誤認為對馬來人的不友善，如同前面提到，因為政府機關官員多是馬來人，所以華文報常在這種情況下蒙上清白之冤。楊白楊續說：

說我們對這個馬來部長……就變成一個種族問題，這是什麼種族問題，我只是寫文章評論這煙霧的問題，假如天災委員會的主席是華人，我也一樣批評他，對我們來講，我們根本不是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是他們。

第七章 多族群環境下的西馬來西亞華文日報

以巫統為首的執政黨一方面對外宣稱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對內卻處處以主人自居，無視於兩大種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努力經營。馬來人始終無法放下自一九六九年「五一三種族流血衝突事件」之後所訂立的特權，使得各族沒有機會以一個公平對等的方式競爭。

一九六九年之後華人在政治領域上面對自獨立以來的最大挫敗，馬華公會在執政團隊中失去崇高地位，國民統一陣線（簡稱國陣）取代聯盟，巫統趁勢坐大形成一黨獨大（黃明來，2003）局面，只能無條件接受巫統的威權統治（張亞中，1997）。馬華公會政治地位被邊緣化，無法與巫統平等的對話，一些專研馬來西亞政治的學者甚至毫不客氣指出，馬華公會早已淪為巫統的附庸（張應龍，2001，轉引自林若雲，2001）。

獨立以來各族間維持平等地位的機制開始瓦解，國家機關強勢介入以土著和非土著名義來劃分不同宗教信仰、文化習俗的族群界線，此舉成功將馬來人推向社會發展的核心，但也進一步蠶食其他種族的生存權益，例如華人公民權問題、馬來統治者特權、馬來語為唯一官方語言、馬來人特殊地位、新經濟政策、馬來語為唯一教學語的國家教育政策等。馬來人至上的意識型態在馬國政治氛圍中瞬間形成，從此在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裡擁有無上的支配權力（林合勝，2001）。

無可否認的，在八〇年代馬哈迪上台之後，政治力量和意識型態干預更加嚴密，許多馬來政治人物為了政治資本刻意挑動馬來人對華人不滿的情緒，例如教育部長曾表明將非土著歸類為新移民、副首相指華裔商人不效忠國家、一些馬來領袖更稱華印小學是種族兩極化的根源及馬來西亞語應是華印的母語（水興浪編，2003）等偏激言論，加上族群界線的重新洗牌及政策對非土著的歧視，進一步加劇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的分裂。

處在不公平政策和種族意識型態充滿的氛圍底下，華社唯一的傳聲工具便是華文報，也是唯一全國華人討論及辯論的溝通平臺。但礙於各種因素影響，華文報得避免不讓馬來人誤以為在挑戰他們的特權，不發表具有煽動種族情緒或引起馬來人不滿情緒的言論是大家的共識，這與華文報過去敢怒敢言的形象和現在凡事妥協和奉承態度有著天淵之別。

華文報如何堅守立場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一些報社選擇繼續奮鬥到底，一些另闢新中間路線，一些則選擇放棄捍衛華人使命，例如《通報》最後被華社放棄即是一個典型例子，華社無法接受做為華文報在關鍵時刻選擇捨棄華社利益，並以馬華公會利益為最大利益，這是華社所不能容忍的事。

採取兩面都討好的做法，是即不得罪執政黨，亦不得罪華社的新中間路線，如《星洲日報》堅守報老闆的辦報目標將報社推向國際舞台。今天的成功絕非依賴單一政黨或華社可以完成，張曉卿立場的確定和員工的堅持，讓《星洲日報》超越《南洋商報》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大華文報。但《星洲日報》在收購事件期間的表現讓華社徹底失望，他們選擇以不報導做為報社立場。陳亞才（2001:4）指出「任何有關民間反對政黨控制媒體的文告或新聞，直到五月二十九日才開始有相關新聞見報。」

收購事件落幕之後，華文報只剩下兩條路線，一條是支持和擁護馬華公會利益的路線，一條則是選擇和特權階級奮鬥到底的路線。前者包括現有的四家華文報，後者如《東方日報》，以批判政商勾結企圖壟斷華社輿論為最大訴求。

新路線出現並不代表華文報從此脫離現實環境所帶來的困境，面對馬華公會以外的政治壓力並未減弱，尤其是馬來西亞文報對華社的不友善態度及逐漸加深的種族結構性問題。前者或許可以採取很多消極或積極策略來應對，後者在種族意識型態氛圍社會環境中，尤其是華文報選擇向執政黨利益靠攏下逐漸失去抵抗的能力，這可能是一個無法改變的即定事實和悲劇。

以下研究者將分成三節討論多族群社會環境下華文日報的困境及其採取解決或自救的方法。第一節主要是針對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的華文報如何嘗試在國家利益和族群利益中取得雙贏；第二節將討論在追求理想過程中如何面對主流媒體的挑釁及政治人物種族意識型態的挑戰；第三節進一步分析在面對這些挑戰時，華文報採取那些消極或積極措施來捍衛華文報的地位。

第一節 追尋國家利益及族群利益

目前馬來西亞面對的最大困境在於無法釐清誰是馬來西亞人的概念（Puah, 2004），各族對馬來西亞這四個字都有不同解釋。以佔國內人口數最多且掌控政治權力的馬來族群來說，他們普遍上無法認同反對黨所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概念，認為這個概念將破壞及削弱馬來人的特有權力，馬來人始終認為馬來西亞應是馬來族群所獨有，其他種族都是外來移民，所以出現所謂的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楊建成，1982）的說法，以及馬來人土地（The Land of Melayu）的認知。因此站在馬來人立場，國家利益這個概念在馬來西亞並不同於全體國民的利益。林若雱（2001）也認為馬來人很難將華人和印度人視為同胞，因為他們之間原本就已存在若干種族和文化偏見。

今天看到憲法保障下的馬來人特權，還有部份馬來執政者對華人抱持不信任態度，都建立在馬來人是主人的大前提上。每當華社對保護族群利益的動作稍微大一些，華文

報紙報導稍微跨前一些，偏執的執政者和政府官員便會用一貫語氣來質疑華人，甚至透過馬來西亞文報紙質疑華社的國家認同，這也說明為何華文報至今仍然繼續為華社的國家認同在辯護。

建立在主客的立基點上，巫統裡部份種族主義者對馬來西亞文報刻意挑起種族情緒避而不見，對華文報的自我辯護當做沙文主義，這種局面將不斷延續。如何在國家利益和族群利益中取得平衡，是華文報未來應該慎重思考的問題。朱自存就說：

華文報還可以做很多東西，但不是你要做就可以做，比如說我們要表達一些主張，對國家、社會或對個人有時候並不容易……。

處在多族群社會裡，國家穩定是各華文報追求的最基本目標，因為國家利益代表著對個人及國家認同和效忠的程度。彭早慧指出，進入九〇年代之後，執政當局以國家利益和國家穩定為主要訴求。她說：

華文報先天性問題是避免不了，但族群利益也是國家利益，你不能將自己劃分在國家以外。我想我們會更小心保持實情和合理，比處理其他新聞的時候更注意客觀性。

潘友來、莊宗南、黃超明及朱自存等人受訪時也一致認同，雖然站在華文報立場應該以華人族群利益為主，但在馬來西亞特殊多族群社會環境裡新聞應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尤其在面對種族、宗教的議題，做為一份報紙不可能還刻意去挑動敏感神經，製造社會動亂，這不僅是做為一個媒體人的責任，更是做為國家一份子的責任。莊宗南指出：

做為華文報，……在做出任何東西之前也要顧慮到，比如說報導一個東西能引起國家動亂，民族衝突的話，你也要衡量，不能以族群利益為最大，不顧國家安定，民族的和諧，這是雙向的。

潘友來也認為執政黨並非是個無理的政府。他說：

你只要提出的不是無理的、製造動亂的、製造社會混亂的東西，沒有理由政府會去……什麼東西都要壓你的，我們的政府基本上還不至於如此，……。

華文報對國家利益、族群和諧的認知並不代表說永遠將華人權益擺在最後面，或者犧牲華族群利益。大家也都一致認為在面對族群權益被嚴重剝奪的同時，華文報有義務和權力為華社爭取公平待遇。換言之，面對部份極端政治人物的無理要求時，華文報也不可能眼睜睜看著一個個對華社極為不利的政策一一實行，應該堅守華社利益不能被侵

犯，華文報不能以商業因素做為迴避的藉口，因為這是與生俱來的使命。黃超明堅定的說：

華人社會的利益不能不記得，尤其是到了關鍵性階段，華人的利益不能不維護，這個方向肯定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是有很多手段的……。

莊宗南也認為有些事情可以避免，但有些則不行。他說：

例如族群問題浮現，並關係到整個華社，這就無可避免，無論如何都要去爭取。

相較於馬來西亞文報的不成熟，華文報對那些議題可以在現有的政治氛圍中大肆報導、那種情況下必須暫時擱置華人權益等技巧，都可以掌握和拿捏清楚，華文報的自我控制能力相當強，鄭丁賢承認華文報在某些議題上仍然可以控制在一個合理範圍內，華社還沒有提出一個偏激的訴求會傷害到國家利益，甚至威脅到其他族群的權益。他指出：

這和馬來報的情況不一樣，他會可能會提出一些過火的東西，比如說他們質疑華人公民在馬來西亞的權益，他們可以進行這樣的評論，但做為一個華文報媒體，我們華社還沒有超越那個階段。

所以和其他語文報比較起來，華文報在華社眼中並不單只是一個協調工具，在官方眼中也並非一份華文報紙如此簡單，尤其是在建構對國家、政黨、族群認同及凝聚華社力量上，華文報比起其他工具如政黨，甚至一般華人社團來得更更有力量，否則像馬華公會也不致於要插手報業營運。如同潘友來所說，華文報從過去到今天其實已經不僅限於在多族群社會裡扮演如何去協助國家建設、促進族群團結、民族和諧、維持華人社會訊息的流通、照顧華人社會的角色。他說：

到今天可能更進一步的強調如何更民主化或更開放的社會。

第二節 意識型態作祟和主流媒體的挑釁

西馬華文報面對兩大壓力，一是政治官僚常用出版准證和法令來限制華文報輿論方向；二是以馬來種族意識型態辦報的馬來西亞文報。華文報對前者的動向比較能掌握；對後者的挑釁常感到無力。部份巫統政治人物不時透過馬來西亞文報紙，以濃厚種族意識型態的言論針對馬來人和華人的差別做論述，甚至懷疑華人社會對馬來西亞的效忠程度，當中尤以《馬來西亞前鋒報》最為嚴重，但礙於法令約束和做為華文報紙，通常都只能默默忍受。

主流媒體的挑釁並非直指馬來西亞文報針對華文報的言論或新聞有所批評，而是對刻意在某些議題上挑釁馬來社會對華人社群的情緒，例如在馬來人特權風波事件中，馬來西亞十二個青年團發表聯合聲明指責《馬來西亞前鋒報》「不顧及國人及社會的安寧，任意炒作政治課題，以致社會瀰漫緊張的氣氛」（中國報，2000）。馬來西亞華團大選訴求工委會秘書謝春榮也認為《馬來西亞前鋒報》「故意在這個時候挑起工委會在去年所提出的課題，並且以封面頭條來報導，足見該報企圖借用此事件挑起種族課題」（星洲日報，2000）。

做為華文報是華社共同體的這一個前提下，華文報不可能眼睜睜看著華社被馬來西亞文報污蔑和抹黑，在必要時候仍然必須挺身而出保護華社，這種維護華社利益是天經地義，如同馬來西亞文報站在維護馬來社會立場是一樣的，不能放縱馬來西亞文報的無理取鬧，但我們可以觀察到，華文報對這一類的報導都沒有做太多的著墨。

馬來西亞文報的種族意識型態由來已久，它代表著馬來社會的一種思想的信念，甚至是一個制度。如同林淑惠（2002:27）所言，所謂的意識型態「在「唯物論」與「社會決定論」的理論家眼中，……通常被預設成「社會的結構」（Societal Structure）的一個「場域」（Locus），相當於思想與認知的模式、價值體系、宗教信念等等，而其內容則被認為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邏輯上先於它而存在的「社會結構」。」所以馬來西亞文報和其他語言報一樣，都是組成馬來人社會的重要環節，在大部份時局下馬來西亞文報在國內站在馬來人的立場講話，面對國際社會即對抗美國站在回教徒立場說話，在政治領域上則站在巫統的立場批判回教黨，對他們來說這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鄭丁賢認為他們所肩負的馬來人使命同樣很重要，例如《馬來西亞前鋒報》的報導立場也是站在馬來人權益上，最重要一點是他們是巫統的附屬品，所以在很多政治議題上必須貫徹巫統的意見和政策。他說：

他們很多東西就超越了一定界限來滿足黨的意思。還有就是巫統本身的民族使命感的無限的擴大，影響甚至威脅到其他族群及各族間比較和諧的情況，華文報方面還不致於有這樣的情況。

面對如英語教數理議題，洪松堅就曾對國內安全部官員說：

馬來報紙也玩得很過火，我們在對話中也跟他提出說，你整天要我們做好孩子，你看馬來報怎樣做？

不容懷疑的是馬來社會和華人社會間會產生誤解，有一半因素來自於這些報紙的不成熟報導。所以華文報不得不在關鍵時刻針對部份政治人物的不負責態度和政策發表評論，表明華社立場和感受，但往往如同莊宗南所言，華文報跟進做後續報導的時候，馬

來西亞文報即會反過來指責華文報再度玩弄這課題。他說：

其實是馬來報在挑起這個課題，往往事情就是如此。……有時報導出來東西是正確的，但馬來報就把他歪曲，有很多例子都是這樣，造成族群間的誤會。……看在華文報的眼裡這是一種很大的誤導，但往往這事情就這樣發生，華文報不能做些什麼？……我們也會想到，但不能刻意去做，當我們再去報導時，就會被他們認為我們是故意挑起這個課題，而這他們就指當局……。

無可否認從八〇年代一直到收購事件發生之前，華文報的確花了不少心思在穩定政府和華社之間的衝突。但鐘啓章卻認為華文報比起其他語文報較偏愛報導負面新聞，以華文教育為例子，他覺得並非說不可以報導，而是連續性報導會引起執政當局認為華文報是在煽動種族情緒。他認為：

報導一天或兩天政府就知道你們華人社會的心聲是這樣，那麼他覺得這已經夠了，……華文報這樣的一個課題你可以報到連續兩個星期，不停的報導，他們就覺得這樣子做就過火了，就變成是一種流於煽動性的，太過負面，煽起族群對政府不滿的情緒。

他並不否認馬來西亞華文報在某些關鍵議題上刻意渲染，但他認為這只是部份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而做出的小動作，並非政府的意思。但由於政府和華文報的出發點不一樣，因此常會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如同前面提到，政府都以國家利益和穩定為前提，但華文報不能不站在華社立場說話。就如鐘啓章所言：

華文報是處於一種關心，尤其是華文教育。華文報跟華文教育畢竟是唇齒相依的，習習相關的。如果華文報不去維護華文教育，那也就沒有其他機構可以來維護，對華文報來說是責無旁貸的，所以這是不同角度來看事情，華文報是從華社的角度來看，政府機構可能是從整個國家利益、安全、穩定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鐘啓章的談話也顯示出他內心的矛盾，因為做為華文報，一方面不得不站在華社立場爭取應有的權益；站在政府立場，鐘啓章又覺得華文報報導手法似乎並不妥當，對部份有良知的華文報媒體人而言，尷尬進退兩難的局面即是最佳心情寫照。更重要的是，官方容易聽信馬華公會的「報告」做出判決，這種手法並不能徹底解決華社困境，反而增加更多問題，所以最後執政黨對馬華公會的介入採取了樂觀其成的態度。

第三節 自我控制和設限的華文日報

在面對新局勢的轉變，我們似乎可以從新聞版面中觀察到社會新聞增加的趨勢。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一件事，即各報似乎無力對抗來自各方的壓力，也證明了馬來西亞新聞干預逐漸檯面化，或者如鄭丁賢所說干預的手段越來越高明了。潘友來不否認國情或政策對新聞版面各類新聞的調配產生影響，黃明來認為華文報都受到自己的框架約束，換言之是報社本身的自我約束增強了。潘友來指出：

尤其是有鬥爭的時候就更加明顯，有鬥爭時一定會用你這份報紙來，所以很大的其中一部份是報館背景的問題，使到做事的人難免會去避免一些問題，就索性把重點……多報導車禍、打死人、打搶等這類新聞，就不會有很多的干擾。

這種報導手法看似可以解決華文報所有的困擾，但沒有人敢下定論這是否能真正解決華社問題及政治人物的挑釁。但如同朱自存所言，報社也不知道這是不是讀者所愛，但可以肯定的是娛樂新聞和社會新聞的確比政治新聞安全多了。因為凡足以引起馬華公會或執政黨不滿的新聞減少，將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馬華公會「打小報告」的困擾，也避免內政部等官員召見。就如同葉觀仕所言：

報紙的內容應該反映整個華人社會，但現在太粉飾太平。

這和過去華文報「打帶跑」的方式有天淵之別，以《中國報》處理白小事件為例，是接到內政部警告信之後才停止新聞報導。呂堅強回憶說：

那時《中國報》的策略是打了就走，……都是玩到最盡，玩到接到信才停，那些意見肯定是和馬來報如 Utusan 是不同，……《中國報》有一陣子在下半年裡接到三封信都是 KDN，第三封最嚴重，如果再不停止就要被停刊及收回 KDN。

相較於被政黨控制的馬來西亞文報和英文報，華文報過去的言論確實比較自由、比較大膽，其中也包括民生課題。潘友來舉例說：

例如某個課題《中國報》會報導很多，或者說 NST 或 Utusan 只會放一張照片，……尤其是評論方面，之前我是感覺到華文報紙的空間比較大。

陳亞才、莊宗南和鄭丁賢都認為這種自由仍然有其限度，華文報本身都會先設置一個界線，跨過這個界線之後才會再考慮這個議題會帶給華文報多大困擾，所以各報在很多所謂敏感議題上都會嘗試先去試探報導的尺度或底限在那裡，畢竟法令所給予的解釋

太過模糊。因此一些較為大膽的華文報採用了「打帶跑」方式，一些則採取較保守的以退為進做法，一開始會針對某一議題做全面性報導，之後再等候「上面指示」，例如莊宗南所言：

往往到某個階段時都會有個指示下來，這個課題差不多玩夠了，不能再去報導，否則就是渲染……。

陳亞才也說：

放寬到某一個程度受警告就馬上萎縮，或者說某個課題登了之後，某一段時間馬上就緊急剎車就不見了。……所以九〇年代流行的一種普遍現象就是會刪稿，他認為很敏感，他認為不方便的刊登的就幫你刪掉，甚至更誇張的會幫你改掉、改寫。

但這種「指示」並非全面禁止刊登，而是在後續的報導拿捏上須小心謹慎。莊宗南認為，只要新聞尺度拿捏得好就不太會有太大問題。莊宗南說：

例如白小事件，在大選前反對黨就會重提這個事件，希望能通過報紙炒熱此課題，但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會考量在這種環境底下如何去處理相關課題，包括課題重新被提起的動機，是不是適當，我們都會去看清楚。

鄭丁賢也認為，其實在政府開始著手干涉之際，新聞的效果就已經發揮出來了。他說：

你傳達訊息也好、凝聚共識也好、在整個動員之中已發揮了效果、已經成形了，到最後讓政府開始緊張的時候，基本上到了那個程度，報紙的角色已經發揮了，所以往往很多這類的事情，到了最後一個階段，政府會告訴你說這類課題不要再突出，他當然不會告訴你說不要去報導，但是他會有一種態度說你不要報導那麼多，比如說你不要用在封面，或者你可以報導，但不要去致詞、不要去表態，……。

華文報的顧忌多來自於「茅草行動」和「五一三」事件的陰影，兩個事件都對華社和華文報造成嚴重傷害。但重點在於馬華公會身為華人政黨並無意要協助華社和華文報走出歷史事件的陰霾，反而意圖模仿巫統掌控媒體經營權的方式進一步干預華文報的運作。所以如同莊迪澎所言，萬一比較有權有勢的部長對某些人物如華團領袖有所批評時，華文報即會馬上縮小報導的篇幅和尺度。他指出：

若要評價是「堅定立場」或「妥協順應」，我認為不能簡單二分法，而是「見

風轉舵」。

其實嚴格來說，只要不涉及國家利益或挑戰巫統當權派，政府是不太在意、也不會參考華文報的報導，但很多時候是馬華公會有心者的煽風點火，形成政府和華文報對立的局面。絕大部份對華文報的新聞控制都來自馬華公會當權派人物，尤其是在內閣擔任部長的代表。在收購事件之後，今天報紙所呈現的結果是反收購工委會的新聞消失、被馬華視為搗亂份子的董教總新聞也縮減了。朱自存就指出：

以前有很多董教總的新聞，董教總也很依賴華文報。我最近看到陸庭瑜，教總副主席說回教黨給地、給錢華總，受到執政黨攻擊……，這個新聞小小報導。……雖然以前不會說很大，但至少不是現在這樣，華文報受到自律影響，報社裡面做工的人，我不知道什麼理由，受到自律影響，有時候這種影響是看不見的，他只要說打個電話給你說一句話：這不太好，就可以……。

表面上各報負責人都不太願意承認有自我設限的問題，絕大部份都以整體國家利益和媒體責任做為掩護，試圖給自己一個緩衝機會，所以如同洪松堅所言，錢固然要賺、報份固然要注意，但同樣要考慮可能發生的不良後果。他認為：

在取捨的時候要達致一個平衡，除了要賺錢也要照顧到種族的環境、客觀的環境。……比如會導致種族衝突的新聞，我們儘量給他平淡的報導，長期以來都這樣做。

綜合大家說法，目前華文報所採取的自我控制和設限的手法可以分成四大類，一是改變遣詞用字；二集中報導社會新聞；三是轉移議題；四是縮小版面或調整版面。這如陳亞才所說因為涉及到法令約束及干預。他說：

可能就把這個原有的版位轉移到其他地方，……比如說政治新聞，……只能報導正面的，不能報導負面的，不能批評或者不能追蹤，……你沒有辦法追蹤，因為他有官方機密法令等，追蹤到一個階段就停了，追不下去了，……尤其是官方認為你這個好像是親反對黨，或者是對執政黨不友善……。

第一類所謂的改變遣詞用字如洪松堅所說，避免使用太過強烈的字眼去表達，他認為：

即要反映華人社會的心聲，又不會引起政府對我們採取行動，這是要有一些功力，在新聞的表達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取巧，……這都是我們所能夠做到的。

第二類如潘友來和陳亞才指出的集中報導社會新聞，他們轉移到不敏感題材的報導

手法是一種策略，也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未來的報導趨勢，潘友來覺得這是一種比較不健康的發展，但確實是比較安全的做法。潘友來認為：

因為社會新聞沒有負擔，沒有人來責問你，沒有人會問你為什麼批評我、為什麼提出這些問題，……以社會新聞為主，即使是所謂的大報，例如《星洲日報》也好、《南洋商報》也好，華文報的生態不是那麼的好，大家一窩蜂往不會引起問題的題材，……而比較教育性、比較引導性的就比較少。

陳亞才也指出：

在政治氣壓比較低的時候，……比較基本的做法就是轉移，轉移到敏感度比較低的社會新聞。……在我們國家我覺得他所處理的手法有點避重就輕，避免踩到地雷，……。

第三類是趁機轉移議題，如莊宗南所說：

當某個很熱門課題在 on 住的時候，突然間有個大的 issues 發生，可能注意力就轉到那邊，更何況如白小事件都已經是米煮成飯的局面，……。

這種轉移手法和上述集中報導社會新聞方式有很大的差別，這裡所謂轉移議題就是利用一個重大的新鮮議題來取代舊有議題的版面，但是舊議題並沒有從此消失，只是調整刊登版面或是暫時停止刊登。這種手法往往是應付敏感課題最好的策略，一來報紙有臺階可以下，二來不會讓讀者覺得報紙沒有自主權。

第四類是縮小版面或調整版面，這也是屬於比較積極的做法，例如對鐘啓章而言，相較於其他報紙，《南洋商報》只用一個版面來處理某些敏感議題；對許春來而言，《星洲日報》做法則是每天用不一樣的版面去呈現新聞議題。鐘啓章就表示：

之從我到政府機構轉了一圈後再回來報界，有時候我覺得有時候不要看別人怎麼做，我們憑著自己的良心從不同角度，從我們本身的角度、從華社的角度、再從政府方面的角度來看問題，我們要看這問題如何處理，是適可而止嗎？那麼就做到適可而止，做到某一個程度就好啦，可能這個課題我們只玩一版，別人可能玩兩版，那就是別人的事情，我們不要再去看別人怎樣去玩，因為再這樣鬥下去，再玩下去，這件事就會失去控制，所以這是應該自我自律的。

許春指出：

報導的時候是看手法的問題……這個被挑起的課題，如果你天天做封面版的頭

條，假如你的用詞全部很激烈，肯定你就會挑起刺激人家。但是有可能我們同樣的報導同一個東西，不是說每天放在封面版，可能說今天封面版，明天放第二版、第三版，或是其他版位，所以你就是比較淡化他，不過我們不會說不報導這樣的問題，我們會報導。

雖然有時候壓力來自於華文報本身，因為過去的陰影仍然環繞在報社主管心中難以釋懷，許春、莊迪澎、鐘啓章和潘友來即坦誠，經歷了「茅草行動」之後，各報的言行舉止都變得小小翼翼，自我控制就變得比較嚴格，因此也形成許多顧慮影響了華文報做為一份報紙該有的角色。莊迪澎（2004）就以「見過鬼怕黑」來形容過去和現在華文報業的困境。許春指出：

我們曾經被關閉過，死過的人會瞭解生的重要，……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是雞蛋，而你是一個石頭，我不會硬硬的去碰你……。

鐘啓章也同樣認為：

我們在做報紙的時候，也不時自我提醒、自我約束，不可以超越一些底線，尤其是涉及一些種族敏感課題的時候，我們都要非常的小心，……。

另外出版准證的壓力也是一個無形的枷鎖，潘友來就說：

很不健康的一個情況就是說每年都要更新出版准證，……你會擔心說會不會某一件事情連這方面都會受影響……。

莊迪澎認為，這種轉移策略對某些報紙來說是高明的手法，有時讀者反而會去體諒報社的做法，其實這是相當無奈的。他說：

為了「安全」起見，避開「政治」，轉戰「文化」，是一種高明的轉移（讀者）視線的策略。人們對它們（報社）推動文化活動心存感激，對報社在政治議題上的偏頗、沈默，不是視若無睹，就是表現得非常寬容、諒解。

第八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角色及功能的調整與轉變

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存在著根深柢固的種族結構問題，馬來政治精英從英殖民政府手中接掌馬來西亞政權之後，試圖改變英殖民政府過去所劃分的經濟結構，「五一三」事件正好為當時的國陣政府找到一個重新劃分各族在經濟領域所佔地位的合理化藉口。政經勢力版圖的重組，使獨立前各族間的各項協商和承諾一夕之間化為烏有，以馬來人優先的種族意識型態治國方式也從此在馬來西亞展開。

巫統在種族敏感時機中趁勢減弱馬華公會的力量，按照黃明來（2003:13）的觀察，巫統改革派在短短的二十一個月內「將馬來西亞由多元共存民主制度，轉變為馬來人優先民主制度」，確定巫統一黨獨大的形式。

巫統雖然經歷兩次幾乎動搖國本的黨爭和金融風暴，仍然沒有改變巫統即是馬來西亞、巫統就是國陣、巫統也是國家地位的事實。這完全歸功於國家機關在「五一三」事件之後，透過國家政策重新劃分種族界線的結果。

執政黨成功將國家區隔出四種不同型態的社會，即：馬來人社會、華人社會、印度人社會及其他種族社會；換言之，「五一三」事件是國家重組的第一個分水嶺，各族群在各項法令的限制下只能安分守己地待在各自的領域，例如馬來人社會享有經濟、教育和文化等領域上的絕對特權。族群界線的重組，使馬來西亞陷入一種「馬來西亞人」認同的危機，這種以單一族群領導國家的認同模式至今仍然影響著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的發展，且無助於馬國形塑各族和平相處的多元文化社會。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曾提出「馬來西亞國族」的概念（Malaysia Nation）²⁹，意圖透過單一的國族認同建構淡化多元族群認同的分歧，以取代反對黨所提出的馬來西亞人（Malaysian）說法，但其前提仍然建立在以馬來人為優先的基礎上，對消除各族間的

²⁹ 馬哈迪提出馬來西亞國族之後引起部份馬來菁英恐慌，他們擔心會失去馬來人特殊地位，隨後馬哈迪提出新馬來人概念來消除馬來人的憂心。陳允中（1995）在《馬來西亞九十年代的國族營造》一文中對馬來西亞人和馬來西亞國族做了定義，他認為，「馬來西亞人」（Malaysian）和霸權集團由上而下定義的「馬來西亞國族」（Malaysian Nation）是完全不同的意涵。前者是以多元文化為前提，較寬鬆定義下的公民（citizen）；後者是以馬來文化優越地位為前提，同質及馴化的國族（nation）（轉引自木馬城，<http://mumacheng.com/>）。

界線和歧異仍然毫無幫助。大多數學者認為，除非憲法中列明的土著和非土著差異得以去除，馬國政府才有可能完整建構出新的國家意識和馬來西亞人的認同。

華人社群對於國家提出的政策往往處於被動狀態³⁰，何國忠（2002）用「如夢初醒」四個字來描述當年華社對國家文化政策的「遲鈍反應」。這種反應同樣出現在華文報紙，在面對來自官方的指責和主流報紙的挑釁時，華文報往往缺乏積極面對的精神，相反的，卻對華文報與華文報之間的角力顯得格外用心，例如《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在九〇年代因為《星洲日報》職員在《南洋商報》發表文章，而引發兩報以報社名義發表文章相互對罵（亞洲週刊，1990），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華文報業間的激烈競爭一直延續到馬華收購事件之後，新報紙——《東方日報》的出現，則使各華文報不和的情況持續惡化，《東方日報》與連成一線的四大舊報紙之間從收購事件前的明嘲暗諷到收購後的相互責難，完完全全反映在各報新聞、評論，甚至讀者連線的特稿上，如《東方日報》³¹的總編聯線和《星洲日報》的溝通平台。各華文報不合的弱點，為馬華公會找到掌控華社的契機。而華文報、華人社會和華人社團所組成的鐵三角出現缺口，不僅讓馬華有機會鞏固其華社領導地位，也得以消除該黨在華文報上的輿論雜音，收購華文報無疑是馬華公會瓦解鐵三角力量及增加華社談判資本的有效途徑。

華文報和華人社會是一種共生體關係，獨立後至「五一三」事件前這段期間，兩者在重構華人社會有著重要影響力，華文報不僅和華社共同面對新國家認同的衝擊，在與馬來統治者談判和協商的過程中更扮演重要角色。但「五一三」事件這個政治分水嶺改變了華社生態，更直接影響鐵三角的角色扮演，更多的法令約束華文報和華文教育的發展，這亦反映了華文報問題即是華社問題的事實，反之亦同。

華社經歷了《通報》和《新明日報》收編後的結果，因此難以接受華文報成為馬華公會喉舌的事實。更重要的是，他們擔心馬華公會會重蹈「茅草行動」覆轍，在關鍵時刻無法保障華社基本權益，因此對華文報的期待和依賴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無需懷疑華文報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中所佔的份量，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為何華文報經歷了數十年的紛紛擾擾都能在殘酷的環境中存活，卻在新世紀來臨時陷入角色定位搖擺不定的泥沼當中？這個疑問在前述章節已給了我們答案。報社面臨內外環境改變的事實，不僅加速鐵三角的分裂，更讓華文報和華社漸行漸遠。

³⁰ 以國家文化政策為例，國家實施十年後公開表示要各族群檢討國家文化，這時華社才開始積極及有系統投入檢討工作，並擬定「馬來西亞全國華團聯合宣言」並重申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語文、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的社會，文化政策的制定應以承認及接受我國社會的多元性本質為前提（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85）。

³¹ 《東方日報》最近刊登名為「東風吹」系列特稿，其中「往事並不如煙系列」就是針對《星洲日報》的溝通平台和該報口號之一「正義至上」大肆批判。

九〇年代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的第二個分水嶺，華人政黨結合華商企業的併購行動改變了華文報業生態。一個爲了鞏固其華社主導權，另一個爲了成爲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大王，而仿倣巫統當年以股權結構掌控《馬來前鋒報》的手段，利用政治力量和國家機器強行介入華文報業的營運。這種做法和當年巫統劃分種族界線的手法如出一轍，不僅扭曲了華文報應有的傳統角色和功能，也讓一直被認爲是屬於全體華人社群資產的華文報變成馬華公會的宣傳工具及附庸品，陷入爲誰而報的兩難局面。

今天各華文報，尤其是南洋報業是否會重蹈《通報》和《新明日報》的覆轍遭華社遺棄，仍有待觀察，但從四家華文報在收購事件後對部份華社菁英言論的封殺，以及時評家與撰稿人等展開的罷寫行動、《南洋商報》報份的節節下跌和《東方日報》銷量的後起直追等後續效應看來，不難發現華社對華文報產生的信心動搖。綜合本研究分析，以下研究者將各別就馬來西亞華文報與生俱來的使命和責任、建構華人社會認同和維繫社群凝聚力、多族群社會環境中角色調整和自我定位三項研究發現，說明馬來西亞華文報角色及功能的調整，並綜述華文報在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困境中，如何試著尋找新的未來和出路。

壹、馬來西亞華文報與生俱來的使命和責任

華人社群給予的肯定和華文報對自己角色的認同，決定了華文報行使使命和責任的方向。如同 McQuail (1994) 所言，報紙做爲中介的最大功能在於她是創造我者和他者共同元素的重要工具，提供我們是誰及未來方向的重要資訊，馬來西亞華文報作爲資訊傳達的重要工具，一直具有創造華人社群共同元素的重要功能，然而這種功能在收購事件發生後開始產生變化，部份華文報與華社之間在收購事件爭議上的不誠實對話，引起華社猜疑。華人社群認爲華文報的使命逐漸淡化，不再提供更多及維護華社利益的資訊；報社本身卻覺得他們仍然身負重任；華社認爲華文報在處理如華人教育權益等課題時無法發揮功能，華文報則認爲此類議題屬既定的結構性問題，做再多的討論也無濟於事，因此不應以此做爲衡量及彰顯華文報使命的指標，兩者之間的認知差異開始浮現。

回顧過去，從洋人辦報開始一直到馬來西亞獨立前，談華文報角色時一定離不開對民族使命的期待和盼望。經歷國家認同的轉變和馬新報業分家，華文報一直延續過去爭取華社利益爲主的辦報目的。這段時期，不管是捍衛華人公民權或華文教育受教政策等議題及立場上，都可明顯看到華文報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華文報本身也認爲應該以此使命和責任繼續捍衛華社權益。在財團收購之前，華文報作業流程從新聞產製到發行都較爲保守和傳統，如同許春所言，過去華文報都被視爲一份屬於華人母語的報紙，這也證明當時華文報的傳統性非常強烈。

「五一三」事件所產生的政治和族群分水嶺，除了造成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進一步

分裂，更區隔不同族群間的界線。華文報社處於多族群社會環境下，尤其是面臨單一種族領導的政治環境中要實現捍衛華社使命的理想，就必須克服許多難題，政府設定的敏感課題範圍擴大即為其中之一。

族群衝突事件之後，馬國政府訂定了許多禁止報紙公開討論的議題，範圍涵蓋種族、宗教、教育、文化、語言等領域，對新聞工作產生極大困擾。此外，政治人物也開始利用這些禁令來限制報紙的報導內容，換言之，政治干預力量開始浮現檯面。禁止報導界線的模糊不清和賦予官員太大的詮釋權力，逐漸影響和改變報社新聞題材的選擇，對華文報維護使命和責任產生相當大的衝擊。

一九八七年十月發生的「茅草行動」在新聞界產生的寒蟬效應一直延續到今天，特別是對較獨立自主的華文報而言，是第一個質變和量變的分水嶺。在這之前，華文報對國家政策的批判仍然相當犀利，對整體華社的影響力也都反映在動員華社捍衛華人文化和歷史運動上，因此這時期的華文報使命明顯的與民族情感息息相關，這種強烈的天生情感一直延續到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集團之後。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財團支援下華文報或報老闆並沒有意圖放棄她做為一個維護華社利益及連結政府、華社和報社之間重要橋樑的角色，許多報紙仍然以這個目標為最大訴求，華社的支持反映在報紙的銷量上，就算經歷東南亞金融風暴，華文報在眾多的商業機構中仍然可以維持一定的盈利。

與此同時，擁有龐大資金的財團讓報社業務朝多元化方向發展。換言之，華文報在財團支援下產生結構性的蛻變，而非新聞自由的受限，這時候的華文報不再是扮演如何在華人社群中凸顯強烈民族意識的魚色，而是積極打破過去的傳統形式，帶領華文報甚至整個華社走向國際化，例如成立基金會、舉辦國際性文化活動、發展網路電子報及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和國外華文報合作等。華文報改變傳統訴求主軸不僅有助於華文報走出華人社群，更能協助華社瞭解國際局勢和提昇競爭力。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是，如果沒有政黨收購事件的發生，這將是華文報新的使命和責任及未來所要走的路線。

在政黨收購事件之後，華社也很清楚馬來西亞四家主要華文報的立場，雖然仍有部份華文報刻意凸顯過去傳統使命的訴求，但看在華社眼裡卻成為一種試圖掩飾報紙政黨化的做法。在現階段來說，前述訴求付諸實際行動可能被視為是落後的做法，因為這種傳統訴求不僅無助於華文報走出華人社會，使華文報難以立足於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環境，也無助於擺脫具強烈種族意識型態的他族對華文報懷有的敵意、偏見、誤解及歧視。

收購事件之後，四家華文報代表華社的地位明顯受到質疑，尤其是各報對反收購工委會和華團部份領袖言論的打壓手段，使華社難以接受，更對政黨化的報紙能否繼續以積極的姿態為華社爭取利益心存質疑，再多的內容改革和重提華文報傳統訴求，帶來的

可能只是徒增華社的疑慮。

貳、建構華人社會認同和維繫社群凝聚力

華文報建構華人社會認同和維繫社群凝聚力的具體表現，主要呈現在兩個層面，第一是華社對華文報的情感層面；第二是華文報做為華社鐵三角結構層面。前者延續上述的族群情感，建立在 Geertz (1996) 提到的「天賦的」與生俱來的華人族群情感歸屬及自我認同的意義上，最重要的是華文報本身提供了一個先生性的純華文書寫的語文情境，相關的言論和思考模式都來自華族特有及唯一的社會經驗和實踐。所以自古以來華文報就和華人社會劃上一個等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情感層面上自然容易建立起華社對她的認同。

這份天生的情感不只是華社自我認同表徵的重要依據，更是族群意識中區分我族與他族的重要指標，這種族群間的界定讓華文報的生命在華人社群當中延續和擴張（莊靜怡，2003）。在新國家認同的衝擊下，華人社會需要創造及強化族群認同，因此不斷透過華文報這一個中介物來維繫社群凝聚力，這種集體意識只有透過華文報才能長期被保存下來。如同王明珂（1997）所言，在關鍵時刻這些意識將被賦予新的詮釋，並成為華社之間新的集體記憶，這也就是為什麼華人社會將華文報視為重要的中華文化遺產，並給予她和華文教育同等的地位，愛護她如同愛護華文教育，是不容許外來勢力甚或外族干預的，這種傳統且強烈的族群意識直接反映在華社放棄《新明日報》的行動上。

獨立後的華文報、華文教育和華人社團的關係從沒改變過，華社鐵三角的組合由來已久且感情深厚，華文教育和華人社團議題因此一直都是華文報報導的重點。三者共同經歷過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和一九八七年的「茅草行動」，瞭解到華人在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生存不易，對於華文報的一些報導和立場都給予相當大的肯定。

華文報一直以來都伴隨著華人社會成長，在許多事件中，華文報堅持其辦報立場與政府週旋到底，例如過去的三保山護山事件、華小高職事件及最近的白沙羅華小遷移等事件都可以觀察到，三者之間不僅地位平等，且相互依存，三方的信任和依賴並非一朝一夕可建立起來。

雖然至今仍缺乏具體的指標檢測及證明華文報動員華社的力量，但單從華社發動三保山護山運動等所累積的剪報量，以及目前高達二百六十萬讀者人數來看，華文報運用輿論能量及議程設定的能力，多少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力，這不僅是建構華人社會認同和維繫社群凝聚力的具體表現，更是華社依賴華文報的具體行動。由此觀之，華文報無法乖離或忽略華社權益，否則最終極可能面臨如《通報》和《新明日報》一樣被華社拋棄的下場。

這種緊密結合的關係一直維持到收購事件之後開始出現變化。收購事件後，南洋報業十位管理和編務人員相繼離職，部份反收購工委會及華社領袖被列入報社黑名單，華社反彈情緒幾近失控，過去辛苦建立起來的信任和肯定，也在一夕之間崩塌。換言之，今天馬華公會硬生生的介入華社鐵三角運作機制，將原本相互牽引和扶持的三股力量扭轉為相互仇視和競爭的局面，不只重創鐵三角成員，更進一步瓦解華社的凝聚力。

參、多族群社會環境中角色調整和自我定位

過去華文報大可不必報導華人社會以外的新聞，因為單靠社團新聞就足以應付版面的需求；但現在所有的議題不單只是屬於華社個體，更涉及到全體國民的利害關係，華社不可能將自己從多族群的社會中分割出來或獨立的生存，如同張茂桂（1993）所言，族群特質的形成是建立在互動機制上；換言之必須仰賴各民族間的協調和合作才能凸顯華文報在華人社會和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裡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華文報也不能捨棄國家利益不談，而單獨討論華社的權益問題。儘管國家政策對華社的影響及華文報的牽制從沒間斷，但對華文報而言，限制言論與新聞自由之政策含蓋的範圍並不只僅是華文報而已，所有馬來西亞媒體都必須受到法令的規範在一定的範圍內行使其媒體權力，在法令限制下，華文報的角色和過去並沒有不同。

然而，就華文報影響力而言，雖然在九〇年代之後官方開始關注華文報的言論和行為，嚴格說來至今仍然無法突破華人社會報紙的角色的侷限性，其影響力仍只侷限於華人社會，包含華人政黨。誠如部份受訪的媒體決策人所說的，以巫統為首的執政黨一般上不會參考華文報的建言，相對來說對國家政策的影響性也就非常有限。此外，華文報的影響力亦受到語言的限制，因此在政治影響力上也無法和馬來西亞文報或英文報相比，畢竟華文報的銷量和其他兩種語文報的銷量仍有一大段的差距³²。在巫統眼中或馬來族群認知裡，華文報仍然屬於華社的報紙或是一份馬來西亞華人辦的報紙，而不是馬來西亞人的報紙，這種認知延續了馬來西亞人認同問題。

九〇年代財團接手華文報之後，試圖改變其他族群尤其是執政黨對華文報即華人的刻板印象，但礙於前述華文報結構性問題，因此一直無法擺脫這個宿命的結果。財團接手之後，華文報強化國家利益至上的訴求，對強調商業利益至上的財團而言，無疑是再正當不過的方向。而更重要的是，借助華文報多元化經營的機會，財團得以改變執政團隊對華文報與政府對立的刻板印象，這與八〇年代之前華文報所強調的族群利益已明顯

³² 以二〇〇三年所有西馬三種語文日報全年平均的日銷量來看，三家馬來西亞文日報總銷量為 624,143 份；三家英文日報總銷量為 477,310 份；五家華文日報總銷量為 900,736 份。單從日報來說確實華文報銷量高於其他語文，但如果將馬來西亞文和英文兩種語文報在週日推出的週日版銷量來看，單日的報份就高達 1,629,248 份，幾乎是華文報銷量的一倍（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Malaysia, 2003）。

有所不同。

財團介入的九〇年代後，華文報紛紛成立一些部門來專門處理報社對外聯絡和主辦活動的窗口，開始改變經營模式。對財團而言，舉辦類似慈善活動有助於提昇報社形象，同時也可透過慈善等活動邀請政治人物或官員等政府部門參與，希望藉此改善與政府尤其是華人政黨和報社之間關係。

雖然財團儘可能依循國家政策追求國家安定、國民團結和種族和諧等目標，但華文報天生的種族色彩與角色定位，仍難以擺脫大部份馬來政治菁英根深柢固的「煽動種族情緒」的刻板形象，尤其在巫統兩次黨爭危機中，華文報和華社每每都成為代罪羔羊。

從一九五七年獨立至今五十餘年，華文報從環境中汲取教訓，已較能圓融地調整腳步面對多族群社會環境所帶來的種種限制。華人族群意識形塑的同時意味著馬來族群意識也在同步建構中；從正面觀點來看，兩股勢力有助於推動國家進步，成為馬來西亞特殊多族群社會前進的最大原動力；從負面角度來說，兩股力量也可能成為馬來西亞進步的最大絆腳石。華文報大部份決策人都深明箇中道理，從累積的經驗中掌握一些技巧，透過新聞內容的巧妙配置更彈性處理國家利益和族群利益的衝突，因為不管外在環境如何改變，華文報仍無法改變她是一份以華文書寫的報紙的事實。如同潘友來所說，馬來西亞政府並非一個無理取鬧的政府，亦如同彭早慧所言，在九〇年代過後政府要的就是國家穩定、種族和諧，所以華文報不可能不遵守這個遊戲規則。

但遺憾的是，過去發生的許多案例卻顯示，大家口頭上一致認為攸關華社生死存亡、必須爭取到底的議題，華文報在實踐上往往流於消極，報紙採取的妥協或消極態度甚於積極應對，即便是面對政治人物或馬來西亞文報的不斷挑釁，華文報亦常會做出許多解釋來合理化逃避議題的報導手法。在新世紀裡，華文報仍然在馬來西亞華文報和華人社會華文報之間擺盪，政黨介入並沒有解決她的定位問題，反而模糊了做為一份華文報所應持有的堅持或信念。

第二節 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困境中發展的華文日報

一九五七年國家獨立之後，華文報便在華人社群當中努力建構新國家認同，並在多族群社會環境中維護國家安定和族群融合。如同第一章所言，八〇年代之前，華文報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時空裡有著不同的訴求，報紙的角色和功能也都緊隨著社會環境和國家發展而不斷的做出改變和自我調整。

八〇年代之後，馬來西亞整體發展進入一個穩定年代，華文報也邁入全新發展階

段。但是執政黨對華文報的不信任，以及部份政治人物的私心，決定了華文報未來的方向，也為報紙政黨化埋下了伏筆。政黨收購行動不僅幾乎否定了華文報理應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抹殺華文報在建構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上的努力，也破壞過去華社鐵三角所建立的相互信任機制。今日華文報陷入的進退兩難局面，主要來自於三股力量的牽扯，即政治力量的干預、全球化市場的衝擊，以及政黨私心所導致族群間的誤解，加劇華文報在建構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層面的衝突。

如同江宜樺（1998）所言，國家認同是個多面向的概念，她必須建立在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和制度認同三個層面上，換言之，國家認同亦是構成集體認同的重要環節。對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而言，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的衝突來自於各族群間對國家的不同詮釋，其中，馬來社群的國家認同停留在「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層面上，許多國家政策擬定方向都指向單一馬來族群，而華文報所謂的國家認同卻是建立在「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基礎上，不對稱的對話往往帶來更多的衝突與沒有交集。

華文報對建構國家認同所做的努力無需質疑，儘管長久以來即不斷面對馬來政治菁英的指責和質疑，華文報始終以國家利益為主要前提，透過文化及公益等活動不斷強調其對國家的效忠和肯定，可是仍無法獲得以巫統主導的執政黨的認同，以致在建構國家認同基礎上與執政黨產生更多的不一致，這種現象在華文報積極處理華社和政府之間的爭執時尤其明顯。換言之，華文報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衝破華社的華文報的困境，對過去試圖成為馬來西亞人華文報的企圖也隨著政黨收購而破滅。

維護華社政治力量是華文報另一個重大責任，但隨著華社政治地位的滑落，華文報也連帶的走入發展的困境，除了面對上述的國家認同的衝擊外，政黨收購事件也改變了華文報與華社間與生俱來的集體情感認同或族群意識，華社對政黨化的華文報的懷疑態度反映在報章銷售量上，也驗證了陳志明（1996）所強調的，族群認同既然是一個構思出來的概念，就會隨著社會環境不斷改變或調整。

華社對華文報的不信任來自於長期對馬華公會的不信任。一直以來，華社都期待華文報成為華人社群的重要參考指標，從《新通報》被華社遺棄例子來看，明顯可看出華社不希望任何一家華文報在關鍵時刻背棄華社利益，主要原因是華文報是建構華社集體記憶和意識的重要來源，華文報更是華社菁英形塑新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如同王明珂（1997）所言，社會現實造成的社會環境是激發集體記憶的主要原因，從過去的經驗中，華社深深體會到政黨化報章如何在關鍵時刻背棄華社意願，因此更難以接受馬華收購南洋報社，由此可明顯看出，華文報動員華社的力量已日漸薄弱，因為集體記憶牽動到族群的動員力量（侯政宏，2001）。由此也嚴重影響華文報辛苦建立起來的誠信機制，對華社鐵三角也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以華人政黨為號召的馬華公會對華文報過去的報導存在著較為負面的印象，如合作

社事件、張明添基金會事件等，都對馬華公會的形象造成極大的損壞。收購事件之後，華社不僅失去華文報這個談判籌碼，亦得不到馬華公會支持的力量。然而，以華社現有的單薄力量難以改變華文報現有的處境，依靠國家政策也無助於改善現有華文報的尷尬處境，三者間相互依存與唇齒相依的關係可見一斑。

華文報歷經不同時代的遽烈轉換，以及內外環境的長期磨琢，爲了生存被迫調整角色與定位來順應現實擠壓的處理，其實不難理解。以今天華文報豐富的求存經驗，必定能在族群利益和國家利益中選擇最好的方案，並發展出一套圓融應對局勢的機制，而非較爲消極的妥協態度，這對華社和國家都是一種嚴重傷害，也無助於國家邁向先進國。因爲思想狹隘、缺乏遠慮的政客只會是國家的絆腳石，照本宣科的媒體也將帶領人民走向死亡幽谷，只有認清自己的角色，才能勇往直前發揮媒體真正的功能，繼續帶領國家和人民。華文報如何重拾華社信心，再度得到華人族群的認同，實爲一大挑戰。

第三節 研究建議和限制

壹、研究建議

在多族群社會環境中，每一個生活環節或政治情境對華文報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變項，這些因素會很自然的引導或迫使華文報改變辦報立場，例如八〇年代之後，內在環境和外在環境的多項因素都影響著華文報成長過程，黃國富的碩士論文《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爲例》就是針對八〇年代茅草行動的其中一個引爆點華小高職事件做深入分析。

礙於篇幅和研究者個人能力的限制，本研究只能以宏觀角度來檢視八〇年代之後西馬來西亞華文報角色和功能的轉變，對於關鍵事件也只能做簡單扼要說明。馬來西亞華文報研究還是個原始處女林，尚有許多領域未被開發，未來有興趣者可以針對個別事件做更深入探討和分析，或者針對各別專業領域如組織文化、新聞產製、媒介管理等角度去瞭解報業集團介入華文報營運後如何影響報社運作、如何改變組織文化、對新聞產製流程有何影響等層面。

貳、研究限制

研究馬來西亞相關議題的人都有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平面資料極度缺乏。傳承得

（1999:III）感慨的說「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都會有這樣的感慨和無奈；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不易找到本地內容的華文論述。殘缺不全的剪報、零星散亂的出版。」高佩瑤（2004）在其碩士論文也指出，在馬來西亞尋找書面資料的困難，尤其是華文資料。

在台灣有關馬來西亞研究的文章並不多，華文報的研究幾乎等於零。侯政宏（2001）在蒐集資料時面對同樣難題，他認為台灣有關馬來西亞的文獻十分缺乏，相對增加資料蒐集的困難度，並聲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馬來西亞有部份傳播學者撰寫相關傳播議題，雖不多但也有一定的產量。另外受到語言限制，例如馬來人學者無法閱讀華文，因此研究對象都只能以馬來西亞文媒體或英文媒體為主，造成華文媒體議題在學術界裡呈現真空狀態。

目前有一批華裔年輕學者積極參與這部份研究，但礙於收購事件之後這些年輕華裔學者大部份被列入報社黑名單，造成他們無法深入接觸報社取得第一手資料，造成資料來源的最大缺失。

再來，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其最大的困難度在於必須仰賴受訪者的回憶，受訪者對於早期的一些事件往往印象模糊，甚至記不起來，例如在訪問彭早慧和林金樹就面對這個問題，加上馬來西亞向來缺乏完整的書面文獻，或沒有完善的電子資料庫，進行資料比對時往往面對相當多困難，只能放棄一些無法證實的答案造成遺憾。

有些受訪者一邊接受訪問，一邊還得處理公務，往往談到某個關鍵時刻就被公務打斷，造成受訪者無法一氣呵成做有條理的陳述。另外就是每位受訪者接受訪問的時間長短不一，例如一些退休的老報人，可以無限制的談上二個鐘頭，有些媒體人安排較長的時間來接受訪問，有些則是一邊工作一邊回答問題，造成有的訪問是在半小時內匆忙結束，有些細節部份來不及做訪問，這對資料收集完整性來說都是一個傷害，限制了受訪者可以在從容的情況下細細回憶、慢慢回答。

部份受訪者至今仍然在媒體線上，或和媒體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基於某些問題和答案的機密性和敏感性，受訪者往往會在關鍵時刻停住避而不答，或採用拐彎抹角的方式回答，這對資料的真實性有很大衝擊。在面對缺乏書面資料的佐證下，限制了追求真相的腳步，無形中對文章的效度造成一定的影響，這也是本研究最大遺憾。

第九章 參考文獻

壹、西文部份

- Barisan National Website (2004). <http://www.bn.org.my/parties.html>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03).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Malaysia. Malaysi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 Embong, Abdul Rahman (2000). The Culture and Practice of Pluralism in Post-Independence Malaysia (IKMA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8). Malaysia, Bangi: IKMA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 Eriksen, Thomas Hylland (1997).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 (Ed.),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pp.33-42). UK: Polity Press.
- Freedman, Maurice (1960). The Growth of a Plural Society in Malaya.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9 .
- Furnavall, J. 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44).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Geertz, C. (196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In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 Smith (ed.), Ethni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mez, Edmund Terence & Jomo, K. S. (1999).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2nd E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rst, Pual & Thompson, Grahme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Ed.). UK: Polity Press.
- Koon, Heng Pek (2002). The Malaysian Chinese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in A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Malaysian Society. 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西亞華社的回顧和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西亞華社的回顧和前瞻研討會，馬來西亞孝恩文化基金會。
- Kuper, L. & Smith, M. (1969). Pluralism in Africa.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 (ed.). The Ethnicity Reader :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UK: Polity Press .
- Lawson, Tony & Garrod, Joan (2001).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 Lindlof, Thomas (1995). 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 Mcquail, Dennis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3rd Ed.). London: SAGA.
- Minichiello, Victor., Aroni, Rosalie., Timewell, Eric & Alexander, Loris (1995). In-Depth Interviewing: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alysis (2nd Ed.). South Melbourne: Longman.
- Mitchell, G. Duncan (1989). A New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Pong, Suet-ling (1993).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Secondary School Attain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66, pp245-261.
- Puah, Pauline (2004-8-5). The “10 Dilemmas” Malaysians Face Today[Online]. Available: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8929> [2004-8-10].
- Severin, Werner J. & James W. Tankard, JR. (2001).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5th e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Smith, M. G. (1968). The Plural Society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Tan, Chee Beng (1988). Nation-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harles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25-73).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James & Hill, Anne (2000). Dictionary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Studies (5th Ed.). London: Arnold.
- Wimmer, Roger D. & Dominick, Joseph R. (2000).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
- Wright, Charles R. (1960).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4, No. 4., pp. 605-620.

貳、中文部份

- 中國報 (2000-8-24)。前鋒報挑起爭議 12 青年團要求道歉，〔網頁〕。中國報電子報。
<http://www.chinapress.com.my> [2004-8-4]。
- (2004-4-16)。馬新社國際化 提供華文新聞。中國報，A7 版。
- 中國報電子報 (2004)。華團與媒體的互動 南洋報業基金下月工作營〔網頁〕。
<http://www.chinapress.com.my/content.asp?dt=2004-04-08&sec=malaysia&art=0408mb91.txt> [2004-6-10]。
- (2004)。關於我們，〔網頁〕。<http://www.chinapress.com.my/aboutus/>
[2004-8-1]。

- 內政部網站（2004）。<http://www.kdn.gov.my/>〔2004-6-30〕。
- 方積根、胡文英（1989）。海外華文報刊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新華書局。
- 水興浪（2003）。華騷 200 年。馬來西亞吉隆坡：晨光之市創作有限公司。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 王國璋（1997）。馬來西亞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馬來西亞吉隆坡：東方企業。
- 王雅各（2000 年 12 月）。綜論質性研究。傳播質性研究方法之發展與省思。傳播質性研究方法之發展與省思研討會，台北：巨流。
- 王維興（2004）。南洋報業主要持股人。載於東方日報主編，東方日報農曆年特別版。馬來西亞：東方日報。
-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
- （2004）。馬來西亞華人在多元文化下的困惑，〔網頁〕。木馬城。
<http://mumacheng.com/>〔2004-8-15〕。
- 任元杰（1985）。協和民主的理論與實際——複式社會政治秩序與變遷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台北市。
- 光明日報（2004-2-8）。赴柬教中文體會真善美 4 大馬青年笑談苦樂，〔網頁〕。光明日報。<http://www.guangming.com.my/gmot.phtml?sec=407&sdate=&artid=200402080402>〔2004-7-16〕。
- 朱柔若譯（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初版）（W. Lawrence Neuman 著）。台北市：揚智。
- 民主行動黨網站（2003-11-21）。文告，〔網頁〕。
<http://www.dapmalaysia.org/cnet/2003/03nov/03nov21-1lks.html>〔2004-7-1〕
- 何國忠（2002）。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1993）。多元文化下的徬徨：馬來西亞華族知識份子的困境。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頁 77-86。
- 吳祖田（1999）。「艾斯門」族群政治基本概念架構之比較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七期，頁 91-102。
- 吳清德（1978）。馬來西亞的華人融合於多元社會中（斯人譯），〔網頁〕木馬城。
<http://mumacheng.com/>〔2004-8-3〕。
- 呂堅強（2001）。報變 96 小時。馬來西亞：呂堅強。
- 李建良（1988）。民主政治的建構基礎及其難題：以「多元主義」理論為主軸。載於蕭高彥、蘇文流主編。多元文化與承認政治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李美賢（2001-4-17）。「東南亞安全情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座談會，〔網頁〕。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activity/mt900417.htm>〔2004-6-30〕。
- 李茂政（1987）。當代新聞學。台北：正中書局。
- 李錦興（1997）。馬來西亞華人：在 2020 宏願中追求認同（張曉威譯，1998）。東南亞季刊，第 3 卷第 2 期，頁 19-52。

- 杜力行譯（1989）。大眾傳播學理論（Melvin L.DeFleur & Sandra Ball-Rokeach 著，劉立行校訂）。台北：五南。
- 沈雲驄、湯宗勳譯（2002）。品牌行銷法則：如何打造強勢品牌？（David A. Aaker 著）。台北：商周。
- 亞洲週刊（1990）。首相批評華文報紙起爭議。亞洲週刊，第四卷第四十九期，頁 23。
- （1990）。華文報爭奪場充滿火藥味。亞洲週刊，第四卷第十七期，頁 38。
- 周宗仁（1997）。馬來西亞華人地位之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北市。
- 東方日報（2004）。新聞自由障礙待除 媒體未發揮第四權，〔網頁〕。載於新紀元學院網站。http://www.newera.edu.my/HuoDong/May04/ms_MeiXiWang_1.htm〔2004-8-1〕。
- 林光、謝娥譯（1991）。巫統的商業王朝（Gomez, Edmund Terence 著）。馬來西亞：論壇出版社。
- 林吉祥（2003）。骨痛熱症肆虐：行動黨將作第二次投報，〔網頁〕。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網站<http://www.dapmalaysia.org/cnet/2003/03jan/archive-03jan.html>〔2004-8-10〕。
- 林合勝（2001）。馬來西亞華人角色轉變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高雄市。
- 林若雱（2001）。馬哈迪主政下的馬來西亞：國家與社會關係（1981-2001）。台北市：韋伯。
- 林淑惠（2003）。從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解析歷史建築展示之研究——以台南州廳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中壢市。
- 林道濕譯（1981）。大馬的種族衝突：一個歷史的透視（Kay Kim Khoo 著），〔網頁〕。木馬城。<http://mumacheng.com/>〔2004-8-2〕。
- 侯政宏（2001）。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參與之研究——兼論華人政治上的地位與角色。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台北縣。
- 南洋商報（出版日不詳）。南洋商報八十週年紀念冊。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 （2004-07-16）。南洋報業基金捐 10 萬 充同善中醫樓建築費，〔網頁〕。南洋網。<http://www.nanyang.com.my/index.php?ch=7&pg=10&ac=388546>〔2004-8-4〕。
- 星洲日報（2000-5-15）。董總通過報紙揭發事件 韓春錦：並非解決問題良方，〔網頁〕。星洲互動。<http://www.sinchew.com.my/>〔2004-8-1〕。
- （2000-08-18）。謝春榮：《前鋒報》挑起課題，〔網頁〕。星洲互動。<http://www.sinchew.com.my/>〔2004-8-1〕。
- （2000-08-31）。工委會求見首相澄清誤會，〔網頁〕。星洲互動。<http://www.sinchew.com.my/>〔2004-8-1〕。
- 柯嘉遜（1990）。馬來西亞的政治神話。馬來西亞吉隆坡：雪華堂華社資料研究中心。
- 胡興榮（2002）。回教世界釋出自由主義。亞洲週刊，第 11 卷第 24 期，頁 50-51。
- 夏鑄九、黃麗玲等譯（2002）。認同的力量（Manuel Castells 著）。台北：唐山。
- 徐振興（1992）。閱聽人族群認同感與其對不同類型廣告偏好之關聯性研究。未出版碩

- 士論文，文化大學新聞系，台北市。
- 楊善勇（2001-7-21）。政途莫測，〔網頁〕。時代報。
- http://www.suaram.org/generasi/opinion_20010721-2.htm〔2004-8-3〕
- 潘永強（1999）。馬來西亞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台北市。
- 高德義（1994）。族群霸權體制的形成與解構——馬來西亞族群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山海文化雙月刊，第2期，頁28-35。
- 高佩瑤（2004）。多元文化環境下的社會行銷策略運用：以馬來西亞檳城消費人協會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私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台北市。
- 國際時報（2003）。古晉 15 萬華人讀者 《國際時報》占 40%，〔網頁〕。國際時報電子報。<http://www.intimes.com.my/group/030626gj.htm>〔2004-7-30〕。
- 崔貴強（2002）。東南亞華文日報現狀之研究。新加坡：華裔館和南洋學會。
- 張宏源（1999）。解構媒體環境變遷與報業發展趨勢。台北：亞太圖書。
- 張亞中（1997）。多元文化整合的困境：以馬來西亞例。東南亞季刊，第2卷第1期，頁24-42。
-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載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初版）。台北：業強出版社。
- 莊迪澎（2002）。看破媒體。馬來西亞吉隆坡：破媒體傳播事業社。
- 許文榮（2003）。馬來西亞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華文文學，〔網頁〕。世界華文文學網站。http://www.fgu.edu.tw/~literary/wc-literature/drafts/Malaysia/xu-wen-rong/xu-wen-rong_02.htm〔2004-7-29〕。
- 郭淑卿（2004-3-28）。16 人入閣 16 部門有代表 馬華官職歷來最多。星洲日報，國內版 04。
- 陳中和（2001）。馬來西亞巫統和伊斯蘭黨伊斯蘭化理念與政策比較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台北縣。
- 陳石安（1968）。報業概論。台北：壬寅出版社。
- 陳向明（2004）。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陳志明、洪玉華、麥留芳（1997）。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座談會紀要——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2期，頁66-71。
- 陳志明（1996）。從馬來西亞的族群談族群與族群認同的研究。東南亞季刊，第一卷第4期，頁1-10。
- 陳亞才（2001）。媒體的困厄 時代的心眼。載於南洋商報主編，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第二版）。馬來西亞：飛腳製作室。
- （1999）。有所不為 有所為。馬來西亞吉隆坡：大將事業社。
- 陳美萍（1998）。馬來西亞華巫族群關係。未出版碩士論文，南華管理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嘉義縣。
- 陳振遠、陳振田編譯（1990）。行銷管理：分析、規劃與控制（Philip Kotler 著，第六版）。台北：五南。

- 陳祖排(1980)。大馬種族關係概況，〔網頁〕。木馬城，<http://mumacheng.com/>〔2004-8-12〕。
- (1981)。國家文化與華人文化，〔網頁〕。木馬城，<http://mumacheng.com/>〔2004-8-12〕。
- 陳淑儀(2004)。基金會全面看系列，〔網頁〕。中國報電子報。
<http://www.chinapress.com.my/topic/series/default01.asp?sec=fund&art=0923fund.txt>〔2004-8-12〕。
- 陳漱石編(2001)。華文報天變再記錄。馬來西亞：泊世工作室。
- 陳允中(1995)。馬來西亞九十年代的國族(nation-making)營造，〔網頁〕。木馬城自，<http://mumacheng.com/>〔2004-7-12〕。
-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2001)。白沙罗华小迁校事件專題，〔網頁〕。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網站。
<http://www.scah.org.my/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listarticles&secid=2&PHPSESSID=f1a3284797a0a2e2c79925808091cf03>〔2004-8-1〕。
- (1985)。全國華團聯合宣言，〔網頁〕。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網站。
<http://www.scah.org.my/modules/tinycontent/index.php?id=5>〔2004-8-2〕。
- (1983)。國家文化備忘錄，〔網頁〕。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網站。
<http://www.scah.org.my/modules/tinycontent/index.php?id=7#m1>〔2004-8-2〕。
-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青年團(2001/6/20)。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青年團文告：支持華社財團收購南洋報業，〔網頁〕。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網站。
<http://www.scah.org.my/modules/sections/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d=6>〔2004-8-2〕。
- 傅承德譯(2002)。馬來西亞華人生意(Gomez, Edmund Terence 著，2001)。馬來西亞吉隆坡：大將事業社。
- 曾慶豹(2001)。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台北：海華文教基金會。
- 程曼麗(2001)。海外華文傳媒研究。北京：新華書局。
- 黃有志(1994)。民族主義與族群認同——論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與實踐。載於邵宗海、楊逢泰、洪泉湖編撰，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台北市：幼獅文化。
- 黃明來(2003)。一黨獨大。馬來西亞吉隆坡：大將書行。
- 黃國富(2002)。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台北市。
- 楊建成(1982)。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台北市：文史哲。
- 葉彥邦(1999)。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對當地華人經濟之影響。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7卷第1期，頁181-212。
- 葉觀仕(1996)。馬新新聞史。馬來西亞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
- 葛永光(1990)。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式與挑戰。台北市：正中書局。
- 詹中原(2001)。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兩岸加入WTO之分析。國家政策論壇，

- 第一卷第九期，頁 157-167。
- 載萬平（1997）。族群政治與國家角色——新加坡個案分析。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高雄市。
- 廖炳惠（1994）。泰勒論現代性與多元文化。當代雜誌，第 100 期，頁 10-29。
- 廖韶吟（1998）。馬來西亞經濟發展政策對華巫種族關係的影響。未出版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台中市。
- 趙永茂（1995）。馬來西亞族群政治與政黨政治的特質。東南亞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頁 13-24。
- 劉仲冬（2002）。量與質社會研究的爭議及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及出路。載於胡功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121-139）。台北市：巨流。
- 劉敬文（2003-6-28）。華文報逾八億收入。東方日報，今日專題版。
- 潘永強、魏月萍（2002）。解構媒體權力。馬來西亞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 蔡念中、張宏源、莊克仁（1996）。傳播媒介經營與管理。台北市：亞太。
- 蕭高彥、蘇文流主編（1998）。多元文化與承認政治論。政治思想論文集——多元主義。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賴寶珠（2001-06-24）。馬哈迪怒責馬華文報 玩弄訴求與華教課題，〔網頁〕。聯合早報電子報。http://www.zaobao.com/chinese/region/malaysia/pages/malaysia_chinese240601.html〔2004-8-1〕。
- 聯合早報（2001-08-02）。馬來西亞華社財團 退出收購南洋報業，〔網頁〕。新加坡聯合早報電子報。http://www.zaobao.com/chinese/region/malaysia/pages/malaysia_chinese020801.html〔2004-8-1〕。
- （2003-04-03）。《今日馬來西亞》：內政部下令英文報紙 別報導具體死亡病例，〔網頁〕。新加坡聯合早報電子報 <http://www.zaobao.com/special/pneumonia/pages/pneumonia030403i.html>〔2004-8-1〕。
- 蘇育琪（1996）。專訪馬哈迪（馬來西亞總理）內鬥，將一無所有。天下雜誌，第 178 期，頁 24-54。
- 龔宜君、張景旭（1997）。發展中的東南亞中產階級：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與菲律賓中產階級形成之評估。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第 5 期，頁 1-28。

參、其他語文（馬來西亞語）

- Hassan, Kamal Halili (1990). Penulis dan Undang-undang.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Pejabat Kebudayaan dan Kesenian Negeri Terengganu Darul (2004).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Online]. Available: <http://budayatrg.mmu.edu.my/pengenalan.html>[2004-8-2]

附錄：訪談大綱

壹、經營者

1. 身為 x x 報的管理者，你如何為貴報訂定目標、定位、選擇市場？
2. 你認為貴報扮演何種角色？
3. 身處多元族群的環境中，經營中文報面對最大的困難與限制為何？如何克服？
4. 大部份人都把華文報與華社緊密扣連，你覺得華文報是因華社而生嗎？
5. 依你多年的管理經驗，x x 報歷經數次的經營權結構改變，貴報的定位與目標與否也隨著做出調整？
6. 除了經營權改變的因素外，x x 報角色或定位的改變也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政治、經濟或社會文化等）？為什麼？可否舉例說明？
7. 報紙的立場等於經營者的立場，你贊成嗎？為什麼？經營者的立場是否會直接影響貴報的營運？
8. 處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報紙呈現的內容常會與現實抵觸，如凸顯某些議題會引發其他族群的不滿，或引起執政者的關注，面對這類衝突時，你如何處理？是採取堅持立場的角色，或妥協順應？
9. 對於管理者，常須兼顧中文報文化與營利兩全的局面，而外界（政府、華社及其他族群）對中文報的期待又不一，面對這種多難的局面，你如何處理？
10. 你認為中文報與國家、中文報與華社、中文報與其他族群三者的關係中，中文報的角色與定位為何？中文報如何兼顧三者的重要性？
11. 中文報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未來該如何定位？

貳、內容決策者

1. 你認為 x x 報的角色與定位為何？
2. 在報紙內容的處理上，你如何凸顯上述角色與功能？
3. 你如何確保新聞在產製的流程中，每一環節（如記者採訪、新聞撰寫、編輯篩選、議題凸顯或丟棄等）的運作皆能達成報紙的定位與角色的發揮？過程中面對的最大困難與限制為何？如何解決？
4. 在香港，媒體宣稱他們寫讀者想看的東西，在台灣，媒體凸顯其教育讀者的使命，你認為馬來西亞的中文報紙屬於那一種？為什麼？如何在內容的呈現上凸顯這種特色？

5. 依你在報界的豐富經驗，在中文報的發展過程中，如八十年代的多元齊鳴，九十年代的集團化與二千年的中央化（政黨勢力介入），中文報的內容呈現、方向及著重點有何改變？如何改變？可否舉例說明？
6. 大部份人都把華文報與華社緊密扣連，你覺得華文報是因華社而生嗎？在內容的呈現上會不會凸顯華社立場？強調華社關心的事物？著重教育華社人民與文化傳承的使命？
7. 在一些議題上（如馬來人特權風波、白小事件和華小高職事件）的新聞內容處理模式，是否常與其他語言報紙（尤其是馬來文報）持對立立場？
8. 處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中，中文報常須在華社利益、事實、族群敏感議題等兩難情況中報導新聞，以致常引發其他族群的不滿，或引起執政者的關注，面對這類衝突時，你如何處理？如何拿捏？報紙這時候扮演的角色如何？可否舉例說明？還是採取堅定立場，或妥協順應的角色？
9. 在面對以族群政黨政治為主要運作機制的國家，中文報應如何處理族群敏感課題而能維繫族群的和諧，且同時發揮媒體應盡的角色和功能？
10. 在相關馬來西亞中文報角色與功能的傳統論述中，認為中文報有傳達華社聲音到其他族群的功能，但卻有部份華社人士認為其他族群對華社事務冷漠，乃因為中文媒體未善盡其職，你認為如何？其他族群關心與否會影響報紙的新聞內容的處理嗎？
11. 回顧中文報的發展與變遷，明顯的可看出中文報角色的轉變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外在環境與組織內部因素，你覺得那些因素對新聞內容的處理影響最大？
12. 華裔政黨——馬華公會收購事件象徵著中文報由集團化轉向中央化，中文報的自主性隨著經營權結構的改變而有所轉移，因此引發華社的極大反彈，身為一位中文報的決策者，你覺得此事件的意義為何？對中文報未來的內容呈現方向有著怎樣的影響？
13. 自馬華收購事件至今，你在實際的內容處理運作中是否受到明顯的影響？與之前有何差異？
14. 除了安華事件、馬華收購事件等重大議題外，你認為還有那些代表性議題／事件因處理得宜而發揮極大效果？又有那些議題／事件受到諸多限制而未有效發揮？可否講述新聞處理方式、滿意與不滿意的原因。
15. 在面對有關國家、華社及其他族群的議題時，在處理上是否會有差異？一般處理的模式為何？
16. 你覺得透過內容的處理，能完全發揮中文報的角色與功能嗎？為什麼？
17. 中文報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未來該如何定位？

參、學者

1. 處於多元種族的環境下，中文報應如何定位及扮演何種角色？
2. 依你的觀察，今日馬來西亞的中文報實際上扮演著何種角色（不管是社會或政治）

為何？與過去有何明顯的差別？可否舉例說明？

3. 中文報定位與角色的轉變緣於何種因素（社會、政治、經濟或文化等因素）？
4. 你覺得馬來西亞中文報紙在主流論述（馬來文與英文報紙）下應如何自我定位和區隔？如何凸顯中文報的重要性？
5. 處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下，馬來西亞中文報在角色的定位上面對何種限制與困境？
6. 有學者將華社、華文教育及華文報紙三者比喻為傳承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鐵三角，缺一不可，你有何看法？中文報紙在這一使命的實踐情況如何？
7. 在相關馬來西亞中文報角色與功能的傳統論述中，認為中文報有傳達華社聲音到其他族群的功能，但卻有部份華社人士認為其他族群並不關心華社事務，其他語文報紙也不熱衷於報導華社動態，導致他族對華人的認知常有誤解，你認為這樣一種論述是否放大了媒體的力量？或是正點出了多元種族社會下，華人和中文媒體的尷尬的局面？
8. 處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中，中文報常須在華社利益、事實、族群敏感議題等兩難情況中報導新聞，以致常引發其他族群的不滿，或引起執政者的關注，面對這類衝突時，以你的觀察，報紙這時候扮演的角色如何？是採取堅定立場，還是採取妥協順應的角色？為什麼？
9. 相反的，中文報在許多例子中卻發揮了傳達他族聲音到華社的功能，例如：在安華事件中，華文報的新聞處理手法似乎得到部份馬來族的認同，這是否意味著中文報較其他族群跨越種族藩離的限制較小，角色的扮演也較容易發揮？中文報在跨族群訊息傳達的功能上到底扮演何種角色？
10. 回顧中文報的發展與變遷，明顯的可看出中文報角色的轉變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外在與內在因素，你覺得那些影響因素最關鍵？
11. 馬華收購事件象徵著中文報由集團化轉向中央化，中文報的自主性隨著經營權結構的改變而有所轉移，因此引發華社的極大反應，但類似收購方式亦於 80 年代發生過（通報被馬華收購），但當時未見任何的反彈聲浪，請問二者之間的差異為何？中央化對中文報角色的扮演有何影響？華文報中央化對華社的意義為何？
12. 自馬華收購後至今，中文報在實際的運作中是否有明顯的影響性改變？
13. 除了安華事件、馬華收購事件等重大議題外，你認為還有那些代表性議題／事件能呈現中文報的功能與角色？又有那些議題／事件是中文報應善盡角色，卻又未有效發揮的？
14. 從八〇年代、九〇年代到公元兩千年，中文報從過去的百花齊放到最後的五家報紙，你認為這是必然的趨勢嗎？各時代中文報紙的角色有何特色？
15. 請你就中文報與國家、中文報與華社、中文報與其他族群三個面向，談談中文報的角色與定位為何？中文報如何兼顧三者的重要性？
16. 中文報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未來該如何定位？